

未来中国 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 著



亚洲研究所出版社

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著



亚 洲 研 究 所

目 录

序言 001

第一篇 中国的未来需要创新社会回归优秀文化.....017

革命已经大行其道了吗？
公交车上播放的一档充满恶意的节目
消费文化助长的社会不公
媒体不应仅仅迎合受众兴趣
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是否过于冷漠？
“数字”排序下的社会现实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不问“为什么”的冲动消费
深加工食品与土特产食品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论孝道

第二篇 科技的发展与教育的变迁..... 047

人们需要科学性思维
选一个 Facebook 共和国总统
虚拟现实 VR 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李世石 vs. AlphaGo 新的起点新的挑战
哈佛教授迈克尔·普鸣谈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区别看待科学与技术
追求卓越的秘密和亚洲高校的前景
网络空间共和国

第三篇 人类的未来在生态文明..... 073

共生共享制：朝鲜国家发展的第三条路
在偏离正轨的时代我们呼吁真正的安全
清洁能源与人类的未来
生态文明是给全世界希望
举办北京气候变化会议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需要的是革新还是勇气
为了拯救地球 青年人能做的事情

第四篇 未来的安全保障要敢于想象.....102

蓬佩奥为美国外交之棺钉上最后一枚钉
慢动作的内战：美国的三路作战
从关塔那摩监狱到首尔大使馆一位美国军阀的崛起
朝韩峰会后韩国的真正安全挑战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历史周期终结
永别了 东亚武器
科技发展环境下的安保新定义
浅谈全球数据危机
美军有一群危险的好战派

第五篇 富有创意的外交.....156

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中国能否借助其传统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深层共识
打造中国特色智库的新传统
中国发展需要看清的几个历史事实
贝淡宁：用贤能政治衡量中国体制更合适
创新领导人会议的方式
IT时代 有必要恢复“笔谈”的传统
福山：中国崛起正促使西方广泛反思自身制度
中韩应从历史传统中寻找革新模式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谁更技高一筹？

结束语 何为中国？ 199

序言

美国、韩国乃至日本的一些媒体对北京十九大的报道方式令我深感不安。其实我要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习主席报告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新闻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变得愈加封闭。

回想 2017 年十月，我为准备赴上海演讲而参阅了一些有关十九大的中英文资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美国主流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一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待定人选中，哪几位会成为下一任国家主席候选人。当时的报道均臆断习正在为自己立威集权，十年任满后仍将留任。BBC 在播送习的十九大报告时还配上了一条醒目的标题：《意味着权力的演说》（A Speech that Spells Power），然而整篇报道并未提及报告的真实内容。

一些西方媒体称该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并给予其负面评价，认为这样的长篇大论是中国蛮横死板、顽固僵化的官僚主义的象征。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在美国也曾有这样的時候——大约四十年前，国家领导人还会向国会详细地论述政治纲领，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耐心去倾听阅读。但时到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不过是政客而已，哗众取宠，弃实就虚。事实上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自从在国会就职开始，他们就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人民的公仆。

习无意取悦他的听众。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来讲，他的态度可谓端正刚直。这种立场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位政治领袖，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他的演说与政治以及国家前途紧密相连。他作为整个国家的代表而非某个政治派系的首脑发出声音。

至于那些关于习主席有野心的揣测，我无法妄言虚实，但我没有在任何一家报纸上找到切实的证据；我读过几百篇论述中国愈发封闭化的文章，但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我看到的是一个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与此同时，我的祖国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习主席承诺坚持法治、发展科学、扶危济困，并表示希望能够了解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独特需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无视国内与国际法律，抨击科学与科学家，令美国贫困人群的状况雪上加霜，那些不对他唯命是从的国家都会被他奚落一番。

尽管如此，虽然我个人认为许多美国民众可以从中国的十九大报告中获益良多，但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把十九大视为一场足球比赛——

它们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场政治游戏本身，即这篇报告是习政治野心的宣示而非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前景的蓝图。

两日后我要去上海同济大学就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做演讲，因此反复仔细阅读报告全文，并把报告录音凝神倾听多遍。我并不关心习的野心为何——这篇报告与此毫无关联。它论述的是国家的治理，描绘的是未来的愿景。我在其中找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感觉像是在矿洞深处挖到了金矿脉：它们不仅有助于建设中国的未来，也对众多国家有所裨益。

我想美国的确曾经拥有立足于长远发展的国家制度，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被人讨论的只有选举与取悦人性低级层面的那些话题。如今的体制不再给人以政治讨论的空间，到处充斥着耸人听闻、煽动仇恨、妒忌与贪婪的夸夸其谈。政治已经被华府政要与游说集团锁在层层紧闭的门后——国民没有必要详细了解企业是如何为了富人的利益而纳税、或者为使他们获利而将政府私有化的。与之相比，用两个小时来做一场详细论述国家长远规划的报告要好得多——毕竟它不供人消遣，旨在解决重要问题。因此对我而言，这种面向全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全面描述国家规划的讲话体现的是真正的政策透明化，而不是官僚主义。西方媒体称这场长长的报告是专制国家的象征，但我无法苟同。假如美国与其他国家能够如此全面、彻底地致力于关键事务，它们的状况会大大改善。只是因为民众都不再参与政治，它才显得枯燥无聊。

哗众取宠的美国媒体根本不会给哪位官员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做演讲。我还记得儿时看电视上收看美国飞船登月的场景。准备过程播放了几个小时，科学家与专家的解说穿插其中，没有神采飞扬的天价明星说三道四，也没有“幕后独家专访”之类的花边新闻。整场报道的宗旨只是以一种可以让公众接受的方式来展示事实。人们有聆听繁复叙述的耐心，而且科学能实现其价值，因为国家有求实的氛围。现在这种传统已经因为沉迷自我、及时行乐心态的盛行而荡然无存。

倘若美国能够努力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让美国国民像中国人民一样有耐心聆听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不是把有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只当成超级英雄大片之类的东西来旁观消遣，这个国家会大有改观。美国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娱乐化趋势对政治本身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实“政治”（politics）这个词如今已经被美国人看作为己谋利的肮脏过程，而它原本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在美国人眼中，政治与

国家治理毫无瓜葛，政府正渐渐地被描绘成他们的敌人。

此外，习主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表示解决贫困问题是公民的责任，重申联合国、全球治理公约与国际法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这也让我备受鼓舞。在全球秩序愈加混乱、理想信念与规则治理观念四处崩塌的今天，他的这些话更显得铿锵有力。同时，他并没有讲哪个国家不好，具有威胁性，更没有暗示中国不会同哪里的人们交流合作。

习主席对年轻人需求的关心同样令人感动。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实现个人的财富增长，而是为每个人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一点他洞若观火。青少年话题已经从全世界的政治讨论中消失，青少年人群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而且正不断地被各种政治过程排除在外。在美国，青少年的叛逆问题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职业前景黯淡，有的甚至锒铛入狱，沦为盈利性监狱的收入来源。

习主席着重指出政策的制订及其过程要科学化。而在特朗普政府以及之前的历任政府的统治下，各项政策要么是心血来潮的结果，要么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众多集团为满足私欲，各自同政治顾问一起向国会提出法案，然后雇佣公共关系公司来捏造证据，让大众相信他们的法案是为让全民受益而提出的。我们需要有效利用科学方法，并且对全国与全球的长期利益进行严格评估。

而且美国政府是否会拒绝承认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更加让人担忧。政要们凭借其政治势力做出的猜测居然可以取代专家与一心探寻真相的人们的观测结果，该现象体现了一种政治痼疾。科学领域对青少年的吸引力较小，因此他们为追求眼前利益而牺牲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也不足为奇。

不过我认为十九大报告与中国政府制订的新政策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尽管习主席提到中共要大力建设公平社会，但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这一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再者，与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高盛集团等投资银行已经可以在中国干涉政府决策。要知道，高盛正是“吸血乌贼”式文化的源头。我真的希望能够更为全面地评判这类投机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危险影响。

习主席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但对阶级问题避而未谈——尽管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阶级矛盾是当下的关键性问题。也许中国的某些人担心“阶级”或者“经济矛盾”一类的表达会招致西方媒体的猛烈抨击，但实际上不论习说什么，抨击都会如期而至。因

此还是直面问题、建立全球共识更为妥当。

我也曾希望中国能够不再以增长率与企业收益作为经济建设成果的衡量标准。两千年以来，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都着眼于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不对利润与消费提出要求。这些被整体引入的消费型经济领域概念与传统中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背道而驰。不过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全世界人民都在呼吁发展不受全球资本与投机行为支配的民本经济。我确信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希望中国能勇于采取措施、远离全球金融化汹涌浪潮的人。

我有许多朋友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抱以深深的担忧。我相信他们可以在习主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中看到希望。中国于二十世纪便拥有规模最大、最有效的可持续性经济体系，现在完全可以领导全球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而且中国的儒家与佛教传统典籍中对这种新型文明的描述比比皆是。然而从十九大的后续反应看来，中国社会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共识仍十分有限。“一带一路”这一旨在加强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东南亚与欧洲经济联系的战略项目就几乎与生态文明毫无关联，似乎也没有摒弃将消费与投机作为经济主导力量这一做法的意味。

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规划：在中亚进一步修建机场与高速公路，进一步生产汽车，进一步开采与提取矿物，进一步铺设石油与天然气管道，等等。修建燃煤发电厂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环节，然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首先就需要淘汰煤和石油等传统能源。我们应当停止利用会造成污染的物质，将中国在太阳能与风能开发方面取得的经验传播到亚洲的其他地区。

中国针对中亚制定的众多规划还包括修建大型建筑物。它们也许会令过往者啧啧称奇，但对生态环境毫无益处，甚至可能会因为规模庞大、门槛太高而对当地社会与文化造成不良影响。大规模建筑会因为缺乏人性尺度而在它们与普通大众之间造成疏离感。我认为它们与重视人文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背道而驰。与之相比，把讲求风水与人性尺度的中国传统建筑介绍给中亚发展中国家要合适得多。

得知中国建材集团与中材集团合并成为世界级的混凝土制造商，可以借新兴丝绸之路的发展攫取巨额利润，我并没有因为它们的经济实力而心生羡慕。现在中亚不需要再购入混凝土，而应该多种绿树；不需要再铺设高速公路，而应当让那里的农民学会如何在愈发脆弱的

生态环境中以可持续的方式靠土地生存。混凝土只能用来修建冷冰冰的高速公路、公寓楼与商城，而它们会浪费宝贵的资源，疏离我们的人民。我在学校学到的中国的处世之道绝非如此。

新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主要由燃煤发电厂提供电能。几百年来，那里的人们一直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可现在“能源的浪费是发展的象征”这一错误观念正在向那里输入。我担心中国并没有带给他们另一种生活模式，而是在令他们史无前例地陷入对交易与金钱的痴迷。可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因袭性传统也好，社会主义传统也罢，究竟什么才是中国传统的精髓？我认为是温和谦逊、节俭克制、低调内敛、顾及子孙。然而在当今中国，以塑料与不可回收材料制成的包装产品、为促进消费而大力发展的一次性产品文化也成了现代生活的标志。这种文化并非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蔓延至中国的工业化与全球化思潮的变异体。

“生态文明”一词让我深受感动。它的内涵，是不是让我们寻回对地球的尊重、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家庭与周围人的珍视，以及借中华文化最有力的部分来拒绝实利主义消费文化？然而我到上海后，并没有找到中国传统那“最有力”的一部分，西方的消费文化在这里似乎已经完全失控。

我在哈佛大学参加关于宋朝思想的研讨会时了解到中国文人的谦逊态度。如今这种态度去了哪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领导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如今这种生活模式又在何方？当我看见上海那一座座浮华灯光笼罩下的大厦，那一辆辆飞驰而过、喷放着有害气体的汽车时，这取代了传统的、冷冰冰的现代化大世界令我忧心忡忡。

我问自己中国是否在重复美国的错误，是否在大张旗鼓地追求以高消耗为动力的高水平物质生活？降低消耗、在生活习惯与国家政策中进一步体现对环境的关怀、以此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我认为这些对中国人来讲更为重要。虽说中国政府已经再次强调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开始把国家往改善的方向引领，但消费文化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看见餐馆盘子中人们剩下的大量残羹冷炙时，看见店中频繁出现、只为吸引顾客而使用的不可回收的包装材料时，看见无所不在、装着食品的塑料袋时，我不禁想问，接触现代化之前的中国人，还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目睹这一幕幕场景时，会作何感受。他们或

许会认为这种浪费简直是败德辱行。在我们面临深刻的生态危机时，这个问题愈显严重。

遗憾的是，同我聊天的中国朋友以及我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并不考虑西化媒体所吹捧的高消耗生活会对环境与人类的未来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的军队建设

我还想谈一谈中国的军队。首先我要阐明自己的立场，以免引起误会。二十年以来，美国肆无忌惮地侵犯其他国家，大规模扩军，浪费资源，甚至为牟利而寻衅滋事，这一幕幕让我十分痛心。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已经变成了最大的威胁。而听到中国媒体对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大为赞扬时，不能不说我有些忧虑。

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饱受磨难，因此渴望拥有强大的军队，对此我感同身受。而且我认为，在近代历史上两位最不负责任的政客——特朗普与安倍晋三频频做出强硬姿态时，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自身安全而担忧。

然而我发现，中国强调军队建设这一做法有三方面问题令人忧虑。

首先，中国进行军备的假设前提大多是基于未来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冲突模式而做出的，而西方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未来的冲突可能不是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西方国家眼中的重要武器也许根本就用不到。美国大片中“炫酷”枪炮早已过时，未来国家安全的内涵将怎样，这一问题在中国尚未经过仔细探讨。下次冲突发生时，不要说喷气式战斗机与航空母舰，甚至坦克是否会派上真正的用场还是个未知数。它们不过是以往战争所遗留的、尚未被撤下历史舞台的道具。

很遗憾，中国采取的是与西方模式相符的安全政策，并未根据其底蕴深厚的思想传统大力发展自己的国家安全理论。我们应当打造更为现实、更具意义的国家安全理念：囊括无人机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物；联系当前的气候危机；有助于建立新型国际合作策略，脱离美国所提倡的、迫使他国为维护现存政治秩序而四处寻衅的联盟体系。中国的作为在这方面尚有很大空间。

要发展自己的安全理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与另一日益严重的问题紧密相关。

中国为谋求利润而进行武器制造的意愿愈发明显，对国际军火市场的兴趣也越发强烈。中国之所以不是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主角，并非

因为中共不知道如何通过贩卖军火赚钱，而是由于他们对以军火牟利与帝国主义危险传统之间的关系有深刻认识。

马克思早已指出，以武器制造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是最有可能导致未来冲突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整个世界在一战时深有体会。我们正在见证一股强大军事力量的发展，它有可能掀起足以毁灭人类的世界战争。

而中国的武器制造企业正在上市，武器出售得越多，其股价飙升得越高，这对军力扩张是一种刺激，却与儒家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中国经济正在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在该体系中，美国的投资银行正是通过军火销售来攫取巨额利润的，因此由资本投机而导致武力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经济矛盾已经促使某些国家的武器制造商变成了战争的吹鼓手，中国或许也无法对此免疫。我担心中国军方在与之类似的毁灭性军火资本催动下发展自己的军工联合体，从而重蹈英国、德国与美国的覆辙。这样的做法曾将英德两国拖入一战，而且正在为美国挖掘坟墓。

中国十大军方承包商的子公司在提交给沪深交易所的申报档案中表示，有意从其国有母公司购买 200 亿元的资产。从 2007 年至今，上述十大企业的涉军资产已经翻了一番，而且增长势头未减。国家安全支出被计作资产这一现象表明了国防理念的重大改变。这些企业约有 25% 的资产掌握在其上市子公司手中。¹换言之，军火贸易越兴旺，它们的利润就越丰厚。

将军事力量的发展与股市和全球经济挂钩，这一做法与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理念完全违背。毛曾想实现工、农、兵三者联合，让军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参与教育与社会改革的积极力量。尽管人民解放军所采用的体系有某些局限性，但该体系下的军队重视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不会为谋利而制造武器，从而可以避免军事冲突，而美国的军队体系则恰恰相反。

而且中国的军火制造商正在国际市场上为其产品寻找一席之地，美国的先例告诉我们，这样或许会给全球局势的稳定带来风险。中国已经开始向土耳其销售导弹防御系统，以取代之前由雷声公司与洛克

¹<http://www.sify.com/finance/china-s-top-10-defence-companies-imagegallery-others-mjrsA7fjahfsi.html>

希德·马丁公司供应的爱国者导弹。这种获利的机会也许就是中国反对萨德系统却又对签订军控条约这一解决方案无甚兴趣的原因之一。

令中国骄傲的，不该是其巨额财富与大量消耗。中国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已经给国内许多地区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气候变化。我曾希望习主席宣布中国将把气候变化列为国家安全的主要议题，宣布中国将在定义“国家安全”的讨论中起带头作用。报告虽然提到了气候变化，但并没有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而进行经济与文化转型的需要轻描淡写。无可置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经济、文化与生态系统产生空前影响。中国人民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树立榜样，告诉全世界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可以在本世纪展现出怎样的态势。仿效中国的，将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更有美、德等发达国家。

倘若中国继续坚持违背其本土文化的高消耗模式，继续从全球大量采购鱼、肉来满足由广告公司催生出的虚假需求，还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人类的前景将会黯淡无光。如果中国高举“中国梦”大旗的前提是以消耗多寡来衡量成功与否，人们沉迷在纸醉金迷的物质世界，只顾及时行乐，那么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假如中国进一步加强自己与受战争驱策的、由私人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所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就可能会重复美国曾经犯下的罪恶。

中国尚未被使世界深受其害的帝国主义危险传统所侵染，因此作恶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然而我们不该臆测中国没有采用帝国主义经济模式就不会误入歧途。我认为比起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防微杜渐，警惕随中国全新影响力而来的种种诱惑。要杜绝灾难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植根于个人道德行为、可持续模式以及对未来长期愿景追求的优良思想传统加以重视。

那么，在向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行进时，中国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尽管此刻似乎危机四伏，人们几乎都束手无策，但国际秩序将会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倘若一定要预测中国即将扮演的角色，我们或许应当思考利玛窦（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于十六世纪末居于中国，精通中文）在中国处于巅峰时期时所说的话：

“这个国家，疆土几乎无边无涯，人口数不胜数，物资无穷无尽，拥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可以轻松征服邻国，但不论皇帝还是人

民，都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安于当下，毫无野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欧洲人有天壤之别。”²

一个物资丰厚、武力强大的国家，竟然不曾像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与法国那样，发动旨在征服全球的战争，这让欧洲人大惑不解。是中国蕴含于传统中的自信、奉行中庸之道的理念，以及对“谦逊平和”与“适可而止”品格的执着，才使得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诱惑说“不”。然而这也许是中国登上领袖地位的另一种方式。上个世纪，帝国主义已经把美国体系腐蚀得千疮百孔，而中国也许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不受帝国主义侵染的世界秩序。

那么，中国应当怎样让自己的新愿景与世界的未来相得益彰？所有答案都可以在习主席的十九大报告中找到，但我们还得更进一步。我们应当明确保护自然环境要付出多少努力，每天能循环利用多少资源，以此来对人类行为做出评估。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增长”、“利润”等狭隘的概念，找到与现代经济更加契合的观点。

两千年来，中国涌现出大批的儒道哲学家与政治家。建立新的经济体系时，如果能够参考他们在经济与生态方面的论述，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样貌。然而许多中国人简单地认为，存在于二十世纪之前的文化、技术与哲理已经落后，不符合当前的需要。倘若把传统文化比作商品，那么它的价值就在于向人们展示一种状态，让人们怡情养性，帮人们摆脱现代生活的枯燥与艰辛。它是餐厅中的古董，是可以展现着装者个性的服饰，是浪漫的周末假期。但几乎没有人觉得它与我们当前与未来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这样评判中国古老的文明大错而特错。五百年乃至于两千年前中国便有大量关于农业、经济与生态的著作，比起某些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涉及自由市场与无限增长的论述，它们反倒与资源匮乏、气候日益恶劣的今天更加利害相关。人类光明的未来还在世世代代的儒家、道家与佛学思想家们关于农业、经济、伦理与社会的深刻说教中沉睡。

但是，尽管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就读

²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1984年出版，第54页。

于哈佛与耶鲁等国际名校，尽管许多中国人渴望成为现代世界的领导者，但中国尚未开始从根本意义上领导全球。在制订规则、明确思考世界的方式这方面，中国仍在追随别国。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徠曾写到：“围棋有两种下法。一种是精通必胜的棋道，另一种是自创棋路，而后者更为难得。”

虽说中国历史上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层出不穷，但上述“第二种下法”正是当下中国的短板。于美国接受过英才教育的中国官员乐于照搬他们在美学到的一切——尽管他们看到环境的恶化与文明的堕落，看到本就是一种错觉的“现代文明”一败涂地。当下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危机，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却几乎对中国沿袭了三千年的治国与经济理念毫无兴趣。现代西方世界看似花团锦簇，但那里的观念并非出自上帝之手——它们漏洞百出，尤其是它将各个经济要素孤立看待，这一点更是大错特错。

中国需要建立全新的、根植于其传统精髓的经济、生态与治国理念。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可以与新建的中国模式相结合。

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也许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如何对中国传统中有关治国、伦理、实践、教育、农业与社会的巨大知识财富加以重新阐释与应用。汉朝以前，中国即开始制订专门制度，用于进行政府管理与发展引导，处理政务，安排农业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等事宜。中国制度史上，出现过大量针对家庭、村镇、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建设健康社会的政策。要寻找妙计良策，与其向华府表面光鲜的智囊团求助，不如去好好挖掘中国的优良传统——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藏。

中国的治国理念，在唐宋时期臻于完善，但明清时期的许多实例更能直接应用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经济学认为，应该奉行中庸之道，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增长与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要与自然进一步保持有机联系，要在狭义范围内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

江河日下的西方制度有将世界拉入战争深渊的危险。与其在那里寻找未来政策的出路，不如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想象力加以利用，解读儒道释传统思想所阐述的政策、治理常规与伦理道德，并利用它们为中国与全世界建立超越“增长”与“消耗”等毁灭性短视理念的体系。其实此刻这一任务最为重要。

中国发出的信号令人喜忧参半

近日来我在上海与山东稍作停留。这个国家的突飞猛进令我大开眼界——在某些方面，它不仅远远超过了美国，甚至领先于韩国与日本。举个例子。我按照典型的美国逻辑，订了首尔至上海、上海至济南的机票。当时我并不知道短短几年内高铁便已经贯穿中国，使得出行比乘坐飞机更加便利（飞机以汽油为燃料，会大大损害环境）。大家都问我，乘高铁更便宜、方便、快捷——在上海商业区上车就行了，干嘛还要坐飞机。

我知道中国正在飞速发展——较之欧洲，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也是如此。瞧见周围一片片陌生的景象，我甚至有些震惊。毕竟我们这代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中的另类。中国早先是世界廉价产品工厂，如今却摇身变成新文化、新体系与新科技的集中之地，这确实有些令人诧异。

在中国最让我惊奇的是现金的消失。不论在哪里，人人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极为快捷的电子货币。掏出纸币与硬币付账几乎让我觉得很蠢。中国人可以极为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这说明中国也许将成为第一个无现金社会。

而且这里的空气中洋溢着勃勃生机，令我精神抖擞，停不下脚。人们勤奋努力、乐观向上、干劲十足，而这些精神在美国已经不知所踪。是这种氛围鼓舞我竭尽所能地拉近自己与这里的联系，以便能经常回来看看。我发现自己在寻找新的灵感。

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看到鼓吹消费与精英生活场面的趋势愈发明显，这种宣传已经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高调的广告牌，上面画着身处豪宅与高尔夫球场、过着奢侈生活的富豪。这些场景与我 1990 年首次来中国时的所见所闻有天壤之别。当时周围的人都低调朴实，几乎对脱离普通生活的奢华与精英主义影像的宣传不感兴趣。最奇怪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君主专制鼎盛时期的描绘竟然反复出现，有些广告还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刻画为性感迷人的女子典范——这倒不足为奇，路易十六的宫廷在中国媒体上也具有积极意义，是奢华、物质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当代中国的这一侧面让我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氛围要比美国的健康得多，人们愿意为国家福祉而努力，对在政府中为民众服务深感兴趣，因此从政的多是合格人士，这一点与美国大不相同。然而中国城市大力推崇的放歌纵酒、我行我素的消费文化与奢侈生活令我十分

不安。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文化与曾让年轻的我深受启发的伟大中国文化传统相去甚远。

因此当我考虑中国的未来——也就是我们衰弱地球的未来时，与它充斥着喧闹城市的现代一样，它的过往也让我思量良久。然而吸引我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不是晚期帝制的宫苑中那珠光宝气的陈设，而是珍视内敛谦逊的传统、高风亮节的品行，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能给未来以最多希望的中国。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他们正直勇敢、心灵手巧，为使世界更加公平而抗争，这与儒家思想完全相符。我曾经熟读他们的故事。然而我在上海的酒店中所看见的传统中国，却是晚清浮华奢靡文化的具象。

人们都觉得，讨论中国的政策时可以援引美国政府与企业运行在改革方面的实例，也可以参考科幻小说中关于超现代未来社会的描写。然而我们极少提及汉朝与宋朝的升迁制度、明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唐朝的货币与农业方针。

也许大家都认为现代社会已经与传统世界完全脱节，不论是在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样的想法都确实存在。然而人类天性并未经过实质性改变，在气候变化的威胁逐渐迫近之际，重新考量以往的制度十分重要，不该将它们当作过时的事物而统统淘汰。

在美国上大学时，我被告知美国拥有先进的民主制度，而中国是封建、封闭、等级森严的国家——这是最令我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当时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真的以为在进入现代民主世界方面，中国后知后觉。然而我越想越觉得迷惑。中国社会的确存在阶级与身份歧视，但是其考试系统提供的上升通道比许多西方国家宽阔得多。而且残酷的奴隶制还曾经在美国大行其道，剥夺了大批非洲人民与本土美国人的格。这种罪行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甚至今天还有众多群体在遭受歧视。

英、法、德等西方大国也曾肆意推行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在他国乱砍滥伐。中国古时的朝贡制度比起它们的暴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如此，学校还是这样教学生：中国是制度不完善、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西方则发达得多。

如今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腐败盛行，我们发现中国可以真正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中国虽不完美，但有潜力给世界以新的选择，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中国寻找新的天地。

他们之所以被中国所吸引，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潜力不仅可以改变自己，更能影响整个世界。哲学家巴克梅尼斯特·富勒曾这样写道：“要变革现有框架，不必在有问题的模式上下功夫，只需建立新模式、淘汰旧的即可。”我想也许可以凭此预测中国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凭借积极的行动与丰厚的历史底蕴，中国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足以作为其建立新模式的基础。现有框架已经开始动摇，而中国的形象却愈发鲜明。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这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必然。当今世界，‘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陷阱’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生，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葛兰西关于其所处社会矛盾的论述：“危机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这样的现实之中：老的行将就木，新的无法出生；此间歇期内五花八门的病症层出不穷。”很明显，西方旧的治国与经济体制已经死去，然而我们尚未拥有可供替代的新体制，甚至没有就下一步有效举措达成共识。渐渐地，这一真空地带被唯利是图的企业占据。我们眼前是一种堕落的文化：诉诸于大脑最低级的功能（比如贪婪、产生性欲等），以求获得某种与伦理道德或切实需要无关的回应或者物品。这种空虚的文化正在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片荒漠：人们脸上挂着笑，彼此却离心离德，即便家人间也是如此。要摆脱这种文化，我们最好求助于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传统，对其加以重新阐释，应用于当下。

关于社会主义

上周的讨论揭示了中共领导各种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习近平主席的开场词中蕴含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要务的考量，以及他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的、关于直面社会矛盾这一任务的论断。然而习主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表达与毛泽东著作强调的“阶级”一词迥然不同。习似乎是在发挥社会主义传统潜力的同时复兴伟大的儒家传统——尤其是孔子的启示：“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共最大的任务或许就是稳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动摇的内涵。自邓小平提出该概念时起，其意义便被阐释为：坚持毛留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同时引入市场经济，积极接受外资。但实施这些

政策的代价不菲：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环境也遭受到巨大损害。中共也许应当考虑可在何种程度上将“生态文明”（该概念是对可持续发展型和谐社会的展望）与中国文化（涵盖艺术、文学、治国与全面管理等方面）的巨大潜力纳入“中国特色”。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问题也许是晚清时期对儒家传统误解的结果。对传统思想的不断解读与政策的不断制订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而中共将史无前例地迫切需要针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展开思考。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重拾其在鸦片战争之前所拥有的经济地位，文化与科技方面的主导地位也在逐渐加强。这意味着中国在外交、经济政策、安全与教育等方面的范例将逐渐成为全世界的标杆。

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十五年前，中国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就像源自远古的神秘遗迹一样被人忘却。然而今天，全世界都目睹腐败在西方金融系统肆意蔓延，美国、日本与韩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更让人触目惊心。此时此刻，社会主义思想在治国与经济方面的内容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中国所拥有的潜在力量。

对消费导向型经济进行严肃批判的传统，俄罗斯已经丢弃了大部分。而且，尽管众多政经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对活跃于日本、欧洲甚至美国的危险政策反应强烈，如今他们也被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所取代。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能认识到西方经济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自己的信仰里儒家思想占大部分，道家思想与人道主义掺杂其中。但我对百家争鸣式的、能够拓宽年轻人思路的讨论持欢迎态度。对我们来讲，马克思社会主义传统价值非凡。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怀期待之际，让我们先来思索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实验的最大缺点。其实例包括巴黎公社以及俄国与中国的革命。

之前的社会主义实验都秉承根植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念的唯物主义政治学与经济学方法。它的价值在于可以撕下幕后势力的伪装。但可惜的是，这种关注生活物质层面（人们生产多少、消费多少）的方法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精神层面，有将人类降格为物品的危险。人类文明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同样重要。实现了高度正念与心灵觉醒的人，只需要少量生活资料就能心满意足。通过生产与消费水平来看待自己也许极为孤独，不论拥有多少财产都形单影只。

中国传统治国与教育理念不仅阐明了制度如何运行，而且提供了实现社会全员道德与精神发展的方法。如果能将这部分传统思想（儒释道思想）有策略地加以利用，未来将大有改观，具有无尽潜力。而且我认为儒释道三个流派的学说多涉及精神层面而非宗教教义。我还想说，破坏许多宝贵成就、加剧贫富不均问题的消费型社会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年内崛起，是因为人民的精神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还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大部分内容都以该假设为基础：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发展的结果，作为最终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论断的部分内容表明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都是向更好世界变革的要素。比如工业生产、货币经济、城市化、被驱离农业生产的城市工人举行起义，这些因素在向社会主义行进的过程中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积极意义。

然而现代社会的部分矛盾是脱离传统人类群落理念的结果。该理念将家庭美满、邻里和睦奉为最高价值，而且认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自然界力量的流动（风水）对安乐健康十分重要。现代化之前，人与自然尚能和谐相处。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我自己，社会主义与所谓的“进步”概念是否导致了这种更为宝贵的和谐感的流失？现在把传统打上“封建”的标签是否为时过早？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自有其逻辑性与合理性。有些已与现代脱节，有些则在我们面临城市异化与环境恶化的今天更加重要。我们应当清楚，我们所谓的“新世界”以工业生产为基础，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类活动价值的标准，而贸然通过以这样的新世界取代落后旧世界而建立的“现代化”，其潜力极为有限。如果能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植入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将受益匪浅。现代的我们需经历多方面的复兴。我们应该追本溯源，同时将那些属于本源的东西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移植到现代体系上，通过这种融合发掘新的潜能。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系统所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忽略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尽管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财富分配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但没有将地球的长期健康问题予以足够重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都只有用于衡量人类经济健康程度的体系，没有评估环境健康程度的方法。环境状态评测方面，目前我们仍旧缺乏像 GDP 和利率一样、在全国层面具有权威性的公认体系。如今我们急需这样的体系。至于论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强调和谐发展的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找到。

在无尽的消耗与增长问题上，与习近平倡导的“生态文明”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将会在挑战华盛顿体系、为世界提供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上有怎样的表现，将是我们衰弱的地球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其解决措施不在于进一步引入科技、推进现代化，而在于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相整合，铺设通往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篇

中国的未来需要创新社会回归优秀文化

革命已经大行其道了吗？

近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韩国某银行发布的广告，其中“革命”（hyeongmyeong, 혁명）一词被反复提及。这个具有极左意味的词语在当代韩国大行其道，这实在令人诧异。

如今，尤其在社会、经济与科技飞速变革之时，“革命”一词的确切意义究竟为何？

那则银行广告中的“革命”一词暗含这样的意味：商业模式的迅速转型为相应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体制的信心。

近几年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企业、政府出版物与研讨会中最具热度的话题之一，而“革命”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与之息息相关。这种语境下的“革命”，意指由史无前例的科技发展在经济领域所引发的深刻变革，暗示这种革新会给有准备的人带来巨大机遇，而对新科技一无所知的人却将与成功无缘。

还有“烛光革命”——韩国民主党用来描述迫使前总统朴槿惠辞职的民众抗议活动。这种提法暗示该活动与法国大革命一样，可以引发政治秩序的深刻重组，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面对财富过度集中等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当前政府乃至整个政坛仍束手无策；他们甚至不愿意提及“气候变化”这几个字。如此种种，表明所谓的“革命”无非是一场政治宣传，绝非现实。

韩国还有“果汁革命”（쥬스혁명）——首尔商业区一家时尚饮品店的招牌。在他们那里，“革命”不过是一时新鲜刺激的代名词。如此看来，“革命”已经沦为一种噱头，一种旨在猛力冲击民众体验的营销工具。

媒体动辄提“革命”，许多正在经历经济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的韩国民众不免质疑民主过程应对现有挑战的能力。关于“革命性变革”的种种讨论由此而引发——即使并未直接套用“革命”一词。

二十年来，韩国的政界人士分成两派，针锋相对：保守派渴望重温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而进步派则主张主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实现社会变革，使社会环境更加亲和、公平。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保守 / 进步两方的分庭抗礼堪为反常。

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政坛上一直是保守派、进步派、革命派三足鼎立。那时的革命派将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彻底重建视为实现一切真正变革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在行将就木的政治

框架内，根本不可能达成进步性转变。

朝鲜战争过后，上述政治观点在韩国主流政坛中销声匿迹（尽管朴正熙与现在的文在寅总统相似，都喜欢把改革称作“革命”），但在朝鲜政治圈中仍十分强势。当时韩国大学校园里的某些活动人士也抱有革命派观点；他们无法与主流政坛交换意见，希望推翻已有体系。

那么，“革命”在将来会有怎样的涵义？朝韩两国重塑革命性政治体系的可能性不可小觑——尤其在大批民众觉得现行体制死板僵化、运行低效的当下。

同时，美国治理体系的彻底崩溃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过程方方面面的深层质疑——要知道，美国对韩国民众的自我认知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

韩国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迫使人们对各种设想提出疑问，上述质疑也随之而生。一方面，我们处于全球性经济崩溃的边缘，这次经济危机可能比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还要严重。它不仅将导致财政窘迫，更会激发这样的疑惑：令经济体系植根于企业利润、拘泥于国际贸易、依赖于进口矿物燃料，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另一方面，与朝鲜密切接触的势头已不可逆转。朝韩两国有极大可能在寻求统一的道路上实现繁荣发展，但我们也将面临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挑战。

朝鲜或许在制订产业政策、开展农耕方面较为落后，但是精通治民之道，善于将族裔民族主义与革命性政治体系紧密结合，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即使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这个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蕴含于核武器之中。

还好，韩国没有像美国、日本、匈牙利与波兰那样采取“韩国至上”的政治动员策略，广大韩国民众仍然希望遵循全球准则。但类似的激进运动很可能会因朝鲜半岛的经济困难与体制的崩溃而抬头。

足不出户的分析师们认为，实现韩国社会的变革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然而进化生物学和地震学——当然还有历史学——研究结果均证明，政治体系发生灾难性变化是常见现象，尤其在该体系的有效性似有还无之时。

在未来数月，朝韩两国的民众需要善用想象力与良知，保证自己做出正确的决断。我们必须谨记：“革命性变革”并不总是华而不实的广告语，它也有“表里如一”的时候。

2018年10月31日

公交车上播放的一档充满恶意的节目

这几天我都是步行回首尔的家，不想乘公交车。每次我一登上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就得硬着头皮观看司机座位后方电视上播放的节目。这些节目既没有就韩国历史展开深刻探讨，也没有针对公众理应知晓的重要时事进行播报。被推送到我们眼前的，只有一个个展示煎炒烹炸的“精彩”镜头，紧接着是如此荒谬的画面：一个男人（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忙不迭地把硕大的饺子、饭团、三明治等食物塞进嘴里，把一同参加这个疯狂节目、坐在他身边的人逗得乐不可支。

听说中国的自媒体平台也充斥着类似的视频。

我不知道自己因何会为这样的画面而深感不安。或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我们普通民众只是搭车代步，却不能不看这种空洞洞、赤裸裸的作秀。从道德内容的角度来看，这种节目无异于色情片，其目的是以荒诞方式唤起观众的食欲和非理性本能。

我之所以觉得这个节目充满恶意，也许还因为它在向观众公然宣传铺张浪费，仿佛毫无顾忌地消耗食物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这个年代里，我们的地球上还有许多人在忍饥挨饿，大片曾经肥沃的农田化为沙漠，海洋也在慢慢地失去生机，这一切都让每一颗粮食变得弥足珍贵。然而这些节目却蒙蔽了真相。

我们应当鼓励人们珍惜每一粒米、每一滴水。将暴饮暴食作为噱头、让他人来效仿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节目与俭以养德、爱惜粮食等我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背道而驰。

然而，在对此类节目大为不满的同时，我仍旧为表象下的悲哀事实而怀有一丝恻隐之心：那个不管不顾地往嘴里塞饺子、饭团、三明治等食物男人，似乎是在拼命填补极为空虚的灵魂。

其实，他与我在公交车上看到的许多人别无二致：他们捧着智能手机，沉迷在自己四处搜罗来的游戏、音乐视频、时装图片与情色小电影中，似乎想用这些内容来填充我们文化中怪异的真空地带。

我仍然记得中韩两国都有过这样的时光：公交车上的乘客大多读书看报，想要切实了解周围的世界。而如今，人们却几乎毫无例外地陷溺于感官之娱，任社会被乌云笼罩，哪怕街道上的灯火再辉煌璀璨，也驱不散乌云下的黑暗。

近些年来，中国与韩国的每一家餐厅，几乎都公然把大幅的美食照片悬挂在室外，似乎言语并不足以招揽顾客，一定要用画面来使行

人垂涎三尺，催他们快快进门。

还记得 1995 年我初到韩国时，并没有见到这样的图片。当时还没有必要迎合人们最底层的本能。

我当然还记得第一次去中国时，听见主妇们讨论菜怎样买、怎样做给家人吃的场景。当时，人们尚认为做饭做菜是“家庭”这一概念中所体现的伦理系统之一环。

但当下这种以暴饮暴食为乐的怪诞常态与上述珍贵的文化毫无关联。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食物来之不易，绝不能随意糟蹋。可我们的社会却渐渐渐远。

我在公交车上见证了韩国形而上学的崩溃——中国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体验最为重要的方面，如儒家经典所倡导的“德”、“忠”、“孝”等价值观，以及邻里之间的互敬互爱，是无影无形的。

然而今天，我们被各种声光形色包围，而我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却被夹在手机屏幕与人类不受自觉控制、兀自对夸张画面做出本能性反应的脑干之间，日趋枯萎与扁平化。

这样的视频根本无意于通过影响负责逻辑推理的大脑前额皮质来传达各种事实、探索道德的复杂性，只顾刺激杏仁核，使其产生欲望。我们丢下了书籍报刊，不再努力挖掘深埋在表象之下的真相，转而共同投身反智文化，无法自拔。

民众对核战争威胁、气候变化、飞速进行的财富集中等危险趋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是上述反智文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不要说当代社会，哪怕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再采用严谨可靠的科学手段去分析研究。

科技仍在进步，但它没有促进文明的发展，只是一味地刺激我们的大脑，使其丧失自觉做出道义抉择的能力。铃铛也好，哨子也罢，科技成果或许可以激发人的喜怒哀乐。但是，倘若失去了借助科学来了解世界的能力，我们终将迷失。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们十分有必要控制、约束自己的欲望。在目睹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迷失于声色犬马的当下，我认为，我们或许不该把“克己复礼以为仁”等以往的行为规范视为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道德义务。

2018 年 9 月 18 日

消费文化助长的社会不公

距我所乘坐的航班驶离仁川机场还有几个小时时间，于是我走出候机大厅去买钢笔和笔记本，好记录突然迸发的灵感——以后写书用得到。然而周围没有一家店铺卖。目之所及，都是充斥着昂贵的品牌服装与华丽手袋的商店，顾客寥寥无几，女店员衣着呆板、百无聊赖。除去几家名酒专卖店，其余店铺的橱窗中所展示的，要么是名贵腕表，要么是高级香水、化妆品或者高端电子产品。最后，我终于在一家书店的角落里找到它们。

我在定居于首尔之前，曾从这里乘飞机去美国。跟那时相比，仁川机场已经面目全非。那时的它，还不是将奢侈品消费奉为神明的庙宇。现在的情况很不对头。

然而，如果我们把机场单纯地放在经济与利润的框架中考虑，这一切就没什么说不通的了。一旦有哪个无聊的富豪旅客买下一只名表，一件大牌时装，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就会远远超出向普通大众销售笔记本、水果和太阳镜所能获得的收益。其结果，就是机场文化同信仰渐行渐远。机场已经变成了纵情消费与倦懒生活态度横流的圣地，而我们却不得不在其中穿行，任自己的价值观遭受扭曲。

我在仁川机场经历这一切之后不久，一次我去首尔某博物馆中的咖啡厅歇脚读书，发现镶木桌子上有本杂志。拾起翻阅，发现这是一本中文的时尚杂志，里面满是五彩斑斓的照片与辞藻华丽的短文。很明显，其目标读者是富裕的中国游客。它主要介绍了经由当代设计师增添了现代元素的传统女子韩服，这样一件衣服显然价值不菲。真正令我深感震撼的是那些模特的样子：她们身着华服，慵懶地倚在奢华家具上，摆出各种极具暗示性的姿态，神情倦怠，显得那样地懒散不羁。她们似乎是在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背景中那一座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豪宅让人觉得拍摄者是在向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致敬。

起初韩服之所以备受推崇，绝非由于它是颓废、慵懶的象征，而是因为其低调、阴柔的内涵。这一传统正在经历整体变化，以迎合少数中国富有游客的口味。如果我们把韩国文化的健康放在一旁，就不会觉得这本杂志有什么不妥。它带来的好处是，哪怕只说动一名中国富豪买上一件豪华韩服，由此产生的利润比出售几百本介绍首尔历史与韩国传统说唱“盘索里”的书籍高得多。

我们一打开电视，各种韩剧就会涌到眼前，那些作为拍摄背景的

豪宅，绝大多数韩国人其实并没有机会步入。在高档咖啡厅中讨论韩剧中悲惨的爱情故事已然成为韩国人的日常。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依然记得，曾有那么一段时光，电视剧与广告都以普通中产家庭为背景，高调炫富会令观众大为不满——在美国如此，在韩国更是如此。



在便利店中打工的女孩子们辛辛苦苦地站了一天，空闲时却要受这些画面的蛊惑：要过时尚生活就得有钱，就该像那些懒散的模特一样——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如果对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视而不见，只会导致更为急剧的分化，最终引发剧烈矛盾。我们的文化正因财富集中而变得扭曲，这一问题的危险性不可小觑。可以肯定的是，倘若不着手加以解决，我们就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未来播下政治激进主义的种子。

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前人是如何打算以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等极端的人为方式解决上述问题、建立他们所谓的相对公平的社会的。他们的做法过于极端，导致了后人的强烈抵制，其结果非但无益，反倒是破坏性的。

在处理社会与经济平等问题上，儒家学派秉承的方法十分巧妙，眼光也更为长远。尽管历史上以儒学治国的朝鲜王朝的确存在封建压

迫阶级，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当时的君主与权贵家族“两班”也力行节俭，绝不像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那样挥霍无度、穷奢极欲。

儒家学说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论。世宗大王等该理论的拥护者都对社会不公平问题相当重视。针对财富不均问题，他们所探索的绝非权宜方案，而是长久之计。

《大韩民国宪法》前文结合儒家思想，对机会均等问题也做了明确阐述。韩国宪法中有这样的表述：“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每位公民都享有均等机会，不论男女，都应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位公民都应履行随其享有的自由与权利而生的社会责任，保证国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那种源于财富高度集中、使社会文化产生扭曲的做法无异于违宪。

倘若继续一味地向某些群体灌输金钱观念，不及时解决造成种种社会差距的不公正问题，国民就会对政府产生不健康的心理依赖，这对建立稳定的社会有害无益。同时，我们还应当为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创建健康的文化。然而，关于从何处着手创建此种文化的讨论尚且没有开始，毋论其他。

2018年8月20日

媒体不应仅仅迎合受众兴趣

笔者曾询问一位记者朋友，为什么近来深度调查报道急剧减少，而关于美食、时尚和政治人物的八卦新闻却大大增加，社会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状况？在笔者指出最近的新闻报道缺少深度后，这位朋友马上反驳说，现在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耐心去阅读长篇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消费者喜欢有趣且篇幅不长的报道，而对于详尽的深入报道则很容易感到厌烦。

我认为他的看法是错误的。民众缺少阅读长篇新闻的耐心，不愿浪费精力仔细查看详细分析社会变化的细节报道，即便在当下确属事实，也不能说明这一事实永远不会改变。而如果年轻人真的连如此程度的耐心都不具备，则说明社会已面临危机，甚至已经病入膏肓，而我们急需对此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帮助民众找回对复杂事件的注意力以及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民众失去关注复杂事件的能力是一件可悲的事。媒体的退步和普通民众知性的衰退会导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变得更加困难，社会如果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运转也会出现问题。

我们似乎把媒体当成了从事生产新闻产品并设法获得消费者青睐的生产机构，媒体追求的目标也逐渐朝着生产出迎合读者喜好的产品并从中获利的方向倾斜。可是，在媒体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中，利用传媒产品获利应当排在最后一位。媒体应当承担起向民众介绍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世界各地见闻的角色，新闻应当关注的不是某位名人的个人生活，而是向人们介绍某些主要事件的历史背景，介绍相关机构的结构和性质，并对陌生的术语做出解释，帮助读者理解。

媒体应将充足的时间用于报道当前社会问题和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引导民众拿出必要的耐心关注对此事件进行的深入讨论，营造思辨的社会文化。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总是想当然地假设读者知道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但实际上，这样做并非正确的报道态度，很多人对这些国际组织的角色和作用都只是一知半解。

我们应当为民众营造一个可以从容阅读并进行思考的社会文化环境，创造一个重视深度解读各种热点问题的氛围。媒体应引导读者主动挑战在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努力营造一个反智主义不过分当道、人们可以深入思考复杂事件并适当进行精神活动的社会

环境。

民粹主义并非政治人物所创造，它根植于人们对事实漠不关心的态度和不经思考的从众跟风心理。媒体对政治、经济事件的即兴式反应导致民众无法理解社会变化和政策形成的微妙影响因素。一旦政治领导人因此感到需要通过媒体去做秀的压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将变成一种做秀活动。

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引导民众的注意力回归重要事件。首先，媒体应当让民众看到在良好教育的影响下拥有思考与思辨能力的人们围绕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辩论的情景，让广大年轻人看到，生活的价值并不只是追求财富和权力。我们应当拿出充分的耐心和勇气将真实的现实世界展示在人们面前。英国作家爱德华·福斯特曾说“人生需要勇气，否则人生将不再有意义”。

为了营造有利于人们进行深入阅读和思考的社会风气，即便是需要削减智能手机和网络社交媒体的功能，我们也应毫不犹豫地动手去做。比起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据更大份额，增强人们理解社会复杂的热点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媒体不应将读者视为一个智力尚不成熟的孩子，而应该创造环境引导读者参与理性对话，加强对营造健康社会环境的关注。媒体如果被一时的趣味性所蛊惑而无法看清当下时代的问题，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2018年4月6日

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是否过于冷漠？

虽然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但我并未在中国任教，而是在韩国的大学教书。我带的本科生几乎都上经济学课，可能中国的本科生也是如此。这真让我羡慕。遗憾的是，我以前没有机会学经济学，如今在这方面也没有底气。所以我有意在韩国与东亚史课堂上问学生一些经济现象方面的问题——我是真的不懂。

具体问到经济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时，有件事让我对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心生疑虑：我发现自己读过的经济学资料竟然比上过几年经济学课程的大学生还多。我问他们经济理论的基础知识有哪些，而他们在“经济学”课上不仅没读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与约翰·凯恩斯的主要作品，甚至没有接触过托马斯·皮克迪等当代经济学家的论述。

我深感诧异——就连身为文学教授的我都读过上述理论家的部分经典作品。一个学生这样辩解：经济学教材上有介绍重要经济理论的短文。他们上的经济学课，主要是教学生如何利用高等数学解决特定问题，但丝毫不涉及经济学的实质。

从利率到赤字，再到通胀与价值，经济学的方方面面都同自然法则、热力学第二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列在教科书中。要是有人觉得学生只需要计算，不通过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调查（更不用说科学调查）就能证实那些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观点，这种想法简直荒谬至极。

我在与学生展开的交流中重拾了信心。毕竟许多思想家已经拿出极有说服力的论据，说明经济学的“法则”只在最狭义范围内存在，而且“经济”这一概念具有文化特异性，同时受政治与人类实践影响；因此与文学和艺术史一样，经济学是一个领域，更是一门科学。

我认为经济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是对该学科的哲学原理与历史渊源加以介绍：历史上，人们对社会、国家、货币与商业的想法如何演变，以及上述元素如何互动进而形成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除此之外，还应该讲解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讲解不同时期经济的概念有多大程度的差别。

此外，关于金融与商业行为伦理意蕴的切实考量也很重要。经济学与星体学不同，与政治学类似：都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学科，涉及到价值判断，需要对其功能与结果进行道德上的评判。

关于经济伦理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奇思妙想。从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到东方的孟子，长期以来，大量学者都认为经济与政治的道德元素十分重要。我不知道怎么能把对经济的研究与关于道德哲学的深刻思考割裂开来。

中国也有自己伟大的经济学传统，在儒家经典中体现得尤为有力，而且其问世可能比西方更早。大学的经济学课本里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介绍，但是宋明清已有不少的学者从事经济学研究。今天的“经济”这一概念，本来就不是像运行中的机器一般跟伦理毫不相关的东西。经济就是经世济民，是指怎么管理社会从而帮助人民获得富足与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说，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是一种道德信念。

如今中国跟韩国正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学生们仅凭在经济学课上学到的各种计算方法根本无法应对。不论是全球贸易系统崩塌、陷入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据认为这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还是贫富差距的加剧，下一代人所要面对的严重问题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要素，仅用数学方程式是解决不了的。韩国的大学把经济学当作微积分来教，恐怕是一件舍本逐末的事，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数字”排序下的社会现实

每当我听到中国学生说他们担忧未来、说他们“对以后该做什么事感到茫然”时就感到无比痛心。未来他们能否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是不确定的。而更让我感到焦虑的是，某种遮盖于日常表象下的无形力量在不断地冒出来牵绊着他们。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做好认可他们的价值的准备，要知道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理所应当得到这样的认可。

社会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遵循这样的逻辑，那就是：事物的价值只有用数字进行排序后才会得到认可，这似乎成了一条不能违背的法则。人也不得不遵循这样的逻辑，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被转化成数字，以确定他们在某种人为的排序下的位置。但是，这种排序具有一种远离我们日常经验的客观标准吗？事实上，任何一组所谓客观的数据，都只是对事物的某个方面的一种反映，并不是对事物整体的反映。

生活在这种数字治理下，对人们做出判断时考虑的不是他们与周边的人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日常活动对我们的文化和组织有何贡献，而是用数字来确定人的价值。比如，我们经常 would 问“卖了几台 IT 设备”、“发表了几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论文？”、“检修了几辆汽车”等等。

这样一来，数字成了确定价值的最终决定者。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贡献，只要不能加以量化就不会得到认可。在这样的价值判断系统里，我认为学生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并不知晓社会内在竞争的残酷性。极其复杂的人类经验、家庭成员或共同体、自然界与“我”这一个体之间发生的本质上非常微妙而又多层次的互动，不断地被以排序的方式表示出来。这种单一的数字被用来表示个体、组织甚至整个国家的价值。

在社会的基本意识中占居首位的是经济。经济只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或出口之类的数字来定义。其次是技术。然而，我们在表示技术的重要性时使用的却是销售额或利润，仍然是数字。技术对社会真正产生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并未受到重视。

文化在“排序序列”中处在最底层。文化竟然被看作是丰富个人生活的活动或周末放松的休闲。最终是文化在对我们做出定义，是文化设定我们的价值、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如果我们在关注统计的同时忽略了很微妙抑或很细腻甚至有时很模糊的文化的本质，那么哪怕今后

我们能够走得更快一些，也必定会丧失对前途的控制力。而且，我们也将无从知道要走向何方。

像这种企图以人为的方式通过数字对社会上的许多价值进行排序的做法，其根源是什么呢？诚然，如果任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价值做出判断，就必然滋生腐败。可是这种简单的排序并非好的解决方案。想要切断腐败并且不陷入这种简单的排序，就需要有一种比数字式评价更客观的标准。然而，这种对于人类经验的二次元式接近法使人类经验“标准化”了。最终，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奈。

作为一名教授，我对通过在小范围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价教授们的学术成就的事实感到惊讶。只是以论文数量作为评价依据，而对于教授们撰写的论文的价值和意义，却完全不予以考虑。他们作为专家、同僚、市民、作家或哲学家在做什么事则不在关心之列。写了几篇学术论文可通过计算机简单地查出来，然而能够对某一教授所撰写论文的重要性和意义做出评价的人，只能是对这些工作非常熟悉的人才能胜任。

学生们的处境非常糟糕。他们复杂的个人经验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变成了“specs”（指出身学校、学分、英语考试成绩等）的汇总。大蒜必经蒜臼捣碎的命运正在等着他们。悲剧不单单是学生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年轻人的自身价值得不到应有评价是更大的悲剧。应当询问他们的追求是什么，而不是他们在某一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应当帮助他们寻找自身的价值；应当询问他们“对于你来讲什么才是根本价值？”

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复杂而又细致的方式去理解人的价值。不过，应为此去构建一种不以货币单位来定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想对所有人的经验和贡献做出完整评价，就必须去构建这种长远的人际关系。

2017年6月26日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7年第8期

朱子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危机

人类的需求被过分夸大了，这是错误的幸福观导致的结果。刺激需求、激发需求、创造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味地朝向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方向，如今已面临诸多难题，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深层的原因是，人的道德的丢失。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无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回到朱子学传统中，去寻找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

朱子学也称新儒学，是南宋朱熹（1130-1200）明文规定的哲学体系的统称，后来成为中国统治王朝的理念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新儒学将早期儒家教诲与自然、政治以及伦理融合在一起，为创造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观，而和佛教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用语相结合，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接近方法。

从新儒学的视角来看，世界是一个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以达到获得最高的特权地位。新儒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正式教育的基础。或许可以说过去数百年间我们最大的失败便是缺乏这样一种能力，那便是对伟大的新儒学传统重新进行诠释，使之能够迅速适用于当前时代的政治、教育、道德以及法律。

实际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为新儒学传统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严格而不知变通的儒家社会秩序，即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新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文人陷于由新儒学传统的模糊思想推出的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抽象而非现实的观念之中，抽象地谈论道德与孝悌，忽视了实用学问。他们不再关心简练的治国方法，不关心为提高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技术。这些人以读书度日，对社会毫无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落后状态。

隐藏在上述想法更深层次的观点是，认为西方文化与制度（位于政治或伦理深层的哲学，以及17世纪以来在欧洲不断发展的科学和逻辑学的接近方法）既是卓越的传统，也是近代化的一个核心，同时是通往文明的必要而积极的阶段。

然而从整体上看，18世纪之前，在中国发展出了远比欧洲复杂、微妙的舆论平台，政策过程也更为和平，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进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国更加重视文字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文盲

率远高于 19 世纪欧洲的文盲率。由此看来，文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高。但是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意味着具有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

直面时代的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掘出适用于今日社会、同时与今日社会相关的诸多新儒家传统所蕴含的丰富财富。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已逐渐变得不可持续，处于过度消费与欲望冲动的恶性循环的边沿，无法展示出人类共同的蓝图。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严酷的现实：

第一，西方传统在道德层面的崩溃。尽管西方将先进技术（比如蒸汽机或高水平航海装备等）与有利于政治的精简机构（尽管也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相结合，在鸦片战争时期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使得人们在所有领域重新深入地思考文化与制度，但是在今天那种氛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世界大量地生产出漠不关心文化、科学与伦理规范的强大的极右势力，这些极右势力采取不理智、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新文化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呼吁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本能这一低级政治短见。如果还有其他什么的话，那只是西方文明逐渐和更为彻底的消费文化、叫嚣着的世界大战的观念以及急剧增加的鸡毛蒜皮、萎靡不振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何在中国近代化遭遇失败，而法国、英国、德国却在 19 世纪实现飞速发展？假如我们阅读有关历史资料，这时才会发现与中国的相对和平状况相比，西欧国家显得更加不确定，更加残酷和野蛮。

针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些能够为未来优先制订计划的新文明，探索其根源却是在中国。而且最重要的是，心、伦理以及政治能够最有有机地结合的地方正是来自于有着新儒学传统根基的国家。

通过重新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可以找寻出接触政治的新方法，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活性化，并能够为西方输入充满灵感的新儒学传统。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一个应对给现代政治学造成严重危害的政治或极端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毫不逊色。

现代社会面临着精神上的荒漠，人们及时行乐，道德常识匮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即我们要么放任自己处于虚无的真空状态，

要么助长或煽动自己进行无意义的消费，我们在两种状态里徘徊。这看起来只是表面的问题，实则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因为它削弱了我们试图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努力，最终使社会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其原因在于我们只能提出技术的、公式般的解决对策，而无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内提出现实可行的精神方面的应对方案。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今天我们围绕管理与政治展开讨论，但是这些针对“改革”或“领导能力”的陈腐讨论，既同我们的实际经验相违，更重要的，又未能分析出这个时代在心理上、精神上面临的挑战。

尽管新儒学将焦点置于精神层面的自我修养上，但是它显然不同于宗教，而是与政治或实用的管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使得新儒学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财富，这是因为新儒学摒弃了现代宗教的自我放纵及其他世俗性特征。新儒学不具有排他性，不主张必须放弃其他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反而起到将在现代社会被错误分离的三种因素——自觉、人伦与善政结合到一起的作用。

新儒学传统在精神层面上的这一特性使得它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应对社会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心理冲击与精神冲击，但是从现代社会多元化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克制明显带有宗教性质的举动。在同人类经验直接相关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沟通上，无论在政治以及道德方面，新儒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新儒学传统中，政治或人际关系不是或者无法成为有效的、单独的问题。然而政府运营、机器运转、社会关系改善的方式常常成为伦理方面的问题，常常假设包括所有成员之间互相的体系性献身，因此在儒家的体系内，所有事情都不存在单方面的消耗。

新儒学传统令人惊讶地为我们揭示出技术高速发展条件下社会所应当遵循的某些方针的指引。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技术是如何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原因在于技术革命对我们认识的一切手段产生着影响，技术甚至在我们实际无法看到的非常原始的水平上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影响。

为了有效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需要领悟隐藏在一切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的形而上学的道理。新儒学传统包括了人类社会应对技术革命的策略与方法，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传统所没有的、在讨论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长期计划时所要求的模式（解决方法）。

我们生活在通过电视或网络再现的影像占据支配地位的数字化时

代。我们处于最肤浅地理解这个世界的阶段(与任何一个潜在的原则或者形而上学相比),世界由于数字化革命而变得平凡。我们所不具备的,是对隐藏于我们所观察的一切现象深层的形而上学的感知力。

迄今为止一直在弱化的我们的这种现实经验,在新儒学传统中已经被准确地、有效地加以说明。对同事物表面不一致的内在道理予以关注,对世界运转法则予以关注,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在事物的表面被视为全部的今天,这种洞察力不能不认真加以提升。

新儒学传统确切地向我们揭示了认识世界的方法应当是观念性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同时揭示了我们应该如何锻炼身体以获得来自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知识绵绵不尽的启发。技术革命通过将实体处理为数字化形象,再对形象进行修剪、变换与强化,无形中干扰了客观世界原有的图像,在认知世界的问题上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并且让人们形象产生了过多却没有丝毫益处的依赖。

新儒学传统中包含着相当普遍的适用性,可以不费力地直接加以运用,前提是我们有这样的内在需求,当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当我们在制定政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回到新儒学传统智慧的海洋。

堕落带来的挑战

我们如今面临着以下几个严峻的事实。对当今社会威胁最大的不是恐怖主义、经济停滞或者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堕落在我们的文化中的蔓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即人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漠然地沉迷于美食、美酒、性、娱乐、休闲和游乐。人们生活的目的在于眼前的满足,牺牲精神早已从人们的价值领域中消失。这些都是堕落的典型表现。可悲的是为了创造市场需求,我们做着扭曲的努力,同时我们失去了人类本性的原始力量,将无休止的欲望吹嘘成生命的多彩体验。

我们丢弃了新儒学传统理智、节制、心性,而放任自己成为脱缰野马。人们近于痴狂地沉迷于各种美食带来的味觉刺激,性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广告传播的最佳诉求方式,人们只需打开电视即可看到广告中裸露的女性画面,而且明显带有性暗示,这在 20 多年前不可想象。商家们通过这种所谓的营销策略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然而这也在所有领域导致了大面积的道德沦丧,从而使得政治效力低下。

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有关福利、安全或价值观的政策宣告落空，转而沦落为只是在积累财产、强化权力上有所作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假如社会整体都被这种堕落所取代，那么这种问题根本无法通过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来获得解决。

在这里，新儒学传统同样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如何恢复文化以及良好的习惯，新儒学中记录了很多可行的方法，并且阐明了堕落的属性，给出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最重要的是，新儒学作为道德行为的动力，强调廉耻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一大悲剧，正是廉耻意识的丧失。

在传统社会，一些行为被看作是如同遗弃父母一般可耻而错误的行为，道德义务深入人心，社会接受了深奥的羞耻心的形式。正如儒家有言“君子慎其独也”，伦理意识应当和我们受谁监视无关，而是应该发自内心。

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羞耻心，人们认为只要照顾好孩子或者履行职场分配的工作，便是在按照道德行动。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考虑这样的必要性，即为了社会全体自身行为应当具有的伦理意义，应当考虑由周围人来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

因此新儒学也包括许多有助于纠正被扭曲的教育体系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成了学习本身，不再是具有价值的一项事业，和知识相关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还是处女地。事实上，毕业证仅仅是求职的前提条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只是提高抽象劳动价值的一种手段。

在新儒学传统中，教育本身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道德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纽带大多会成为维持终生的关系。

教与学的所有层面在新儒学传统中被拥有精神意义的“敬”概念所主宰。学习这一行为产生了共同研习的团体，人们在小区也主导了针对我们今天不幸遗失的伦理政治的协议。

认识与环境

新儒学传统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繁忙的消费时代提供许多启示。儒学的实践精神为没有过度消费与破坏自然的冲动、拥有活跃性现实参与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方案。

我们回顾一下儒家曾是如何生活的。他阅读书籍，写信或者写随笔，为了更好地理解经典的含义，背诵这些经典。他使用很少的资源，极为谦逊地凡事亲为。他不需要为了在自己人生中寻找别的什么

意义而去某个地方或者做某件事。他关心内在的原则而非表象，他只需阅读几卷主要典籍便可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巨大挑战，便是减少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享有特权地位的人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有必要摆脱想要拥有好车、居住在大房子里、品尝各种美食的强迫观念。我们坚信自己幸福，却带着过度消费这一悲伤的枷锁。过度消费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也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我们面临着消费文化的危机和它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到新儒学传统经典中，学习儒家学家们为我们展示的模式精神，获得深刻的启示。当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合乎道德规范，由此构成的社会生活才是健康的，才有美好的未来。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大多是由生活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消费过多资源的人们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杜绝过度消费，我们便无法向我们的子孙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环境破坏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时代，我们的行为和围绕在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既缺乏认识又缺少警惕。我们看不清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何种联系，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我们片刻也没有考虑过使用塑料或纸张会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当我们用餐或者坐在咖啡馆内，我们习惯性使用一次性筷子，用纸杯喝茶喝咖啡，对此我们毫不介意。我们从不去思考我们对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对他们轻慢而无礼，可想这已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回归儒教传统的核心，有必要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道德行为这一事实。读书、吃饭或者和朋友交谈等所有行为都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恢复调控我们生活的道德水平，熟悉它的方法，了知其深远的意义，我们便能够创造出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良好的文化环境里，人性也会有相应的健康的表现；人性的健康表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一个良性互动，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基本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重新构建具有高尚的伦理行为、被健康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预期的新文化，从而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7年第4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不问“为什么”的冲动消费

秋季开学前，我去了一趟文具店。在结算台前，我看到一堆包装花哨的糖果、巧克力等。精明的生意人一眼就能从中看见所谓营销点子。

文具店里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出售这些对健康不好的零食呢？糖果与文具没有任何关系，却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糖果既不是来此购买文具的学生们的真实需求，也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店主人依然期待顾客能够在冲动的支配下购买这些东西。

这在15年前简直不可想象。那时中国没有出售糖果的文具店，文具店就是为了向人们销售办公或学习用品，目标非常明确。现在发生了变化。文具商店开始诱惑人们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他们认为，若想在这生意上获得成功，必须诱导人们做出种种冲动行为。

同样的情形在书店也一样常见。原本可供学生们专心阅读书籍的部分位置却摆满了布偶、书包、各种电子产品，不少只是用来玩耍和游戏的。更奇特的是，一些药店摆满了食物、洗漱用品以及各种其他商品。大街上几乎所有餐厅都在招牌上印有美味的食物照片，这都是为了刺激行人的消费欲求。我担心的不是这些广告本身，而是背后暗示的大众消费心理与习惯，即我们接受了这种“新常态(new normal)”。现在的经济并不关注人们真正的需求和社会福利，一心只想激发人们最原始的欲望，鼓动人们冲动购物。人们的心思和创造力都放在了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上面，而且理所当然地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建立在必须以这种方式赚钱的假设之上，至于人们所购买的商品是否是真实的需要，则不在考虑范围内。

如果将冲动和一时的满足当作经济的原动力，其结果是危险的。人们的活动除去满足原始的欲望和虚构的需求之外，将丧失对更大意义的追求。公民将变成无法从自己的行为中找到任何上层伦理目标的消费者，从而，他们的国家将失去远大的发展目标。消费者不会思考未来，对他们虎视眈眈的营业者除了追求利益，对其他事情全然没有兴趣，丧失了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社会责任。

对于经济的这种态度属于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中国的核心价值是忍耐、克制与谦逊，是在节制的服饰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简朴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即使富裕的人家也过着节制的生活。他们不同于欧洲的富人，不是生活在金碧辉煌的豪宅之内。

强调勤俭节约的传统中国人注重节约每一粒米饭，不愿扔掉任何东西。在中国美学中位于核心地位的元素也是没有任何雕饰的朴素物品。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冲动经济的悲剧不仅在于不必要的浪费。问题还在于，人们在生活中失去了询问“为什么”的意识。人们只会盲目跟随别人的行动，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人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最终也会崩溃，认为所有事情都只是偶然发生的，认识不到自身行为与发生事件之间存在的联系。

很多年轻人都置身于被迫消费的压力之中，却自以为是自由的、完全自主的，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消费。他们在社会压力或市场营销力量的挤压下做出消费行动，却无法从消费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随着有意义的朋友与有意义的个人所有物品逐渐消失，他们在社会中愈发感到孤独。

以冲动为基础的经济内藏着更大的阴影。冲动经济容易催生文化颓废主义。颓废主义不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将逐步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区分是非、构想更好的社会以及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出现了退化，丧失了独立思考、行为自控与应对严重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将不再是合格的社会成员。

中国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冲动的行为值得肯定”，激发消费冲动的行为甚至直接就创造了成功。这样一代人会在理解充满矛盾的事实（fact）时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控能力，同时也很难具备区分简单虚构与复杂真理的能力。我们已经置身于丧失对社会未来的想象以及积极实现未来目标能力的危险之中，在不必要的奢侈和致命的被动性的影响下，人们放大自己的感官抑制自己的思考，将逐渐丧失理解能力，只会社会中随波逐流。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12期

深加工食品与土特产食品

上月应邀在中国出席了一个地方性研讨会，专家们齐聚一堂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探讨。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的专家小组进行了长时间交流，会后宣布了一些搞活当地经济的计划。在喊着口号探讨如何创造未来时，我的目光却无法从那些摆在会议桌上提供给与会人员的零食上移开。所有的与会者面前都摆着一个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堆包装得五彩斑斓的巧克力、曲奇饼、糖果等，没一样零食能引起我的食欲。

尽管研讨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发展和宣传地方经济，但摆在桌子上的食品却没有一样产自当地。据我所知，当地有不少土特产，可谓价廉物美，当地人对他们的土特产非常自豪，研讨会正是宣传推广当地土特产的最佳机会，这对生产这些产品的当地农民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想，若我询问与会者的意见，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那些真正能代表当地传统风味的独特的食品。八年前我开始参与一些地方性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很多地方最自信、最值得谈论的东西，总是包括当地的土特产品，可它们很少被摆上研讨会之类活动的会议桌。这是因为，人们以为只有那些由大型食品制造商生产的食品才有资格登此大雅之堂，而那样的食品很多来自其他城市乃至国外，与当地毫无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商家与消费者关心的是“卖什么”而不是“谁造的”。每当走进便利店，映入眼帘的是巧克力、薯片、薄脆饼、富含钠和饱和脂肪的桶装方便面等加工食品货柜。随便拿起一样，都是没什么营养价值的产品。果蔬之类更是难觅踪影。这样的营销趋势正日趋明显。青少年常常是被迫在各种加工食品之中做出选择，他们甚至被鼓动去购买加工食品。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加工食品对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产品根本不能与各地农民生产的营养成分保存完好的土特产食品相提并论。

许多医学专家告诫不要食用加工食品，因为多糖食品与糖尿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联性的事实正逐渐被证实。我们已目睹了摄取高糖食品所产生的后果。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18岁以下人群中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比例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不少。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4.7%的中国人体重超标，2.6%的中国人属于肥胖。最近在访问日本时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便利店内供出售的新鲜果蔬明显比中国多，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当地农场生产的。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好，

能够以中国悠久的高营养传统食品为基础向市民提供真正有益健康的食材。如果规定便利店必须销售当地有机农产品，则无论对健康的饮食生活还是对活跃地方经济都大有裨益。

应当是什么样的食品呢？首先，不应是那些缺乏营养价值却被人们鼓动去购买的深加工食品。其次，让人们去生产有益于健康的食品，教育市民养成食用优良食品的习惯，要远比建高楼大厦或开发最新智能手机重要。深加工食品的价格可能超出食材价格几倍乃至几十倍，只是为了口感与漂亮的外形，不仅失去了食材相当多的营养成分，而且还添加了不利于健康的東西。商家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去诱导孩子们养成冲动式饮食习惯，这是以牺牲至高无上的健康为代价的。

我们应该劝他们细嚼慢咽，应该对生产食品的农民和土地怀有感恩之心，而且强调社会和自然之间恒久和谐的必要性。谈到这些或许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爽，但我觉得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保障市场向人们提供更加健康的食品。政府应制定政策，对面向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出售的加工食品进行必要的劝告，出台售卖食品的标准，这是完全正当之举。政府应给予与食材相关的土特产品更多关注。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食药同源”，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或许正在放任各地土特产食品这一宝物逐渐消亡。

2016年10月24日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7年第2期

秦淮河光影里的忧与乐

最近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其间我让陪同我的学生带我去城里的夫子庙，看看南京的城市景观，走走南京的街道。如果碰到茶馆，我还想进去找个位子坐下来，一边看书一边品雀舌茶。我曾经在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古诗词课上学过有关南京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古老的地标。秦淮河的风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耶鲁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明代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记得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时读过《红楼梦》，里面提到了金陵城的宏伟建筑。

然而当我在现实的南京城里寻找我想象中的南京时，却喜忧参半。夫子庙周边那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房子，甚至一些超过三百年历史的古代建筑都已经被拆毁，取代它们的是西式快餐店和服装店、电子商品城，而这些和我在美国看到的没什么两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依然无法在夫子庙周围找到一家传统的茶馆，更不用说那些古香古色的书店和艺术馆了。

夫子庙不仅建筑是新的，整体风格也十分凌乱，一些细节经不起琢磨，比如里面的家具做工粗糙，展示的书法作品也乏善可陈。更糟糕的是，夫子庙里的讲解文字简单的程度令人吃惊，省略了绝大部分历史细节。那天下午的南京之旅没有让我了解到多少历史故事，和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

因此，那天下午的出行让我大失所望。尽管同行的学生非常卖力地帮助我，但整个旅程仿佛在不断提醒我中国历史的失落。好在此前在中国已经有过类似经历了，因此也倒不至于让我捶胸顿足。真正让我感到惋惜的是中国的那些宝贵传统，比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谦逊、对学问的热情、共同体和互相尊重等，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似乎也即将成为过去时。我已经在亚洲住了许多年，每当看到我曾经学到的中国文化在我眼前一点点被摧毁，我就悲从中来。

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能从亚洲文化里，发现日益颓废的美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优点。记得当我1991年独自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我顺便去过苏州。我偶然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石头碎片，显然是属于一所老房子的。石头上面还刻着古代的字符，我辨认出它们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人们正在拆毁这所老房子，城市规划者们打算在这里新建一幢仿古建筑，以吸引游客。中国的悠久历史就这样被

出卖给了毫无意义的娱乐和消费。司马迁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不惜让自己的肉身遭受凌辱，然而他笔下的中国哪里去了？王羲之、杜甫和苏轼所缔造的中国文学艺术的辉煌到哪里去了？还有孔子、孟子、王安石和王阳明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的传统又到哪里去了？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中国仿佛在向我召唤，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她却向我隐藏了往日的容颜。

我不远千里来中国，寻找亚洲文化的发源地，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帮助我们改变那个由突发奇想的战争和消费所缔造的美国。然而我在中国找到的，似乎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复制。当年是中国的诗歌和绘画鼓励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中国的仁政和生态可持续性是如此让我着迷，而今这里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西方式的盲目消费的乐园。很多对西方文化感到不满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这里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是我上大学后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的原因。今天，西方人前往东方寻找异质文化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都被看作是金钱交易，这种拜金主义以及好战思想的盛行令一些西方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渴望从佛教和儒教的深邃文化传承中看到一线希望，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被中国崇尚节俭和谦逊的传统深深地打动了。即使是那些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追求浪费和炫耀，他们严格遵守传统文化的教育，使自己保持谦卑。

每顿饭吃饱足矣，不追求奢华，这是过去的中国人追求的美德。儒家的学者们用毕生心血钻研学问，写下教导人们遵守道德的经典。然而，现在我看到了怎样的一个中国呢？我看到一些人正在盲目崇拜美国人拼命想摆脱的东西；我还看到中国人浪费掉的大量粮食，然后转头又去买根本不必要的商品。一百年前，不，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如果活在今天，会被他们的子孙们留在盘子里的剩菜吓呆——据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他们生活得富足。这不是我在书上了解到的中国，这也不是那个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鼓励我追求远大理想的中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一个能充当世界榜样的中国，一个能为人类创造新文明的中国，一个能拯救世界的中国。中国有这个条件。他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智慧和深邃的文化理念能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深层次的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话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那是个相当

久远的话题了。当年英国依靠蒸汽机和其他军备方面的突破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打败了中国，用它的先进文明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英国的领先优势并非依靠历史积淀得来，而是凭史无前例的科技创新在一瞬间实现的。而中国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西方人不仅拥有强大的科技，还拥有能够创造这些科技的先进文明和高级的文化，因此为了生存中国必须效仿西方，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思维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十分盛行。

这样的想法是个错误。西方之所以能够领先，完全是依靠迅猛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内部转变，这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与文化无关。西方无意中抢先中国实现了科技革命，这和西方 17 至 19 世纪的历史有关，那个时期西方国家一直处于战乱，战争促进了科技进步。然而西方的优势只保持了大约 150 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非常短暂的时期。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依然崇尚西方的发展模式。很少有中国人能站出来向我们指出，其实中国的文化才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这使我想到了《妙法莲华经》当中提到的“无价宝珠”的故事。有一个人和他的朋友一起出游，朋友送给他一件珠宝，因为实在太昂贵，朋友就把珠宝缝在了外套的里子里。第二天一大早，朋友来不及和他说珠宝的事情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人起床之后也动身出发了。一路旅途艰辛，遭遇了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多年以后，他和朋友再次相见，朋友看到他的样子非常吃惊，并且告诉他，其实就在他的外套里缝着一件稀世珍宝。在这则佛教寓言里，主人公因为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无价之宝，经历了不必要的痛苦。

在佛教里，珍宝象征着觉悟，而今天，这件珍宝象征的是深邃和具有启发性意义的中国文化。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带着一件珍宝，但他们却想不起来。在过去的中国，学者们可以端坐一整天，沉浸在阅读诗书和欣赏大自然的满足感之中，他们不会去制造浪费，没有出门消费的冲动，更没有用钢筋混凝土重塑世界的欲望。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直以来我对此心驰神往。

所幸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光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博采众长，比如应该从欧洲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满足我们当今的需求。这个新的文明将为中国和全世界提供典范。当下，中国适时地启动了“一带一路”计划，准备建立欧亚各国团结与合作的新模式，并邀请全世界参加。尽管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我以为，如果这个

计划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友爱与合作，那么“一带一路”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同时，我们也要认真思考“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如果它是一条“新丝绸之路”，难道它不该遵循同样高的标准吗？难道这条“新丝绸之路”不应该给世人留下像敦煌那样永世不朽的艺术作品吗？难道它不应该培育出像李白和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吗？难道它不应该跨出国门，成为鼓舞世界的新的文明吗？中国人应该完成这样的思想转变，让中国的文化达到新的高度，哪怕这样的目标听起来似乎过于艰巨。然而我想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不迈开脚步，就不知道能走多远！“一带一路”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新希望。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5期。

论孝道

中国有句俗语：百善孝为先。此话非但不俗，而且包含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智慧。孝道何以是善中第一呢？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榜样，第一老师，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先天之善的萌芽与生长，父母是第一影响力。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言行是最优先的言传身教，父母务必树立好的榜样，要配得上孩子的孝敬，这是对父母的自然要求；孩子以孝敬之心促使本性中善的因子健全生长。孝，不仅是对孩子的要求，也是对父母的要求，所谓子孝父慈，就是这个道理。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孝道实践的最基本单位。

孝是在抽象的道德与具体的实践之间架设的伦理体系的核心所在。孝道还将个人部分与公共部分集合起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魏晋“以孝治天下”，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其中心思想是，在家若能尽孝，为国方能尽忠。孝，小而言之可以安家，大而言之则可以治国。这实在是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创造力，绝不仅仅是封建思想的体现。孝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为封建思想所用，并不奇怪，不能因此否定孝道的价值，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哪一部分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孝道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承担什么样的价值？值得我们思考。18世纪，中国人高度评价国人的孝道。中国人认为，对于长者及祖先的尊敬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笔者曾访问过韩国安东的儒教乐园。立体拼图充斥着整个园区。这里用仿佛是从漫画中跳出来的人物，展示着儒教的价值。笔者可以充分理解主题公园展示体验馆的宗旨，但遗憾的是儒教德行的涵养被掩盖，重点放在了吸引观光客的感官上。笔者并没有发现有足以吸引12岁以上游客的内容。今天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内置于孝道中的、对他人持有的恻隐之心。笔者从媒体上看到，中国如今出现了子女将年迈父母丢弃的现象，还出现了因被家人疏远而在绝望中选择自杀的年轻人。

孝道是中国必须要复兴的传统，但要想重新提倡孝道，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应对孝道进行合乎时代文明要求的重新诠释。只有这样，孝道才不会只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才会成为鲜活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想从根本上打造全新的孝道，需要发挥想象力。

要想将孝道的传统与如今的社会结合起来进行重新诠释，需要大

家的参与，尤其需要有与艺术家、作家、普通市广民们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首先，孝道应摆脱对女性的所有偏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儒教传统也应转变为“性中立(gender neutral)”。这样的改革先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可以大量发现。子孙景仰的祖先中应该包括女性，女性应该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参与到儒孝仪式中。所有好的传统都是对于今天而言的——如果不能对传统进行改革，其结果就是丧失传统本身。

此外，孝道不仅要理解成道德上的义务，还要理解为达到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的过程。孝道是我们所具有的认同性的核心。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如果丢掉孝道这一切将无从回答。我们今天拥有的文明相当部分曾经流淌在祖先们的血液里。虽然我们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我们却是祖先们的光荣所创造的产物。要想复兴孝道的传统，就要擅长讲故事(storytelling)。父母应该向子女讲述祖先的故事，让子女明白他们的思想、情感、长相、体型以及经验，明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这些是如何与逝去的祖先们联系在一起。

还需要提及的是，孝道与弗洛伊德(Freud)式的接近法比较类似，但孝道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心理学理解。通过孝道，可以明白父母在子女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分量。这并不是通过抽象的科学分析，而是通过强化父母—子女关系中积极一面的日常实践而显示出来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讲道，比起西方国家的“将个人的忠诚引导到战斗部队的爱国主义”，儒教的孝道对于政府的运营更具可行性。这句话包括了深刻的意义。孝道提供了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统合性哲学的可能性，让中国得以维持充满人间之爱的国家管理制度。

2016年4月16日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8期。

第二篇

科技的发展与教育的变迁

人们需要科学性思维

近期特朗普一直在批评科学，旨在减少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预算。中国反而继续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方面中国的角色一定非常重要。但是，中国人还需要注意到科学与技术的微妙差异，尤其是需要强调科学以及科学性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科学性思维可以帮助人们在互联网时代获得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那也是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人们时常为国家开发出的最新技术感到自豪，并对其他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感到羡慕，但这并没有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思维，更没有为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无疑让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获得更多的便利、更多的自由，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相应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科学性思维的良好习惯。我通过对中国社会多年来的观察发现，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缺乏技术而是科学性思维方式。

在微信和网络上，人们对新一代智能手机、对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对机器人技术等给予了很高的关注，视为某种奇迹般的成就，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人们对技术成果的敬畏。但人们只是将自身置于欣赏者、享用者的位置，局限于既往的思维框架，丧失了批判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们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基本原理。

很多人喜欢在微信里要求别人点赞，要求别人为自己投票。他们喜欢说教，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加到别人身上，而他们的所谓观点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进行深入思考。不少媒体也是如此。节目制作者一拍脑袋就弄出一个主题，这些主题常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程度，并以此为前提来进行制作。当然，制作简短节目过程中使用的拍摄和编辑技术几乎是最顶端的。工程师们需要利用自己的前额皮层进行大量思考才能研究出这种技术，但在信息传输的终端，却只是以处理人们感性反应的杏仁体为代表的原始大脑。得益于卓越的宽带服务，人们可以使用最先进的智能手机立刻观看到各种最新的节目内容。

节目应当以呈现事实为主，而不是在制作节目的同时就对该节目有了一个主观的概括。可实际上，各种媒体只会向观众灌输自己提前设定好的解释，电视节目甚至在制作时预设了观众的情感反应。

教育部门、媒体和决策系统应该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运转。科学的

方法论要求我们慎重观察社会，并提出相关假说，尝试解释这个世界运转的原理。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研究去验证这个假说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如果使用技术设备妨碍人们用科学的方式理解国家运营和经济生活，那么就有必要对技术设备的使用方式进行调整，以使这些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认真讨论国家未来，这有利于人们对各种事件的复杂性进行充分理解。我们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论评价技术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不是一味追求更多的技术。

可能有人会对这一观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想要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点引导到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主题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具备阅读复杂文章或深度讨论某一问题的耐性。

但是，草率断定人们不会改变既有习惯，或者认定我们生活在已经不可能再对重要问题展开理性讨论的时代，是不妥的。如果我们认识到缺乏理性思维是个问题，就应该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鼓励理性思维比研发新的智能手机更加重要。

对于我来说，地铁出售报纸的柜台消失不见，大部分乘客开始被游戏所吸引而不再阅读政策和经济新闻，这个事实相当具有冲击性。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国家向好，就应该设法延长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时间，想办法使人们对政策的具体内容倾注更多关心。我们需要对围绕重大事件的不同解读进行讨论，透过事物的表象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积极介入扭转这一趋势，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制定相关的教育法案，将阅读与分析复杂文章作为教育应尽的义务，以引导人们延长注意力，引导人们对现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度讨论。特别是，我们还可以教育年轻人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提倡社会素质教育，将科学方法放在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7年第6期

选一个 Facebook 共和国总统？

最近《赫芬顿邮报》刊载了一篇我写的报道，内容是关于我竞选 Facebook 总统的选举宣言。尽管这是一篇看上去轻松幽默的文章，但其实蕴含了很多深意。比如，Facebook 的未来发展和它面临的运营方式，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Facebook 已经委托给 Facebook 股份公司代理运营。因而作为参与者，Facebook 如何发展，如何规划，如何运营管理，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参与，这显然是有点不公平的。作为 Facebook 的参与者，我们每天制造话题发布内容维持着 Facebook 的发展。所以说 Facebook 并不属于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甚至什么公司。Facebook 是属于所有人的。如果我们意识到 Facebook 的可能性，那么就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了。如今的 Facebook 是人们交换意见、互通有无、发现新奇事物、创造各种可能的平台，是史上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网。但是由于 Facebook 目前存在利益集团，因而设计已经是设定好的。所以真正的协同还不可能，问题正出在这里。未来，Facebook 需要成为一个为团体或个人服务的网络。当然，不是简单的把个人当成商品或顾客，而是当成一位市民。为构建更好的 Facebook，我们需要各领域的专家和科学家、公务员、艺术家与普通市民互动。为了构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从气候改变到贫富差距，各种我们人类需要直面的问题都可以加入到讨论话题中来。无论怎么看，这都是 Facebook 的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能运营 Facebook 共同体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走上顶端，将世界变成一个共同体来管理。此外，回想韩国此前风行一时的赛我空间，不难发现韩国也是具有发展新一代网络社区潜在性的国家。这个全新的网络社区不只是与顾客有关的，而是和地球村每个居民息息相关的。

2016 年 6 月 13 日

注：这段文字是贝一明教授在今日亚洲做的三分钟演讲，演讲视频可在爱奇艺上看到：http://www.iqiyi.com/w_19rsrhurul.html

虚拟现实 VR 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贝一明：今天我们请到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员金凯教授。您好，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贝一明：针对虚拟现实革命对我们社会和生活造成哪些影响，今天想跟您做一个探讨。

金教授：首先，虚拟现实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随着虚拟现实在技术层面的发展，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盈利性企业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速发展。

贝一明：对于中国市场您怎么看呢？中国市场和虚拟现实市场有怎样的关联呢？

金教授：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年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变化。2015 年末为止，中国互联网用户为 6 亿 8800 万人。这个数字比五年前足足增长了 2 亿。智能手机用户也较五年前增长了 2 倍之多。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对新技术的发展还是非常热衷的。

贝一明：前不久，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刚刚举办。三星电子 galaxy 系列举办了“Unpacked2016”展览。还看到了脸书的扎克伯格的身影。场馆内所有人都戴着 VR 眼镜，亲身体验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兴奋。不过事后人们也是喜忧参半。有人觉得新技术是未来大势所趋持乐观态度，而有人却表示有些担心：如果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虚拟现实中，也许我们的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共识会减弱不少吧。

金教授：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事实上，这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互相交流的方式的一种变化趋势。本质上这对于政治、内在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仅能打电话，还能够通过 VR 进行沟通交流。而且我们能够通过 VR 看到彼此，想想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贝一明：没错。其实中美两国也在虚拟空间和网络空间上有过很多相同的问题。当然，关于虚拟现实的问题的讨论也是其中之一。为保障网络安全，预防网络犯罪，据说最近一些网络协议已经出台。终于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也实属难得。

金教授：是的，确实是难得的第一步。网络安全问题和核问题是两码事。如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知识，谁都可以用短短的几周时间成为一个网络黑客。但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对应网络犯罪的通信协议和行为规范制定的阶段。另外一个问题是，个人、小型公司，非政府机构等也同样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贝一明：是的。我们可以把虚拟现实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虚拟现实是我们社会进步共享空间的机会，而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则可能成为我们互相斗争的战场。当然，斗争的对象不一定是国家，它可能是个人、或者国家里的某个团体、也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某个网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虚拟现实到底是福还是祸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金教授：没错。我把虚拟现实想象成一个所有人都要参与的游戏。他们认为“我们在玩游戏”，但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玩家。重点是，像中美这样的超级大国之间一定要建立起相应的协议，这个游戏才能顺利地玩下去。但是也不仅仅局限于大国参与，小国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比如韩国。

贝一明：您说的没错。非常感谢金凯博士做客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再会。

2016年6月13日

注：这段文字是贝一明教授在今日亚洲做的三分钟演讲，演讲视频可在爱奇艺上看到：http://www.iqiyi.com/w_19rsriusxl.html

李世石 vs. AlphaGo 新的起点新的挑战

最近，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与谷歌旗下公司 DeepMind 研发的 AlphaGo 的围棋对决，无疑成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赛事。AlphaGo 以 4-1 的比分战胜李世石，这一结果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人工智能技术呈几何级数增长，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AlphaGo 通过模仿人类，利用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战胜了人类围棋大师李世石，即使我们无法阻止这种可怕的机器进化，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积极的引导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文明。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思考什么是技术，这些技术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要在计算机面前后退一步，在出台技术方面的政策时一定要瞩目未来做好有前瞻性的打算。在计算机面前，我们是要后退一步，要长远地考虑到这种潜在的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后果。我认为，对于技术发展的这种终极的、爆发性的、几何形态增长的趋势，我们很难从电子电器工学领域找出应对的策略。如果想要找出真正的答案，必须要着眼于从艺术、文化、哲学、甚至是伦理学寻找根源。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如此高级的阶段，我们有必要改变视角，从人文学的视角去探究并找出更加遥远的对策。

本文是贝一明教授 2016 年 4 月 6 日在《今日亚洲》所做的三分钟演讲。

哈佛教授迈克尔·普鸣谈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他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一门“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

关于普鸣教授在哈佛授课的盛况，刘晨（哈佛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写有很好的文字；三联学术通讯小站两年前曾经发布过：哈佛大学如何上“中国文化通识课”？

2015年11月4日，赫芬顿邮报网站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对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访谈。我们请北京大学的王晨晨同学翻译了全文。

Q：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

A：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

贝一明：亚洲对于教育非同寻常的重视令人称道，一些美国的父母们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式。但是亚洲人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失控。学生们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亚洲人认为去什么学校如此重要？

普鸣：我认为针对亚洲教育的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地区的确在传统上极为重视教育。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的成果：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直接相关。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东亚对教育应该如何发挥实效预设着相当危险的想法。东亚这种用考试去评价教育，并将所有的社会成就和考试挂钩的趋势相当具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孩子们在学校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其首要目的是让他们在考试中拔尖，这样他们就能在升学的时候快人一步。这些考试实际上考察的是天资，比如说一些考试是用来检验你是否对数学独有造诣，那你就朝数学这个方向发展，或者你在其他领域表现突出，你就会被拉向那个方向培养。这种教育方法和东亚过去对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的理念有关，尤其是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概念。

在中国，考试的初衷是去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系统接受教育的体系，而且如果学得优秀，就能到政府部门高就。这一想法很了不起。

贝一明：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精英政治现在被一些大型考试控制，它们私底下勾结备考产业，并从中牟利，因此有动力维持该体系运作下去。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反应，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而把孩子送到美国。

普鸣：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亚洲的教育走得太远了，而我们需要悬崖勒马。正如某些人认识到了教育是如何在前现代东亚社会发挥作用的那样，我也想说，“看呐！传统的亚洲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考试热不应该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法混为一谈。

如果你去研究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教育和修养的，以及他们的精英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会理解，尽管考试很重要，尽管学习也和考试相关，但学习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是通达个体生命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远远超出如今亚洲学生用各种技巧对付的狭义的考试。

贝一明：我想起了林语堂的经典著作《生活的艺术》，里面详细叙述了大部分中国传统中非常人性和人文主义的观点。它和我们读到的明清两代的“考试地狱”是两码事。林语堂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的关键之一，是它并不完全依凭天资。这种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本就是不完美的。我们一生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修养自身。

所以传统学习中的关切，不在于说相比于其他科目你是否更有数学天赋，它的观念更多是“不，你不是生来就擅长某些事。你把自己培养得擅长某些事，应该注重练习、训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儒家学者不看天资。即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他们看中的也是积极的性情。培养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学习并非主要学技能。你获得技能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高的目标。但这更高的目标，它意味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核心关切。这个更高的目标是用道德词汇定义的。做一个有教养、讲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

他们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通过教育，这些人能够具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知道生活中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尤其是领袖们

必须有伦理基础，手握权力的人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管理的人。

权力常常伴随着滥用的可能性，对那些将要当权的人而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道德教化，记诵或是解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讽刺的是，东亚现在使用的考试形式破坏了传统教育的所有这些方面。

现在人们经常更强调天资，而非自身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意识，也不是用在性格、态度或伦理情感上面。现在教育关注的事情，你都可以用标准化方式检验：“你擅长数学吗？”

贝一明：在韩国和日本，标准考试和三十年前十分不同。过去有一些问题要求复杂又多维度的思考。除非你对问题真正有洞见，否则不可能只通过应用公式就答得出来。然而今天的考试只是确保，如果你去过补习学校并且无数次练习过这些问题，你就会得高分。它没有创造性思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普鸣：是的，现在人们把考试当成“通过仪式”，而不是学习的过程，这是一股不幸的潮流。这一改变破坏了教育曾经的定义。如果你研究过中国人分派官职的科举考试，其内容绝对不是你花一生时间能够死记硬背的。这种考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考察出你是否会变成一个好人。

贝一明：考试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显然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是人们如何通过科举制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教养？

普鸣：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些考试包含着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会给你一个难题，然后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会如何处理？”这些考试不可回答是因为它建立在大量复杂的问题之上。你会明白当时的考试不是要你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正确答案。它考察的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撰文论述你会如何去应对这一复杂的处境。这样的考试要求的是广博的学习，人们从历史中汲取同当前处境相关或不相关的知识。所以实际的考试是考察假如你是当权者，你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认清了现实处境，然后认清了自己应怎样得体地行事。通过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一次极强的教育经历。而考试的全部关切是：“通过这次考试经历，你把自己培养成更好的人了吗？”这才是你被考察的地方。你必须展现性格发展和教养过程的方方面面。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 XYZ 这些技巧。

贝一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阶段，考试包括了诗歌、文学、文章写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古人如此重视文学创作这一事实？

普鸣：因为过去的考试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设计考试，使之能够拣选出那些真正因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去考察出这种人格品质。比如说要求你写诗就是新方法之一，要求别人去写诗听起来或许有些古怪，但假设你读过别人的诗，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他们不是考你是否写了首好诗，而是考你在整个创作过程里表现出的道德品质。

贝一明：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文本该怎么讲授，口头或书面测试的作用这些方面，你如何描述教育的本质？传统中国教育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普鸣：传统中国教育经验的核心在于把人培养得更好，当然它还是要求学生读很多书，记很多诗。但它不止于此。

贝一明：教育从此开始。

普鸣：所有学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师以《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为榜样。《论语》中孔子和诸弟子一道努力学习，他首先使自己变得更好（推己），然后帮助他人成人（及人）。

孔子一般是这样教学的：当孔子遭遇一些情况时，弟子常会引诗来解释当下处境，并试图改变它的含义。孔子的要求没有标准答案。他只是说：“好吧，引用些诗，现在是这种情况，引些既符合现在说话的语境，又能推进讨论朝好方向发展的诗歌吧。”所以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对当下处境而言过于显白，孔子会摇头说：“不，不。”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太古怪，孔子会点评：“不，不，不。”这时某弟子会引用其他诗行，孔子会说：“对的。”“对”，意味着这几行诗不仅切合实际，而且能以一种有力的方式促进观者开拓思路。简单地引诗就可以使听众对这个处境的回应不同。

贝一明：考试本质而言是具有变革的能力。

普鸣：正是如此。孔子的理念不是告诉弟子们这个情况下就该引用这组诗。这里考的是：你能否很好地领会现实处境，并且学以致用到现实里，改变周遭的人们。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你要找的教育体系。问题不在于你学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在日常生活里活用所学造福邻人。

贝一明：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老师们必须使学生消化所学信息。学生们只是容器，任凭你不断倾倒知识，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多装了些知识。这个过程不是变革。学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改变。

普鸣：所有东亚文化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教育是一种改变的方法。而在这么多当代教育中，你能变得很强，面对所有考试题型都游刃有余。你能得到“A”的成绩，标准考试的高分也手到擒来。但在传统东亚，这种教育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教育的整个关键是具有改变的能力，变成更好的人。

贝一明：与此同时，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特点：随着朝代的延续，考试会愈发变成脱离道德议题的形式主义活动。正是这些时候，人们不再重视抽象的伦理道德。

普鸣：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这样的轮转，但是教育的演变不是绝对的，总是有可能找到改革的机会。千百年来，教育应该如何实行、考试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考察人格这些问题，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讨论。不消说，他们从来没有达成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流逝，各种设计教育体系的方案会趋同，从此变得过分形式主义。人们会发现它们越来越远离实际的伦理问题，然后将会再一次出现大讨论。最终我们现在得以见到历史上的许多轮转。我认为中国传统使人激动的地方在于这些争论是关于价值的，而非考试分数。

回到现在，年轻人面对着受到考试强烈驱使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教育是什么思考得极其有限。悲哀的是，我们把这种非常有限的想法当成“必然的不幸”，并认为它是如此自然不用去争论或重新思考教育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中国和韩国过去的讨论是有益的，它们为我们今天改革亚洲的考试文化提供了线索。我们需要去问：“现行教育体系层层筛选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对回答不满（我认为很多人不满意）就需要问自己如何能够改变。

贝一明：教师的角色是怎样的？相比于今天，教师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地位。韩国人和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像过去一样尊敬我们的老师。”但是我并不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被当作消费的产品。

普鸣：中国的教师把孔子当成他们的榜样，并将他为培养弟子所作的贡献当成必须要做的事。类似地，比起研究或者教学技巧等技术性的层面，言行举止努力做个好人，更是老师们的必修课。整个教育的过程被看作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老师和学生都是这样。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有希望更进一步，但是他们仍远达不到完美。人们期望教师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并激发他身边的人去做一样的事。

过去的教师不是灌输一堆知识帮助你通过考试。如果考试中没有伦理的追求，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理想是，教师要做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人、一个努力变好的人、一个激发下一代去做同样的事情的人。

贝一明：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彻底不同。如果你去问一所中国大学里的教授或者是教育部的官僚，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他们很可能会回应：“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这样，我们也深陷其中。”你认为改革的有效方法是什么？我们如何回到轨道上？

普鸣：第一步是重新激起“教育为什么要存在”的讨论。如果我们停止问“如何进入一所好学校”，然后开始问“教育如何能够帮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了，或许会有足够多人意识到这真的有问题，并开始采取具体的步骤去切实改变。

我们需要考虑考试的结构，以及它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只要整个教育体系建立在考试之上，教育就会只关注让学生通过一层层考试。

让我们坐下来思考这些考试的目的——很奇怪，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应该让所有孩子在所有年龄都卷入这样的考试中吗？从很多方面来讲答案也许都是否定的。如果仔细想想，我们会同意一些种类的考试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如何能够通过改变考试的形式，使得考试的价值和动机成为我们主要的关心，而不是考试本身。一旦你改变了预设，原先跳火圈般的教育系统就没有意义了，人们就不会设置层层考试。

贝一明：作为一个老师，你从谁那里得到灵感？

普鸣：我当然努力按照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想法生活。我恐怕自己还不符合。但是我每天起床拂去灰尘，重新开始。

我很幸运见到一些真正具有改革能力的老师。他们是我真正尊重的伟人。他们将课堂当作变革发生的地方，对我很有启发性。对这些老师来说，教育是关于将学生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学习事实。

不同的老师运用不同的技巧，所以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方法帮助我打破了自己的惯性思维，启发我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当然很久以后，当我开始阅读中国哲学，我发现有一套词汇可以描述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我的教学目的，是竭我所能帮助学生变得更好，并且希望以一种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习的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做好。

贝一明：能否给一个具体的例子，你是如何受中国教育的启发挑战你的学生？

普鸣：我教的一门课是中国哲学。我上课只用原始的材料——英文翻译。阅读材料都不是古代汉语形式的。但是学生仅仅阅读原始文本，而不读评注，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要去读二手文献。

我发现二手文献常常试图把原始材料放在我们需要去质疑的框架中。

我告诉他们：“我们会只阅读原始材料。”我告诉学生们，要容许这些文本挑战一些他们的基本预设。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不喜欢挑战自己的基本预设！你们也许不会同意在文本中读到的东西，那正好！要试图理解这些东西，并且挑战你的预设。”挑战学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并不准备将文本翻译成任何人都能够消理解的英文。我希望学生们能够认真对待这些文本，去和它们斗争。你不需要同意文章中的内容，但你必须认真对待它们。

我在课堂上会不断提出问题，并且鼓励学生们提出问题。如果他们给出的解读太过轻巧，我会说：“是的，但是这个词呢？那个短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要整个课堂随我漫步，试着带领他们看到这些文本是如何挑战自身基本预设的。

贝一明：教授中国哲学有一个风险，就是你陷入了重复儒家价值的泥淖中：“一个君子应该是个好人，尊敬兄长，照顾家庭，诸如此类”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文本，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只是单纯列举出来的美德，这些词汇有各种各样的歧义和可能性。

普鸣：是的！当你阅读文本时，你大可以合上书页很快过掉这些话，不假思索地以为：“做一个好人，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教师的目标应该是为学生指出来：是的，但是你需要真正去阅读这个东西，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从字里行间中的缝隙中，看他们说“做个好人”的复杂性，然后追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特别的类比。

我希望学生进入这些材料的复杂性，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成为一个好人的复杂性。

贝一明：让我们来谈一谈全世界的教育危机。我们看到现在评价一所大学更注重宿舍的好坏而非课程的内容，比起学习更关注就业。整个教育正令人不安地在被挖空。我们需要什么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普鸣：在不同层面上我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应该关注资本越来越多地控制教育的过程。我们必须理解制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我们必须阻挡这种趋势并且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地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加严肃地对待教学。可以从少数的革新者和支持他们的团体开始。我们必须推动大的制度改革，比如重新设计考试和课堂，与试图从教育中牟取利益的力量作斗争。

与此同时，必须先有一群人开始用新方法教学。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教学的具体例子以供辨别和支持，我们就不能够推动制度变革。官僚不能设计革新的教学。它必须通过实验从头开始向上推进。

贝一明：我发现与学生在课外的互动是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喜欢和他们讨论我们的阅读和我们所生活世界的关系。

普鸣：我们只需要看看《论语》里的孔子：他不在课堂上，也不布置书面的考试。他与弟子们无数次将所学化用到具体生活中。通常教育在课堂外更有效。如何在现有注重分数与课堂的制度尽可能地实现上述方法，我们还并不清晰，但是还有很多教学实验的空间。

贝一明：如果你把孔子带到演讲厅的台上面对四百个学生，他会如何应对？他会准备幻灯片吗？如果学生问他：“期中考试会有这个吗？”他会如何回答？

普鸣：我很怀疑他会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几点开始。我可以想象他开始这样说：“这节课的目标不是让你学会 XYZ，或是在你的考试中得高分。”我怀疑他会立刻尝试重新组织课堂，使课堂变成一个舞台，这舞台上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变得更好。一个大的演讲厅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孔子会希望挑战学生。他不希望课程变得容易，但也不希望为了学习更多事实而把课程变得“困难”。对孔子来说，如果课堂不是为了培养更好的人，这就不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和孔子详尽讨论的仪式（礼）类似。

贝一明：你对仪式的重视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已经对过去的社会对仪式感到陌生。如果你问学生，他们会说仪式是祖先、原始社会人类才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学生们忙于很多仪式，从他们和别人讲话到买时髦衣服的方式，无一不是仪式。

你也许会说你没有仪式，但是那意味着你没有意识到它们。儒家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语言去讨论仪式并将它们与伦理关切联系起来。

普鸣：这种现象在美国非常普遍，但是我们在东亚也可以观察到。因为年轻人认为仪式是那些旧的东西，是在传统社会当人们相信神灵和祖先崇拜时才会做的事。但是现在，他们认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再做那些愚蠢的仪式。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从事任何仪式。但是如果孔子出现在当代世界的任何地方，最有可能是今天的美国，他会说：“噢，不，你们这些人时时刻刻处在仪式之中。”

我们现在意识不到自己处于仪式之中是很危险的，我们没有认真对待它们，因此它们没有实现预计的目标。只有真正发生转换的时候，仪式才起作用，就像牧师宣布，“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如果不严肃对待生命的仪式，我们从中就什么也得不到。一些人不理会仪式，说：“我不想在我的祖先前鞠躬。”然而同一个人却坚持开宝马并把孩子送到最贵的私立学校。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这些就是现代的仪式，并且发问：“这种仪式能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需要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仪式，也要意识到它的象征性和社会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够控制它。否认或压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修正仪式，使它更加健康。

2016年4月8日

区别看待科学与技术

2008-2010年间，我曾与大德研究园区政府出资研究所的人一起密切合作，围绕韩国科学技术的未来同研究所的人员进行了热烈讨论。当时，研究员们对于2008年教育科学技术部成立后科学技术部被撤销的事实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他们认为，正是科学技术部这样一个独立的部门长期为研究工作提供大力支持，才有了韩国的高速工业化发展。我的想法却不尽相同。我认为，韩国要做的不是重新设立科学技术部，而是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来区别看待，分别成立“教育科学部”和“产业技术部”，这样才更有助于韩国的科学技术发展。

把科学与教育放在一起，是一种妥当的做法。教育与科学都是通过逻辑思维和想象力系统性追寻真理的领域，二者的结合有助于大大提高韩国的教育质量。不少政府官员和学校行政人员倾向于把教育视为一种劳务或者效益工作，而不是“追求真理和伦理理解”的行为，结果导致教育的范畴大大缩小，沦为简单的对事实的传授，却不甚关注这些事实中蕴含的意义。教育目前的状况，只是一味对片断的事实进行死记硬背，把原来活生生的知识变成死的知识进行灌输。将科学归于教育部辖下，可以推动改变这一现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追求真理在学习中的应有的分量。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将潜藏在人们身上的探索宇宙追求真理的冲动激发出来。

同样地，由于技术是“将科学原则巧妙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领域，更适合与“产业”结成一对。不幸的是，很多韩国人带有一种懒惰且危险的习惯，仍倾向于把产业看作金融的延伸领域，导致技术沦为帮助投资者创造更多利益的手段。受这种狭隘视角的影响，我们已经与产业旨在“灵活利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本质渐行渐远。

我们经常喜欢做出这种假设，认为产业可以创造出人们喜欢消费品，从而创造财富，然后人们利用获得的利润购买商品，用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然而，在某些问题上，免费提供商品并保障所有人可以共享这种商品，才是最优解决方案。而且，仅仅将产业视为赚钱的手段就会排除可以在地区经济中发挥极大作用的物物交换的可能性。

此外，在技术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是一种危险观念。因为技术可以生产出误导人类的虚拟现实。看到电视或电子游戏中出现的干净水源，人们可能会误以为地球的环境非常健康，而事实上，沙漠化和空气污染正时刻威胁着我们。我们应把科

学追求真理的基本原则放在教育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位置，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为长期的发展做出正确决策。如果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人们将无法客观评价技术对人们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难以制定出可以控制技术不被滥用的有效战略。

电子游戏之类的技术可能会导致人们脱离现实的本质，走上错误的道路。此外，这种技术还会导致人们将注意力过多放在某一方面，从而在现实中面临严重挑战时无法进行系统思考。考虑到这种技术的误用给社会和韩国国家竞争力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电子游戏获得的利润显得微不足道。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仍在电脑游戏中浪费人生。

我们应积极对技术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和控制，使技术得到正面使用。比如说，我们应该利用科学制定相关守则，规定学生可以在什么时候利用电脑进行学习，什么时候学生不能使用电脑或其他机器等等。在不允许使用电脑的时候，应要求学生们积极思考世界，参加自我探索解决方案的活动。在使用电脑和不使用电脑这两种不同的体验中，可以获得卓越的教育效果。但人们不能仅仅通过使用技术达到这种效果，只能通过科学，尤其是“技术的科学(a science of technology)”实现这一目标。

韩国具有无穷的发展潜力，但若想真正发挥出这些潜力，必须对技术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一味将市场需求或人类欲求视为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违背了子孙后代的意愿，他们将被迫生活在我们制造的环境中。

技术的运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为人类带来好处，技术在为我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针对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科学思考，选择可以为我们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方式利用技术，是我们身上肩负的道德责任。如果不能周密把握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催生大批行事冲动且毫不关注社会未来的韩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可能使我们下意识地产生技术至上的观念，令科学与技术本末倒置，这样的观念如果为教育所接受，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们将失去真正的创造力。一旦国家成为由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国家的未来将会一片黯淡。

2016年3月9日

追求卓越的秘密和亚洲高校的前景

——采访哈佛大学的传奇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贝一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就在世界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哈佛大学的声誉由来已久，但历史上的哈佛大学，例如从上世纪初直到 30 年代时，它还无法和英国、德国或者法国的大学相提并论。那么哈佛大学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地位，其原因何在？

罗索夫斯基：想打造一所伟大的大学绝非易事。我认为有一点十分重要，它通常都被人们所误解，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打造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毫无捷径。人们通常会想，如果我们投资足够多的钱，那么几年以后就能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我在全世界各国都听到过这样的想法。然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并不会出现奇迹，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不过，有一些因素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开发一所大学的潜力，让它变得更加优秀。就拿哈佛大学来说吧，到了 1936 年建校三百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然而也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

那么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直到今天，哈佛又发生了什么呢？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变得日益强大，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资源和人才。这其中对哈佛大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詹姆斯·布赖恩特·柯南特，他于 1933 年至 1953 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

贝一明：那么柯南特校长来到哈佛之后采取了什么特别的措施呢？

罗索夫斯基：1933 年他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消了一些守旧的做法，例如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课程等。他领导下的哈佛开始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招收学生，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在他任期的前几年，哈佛研究生院还开始招收女学生。

不过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制定了“不升职就走人”的政策。这个制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哈佛的教授们有一个长达八年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如果不能完成逐年递增的科研任务，就会被学校解聘。

在那之前，哈佛有许多不错的人，但学校对他们没有特殊的要求，因此他们只是一辈子待在学校里，有些不思进取。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优秀的教师，但他们没有压力，所以不求事业的发展。

“不升职就走人”的制度并不是拍脑瓜政策，哈佛用这项著名的制度来评估他的专家教授们，用他们在某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决定谁该升职。这项措施让评定教师职称的标准从学院内部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学术领域的成就。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刚才重点强调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而不是教学设施、预算、资助或者优秀的学生。我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教师、学者和管理者，我相信教师队伍的素质决定了一所大学的质量，其他的都取决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有优秀的教师，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你的毕业生才肯为学校捐款。

哈佛的另一项创新之举是聘用学术行业里最顶尖的人才担任教职，我认为这让哈佛改变了许多。在二战结束后的日子里，哈佛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而不是任人唯亲和依靠裙带关系，因此哈佛没有那种按照个人关系来决定教师去留的氛围。

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对哈佛的这种校园文化十分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纳入麾下。

贝一明：那么哈佛之所以能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他取得的成就吗？

罗索夫斯基：我不认为哈佛真的占据了领导地位，我也不认为世界上那些大学的排名真的那么重要。不过哈佛的全球知名度确实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他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传播到了其他大学。

另外，美国社会极其重视公众形象，我个人认为，肯尼迪总统在树立哈佛的公众形象方面功不可没。在肯尼迪总统之前，哈佛也是一所优秀的大学。然而肯尼迪总统为美国树立了新的形象，他是一位受人关注的领袖，也让人们更加关注他的母校——哈佛大学。

当然，这一切变化都和美国战后日益增长的自信心密切相关。美国从一个重要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而哈佛大学以及美国的其他高校发现了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让他们聘用世界上最顶尖的教师，招收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出类拔萃的高校总是少不了哈佛大学。

贝一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校也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发展英语教育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然而尽管他们进行了数亿美元的投资，却仍然无法赶上哈佛的水平。你认为东亚地区的高校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达到哈佛的高度呢？

罗索夫斯基：东亚地区的高校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毕竟我们要知道，东亚地区的现代教育并不是由孔子开创的。事实上，东亚国家发展现代教育的经验尚浅，考虑到这个历史因素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许多高校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还必须面对许多挑战，我在此就不一一指出了。我想谈谈两个人们常常忽略掉的问题。第一是学术自由，而且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这比那些花在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招聘著名学者上的投资更加重要。教师们需要空间来做他们喜欢的研究，他们也需要自由的权利在大学里、在社会上发表意见。

还有，共同管理对于优秀人才的晋升来说同样至关重要。高校教师要直接参与高校的管理，并且要被赋予优先权。东亚地区的高校通常都缺乏共同管理的理念，尽管他们的教师也十分优秀。在东亚国家，要么教育部门统帅一切，要么那些控制了资金的私立机构说了算。而这些部门或机构对教育和研究知之甚少。

十五年前我曾经主管过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个审查委员会，当时我发现了他们在共同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在日本的高校里也发现过。所以政府部门要放权，给高校教师们一些呼吸的空间。

贝一明：韩国的教育部给高校下达命令，而高校的校长办公室又把这些命令下达给他们的教师。他们的新政策规定，为了升职，教师们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例如要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等，然后让那些对学术一窍不通的人们来评估。制定这些政策的人许多都不是教授。

罗索夫斯基：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使用这种“客观评价标准”，并不仅限于东亚国家。

如果你想正确认识美国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并取得超越哈佛的成就，我们就必须回到管理上来。要想打造优秀的大学，就必须把理事会或者政府部门从学术决策过程中隔离开来。这是美国人对共同管理设置的概念，也就是通过高校教师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作来运营一所大学。和共同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部门的专制”，在这样的

制度下，管理大学的各项政策和规定总是由没上过学的官僚来制定的。

把高校运营看作是“参与式民主”也是同样不切实际的，欧洲的高校曾经用这种方法进行过管理。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许多教授，因为当时那样的做法非常民主。但是他们因为缺乏决策过程的执行力，因此高校逐渐失去了改革的活力。

我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优点是理事、校长以及一些高管人员保留相当的决策权，而同时又保持开放，积极参与交流和讨论。大学校长可以扮演 CEO 的角色，为高校的长期发展进行决断，但是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咨询高校教师。虽然有时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高校和教师共同参与管理的确能带来极大的好处。

贝一明：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高校排名那点事儿吧。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校都有很好的潜力，但他们的校长只醉心于高校在排名榜中的位置。教育部门的那些官吏们虽然不懂教学，但却很关心高校排名，就像关心道琼斯指数一样。这种短视的行为给高校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罗索夫斯基：高校的排名有点儿像纳斯达克指数，我不太明白人们是怎么把哈佛、斯坦福和密歇根大学给数值化的。这种做法毫无意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排在前十五名的大学是浪得虚名，但排名第二和排名第八究竟有何区别？作为在一所规模庞大的高校中工作的管理者，我认为这种做法有些不近人情。我们要做的是追求卓越，而不是排名。作为学术界人士，我们清楚地知道高校的质量是不能简单用论文和专利的数量来衡量的。那些依靠数据来指手画脚、生造排名榜的外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卓越。

有人告诉我，一所大学的排名从 176 降到了 201，他的校长因此被辞退，甚至被逼自杀。但愿这不是真的。

贝一明：从某些方面上来说，当务之急是提升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总体意识，而不是增加大学的预算。此外，提高教师工资和增设大学课程比起建设体育场馆或者豪华的行政办公室重要得多。

罗索夫斯基：高校教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也知道他们该如何应对管理者来取得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把这些东西都数值化实在太可笑了。

贝一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校里，英语并不是第一语言，然而大学评估的时候却要看他们发表在英文杂志上的文章，以及他们

开设的英语课程。例如韩国的 KAIST 最近强行通过了全英文授课的教学计划，并强迫教师们用英文来授课。但是这项政策对学生和教师们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还有许多大学开始用英文论文的数量来评估他们的教授，甚至包括韩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们！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措施提高了他们的学术质量。

罗索夫斯基：国际上的研究型大学究竟该使用何种程度的英语，我对这样的问题并不陌生。我想说的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追求这个趋势，因此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一方面，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英语——通常是令人厌恶的英语——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通用语言。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少数一些国家之外，英语并不是人们的母语，但我们却要求他们用英语来撰写和发表文章。我想这种情况每个领域稍有不同，比如你是一个数学家，你的英语能力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英语能力肯定是一个障碍。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强求所有的学者使用英语，那么会给那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们带来很大威胁。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以及中东地区的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如果我们强迫他们每个人都使用英语，那么会给他们的文化活力和学术创造力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我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一直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贝一明：如果亚洲的高校想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学术传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罗索夫斯基：关于亚洲国家如何才能打造自己特有的人文科学，而不是一味模仿西方文明，我还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亚洲地区的高校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简单模仿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并不能帮助中日韩等国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受过教育的韩国人、中国人、或日本人必须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了如指掌，只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打造有活力的学术环境。

最后，招生环节也必须有所改进。东亚国家有许多人只通过国家考试的成绩来衡量学生水平。美国最好的大学都不会那样做，而且是出于理智的原因。我们在招生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不同的智力优势、艺术表现、经济状况、社会背景、种族以及地区等，而且要尽量让课程设计涵盖这些方面。亚洲的高校也一样能使用更加宽泛的评价标准来选拔学生，摆脱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制度。

但是在我们美国人评论东亚国家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国家也非常不幸地出现了那样的趋势。上一流的高校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所学校在教育 and 求职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优势被人们夸大了。

我有一个孙女，她正准备上大学。我告诉她：“上哪所大学没那么重要，它又不能决定你的人生。”她看着我，笑笑说：“我知道了，爷爷。”

但是我知道她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我非常痛恨那种对“一流大学”的痴迷，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我还听说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美国。

注：亨利·罗索夫斯基是一位专门研究东亚地区的经济史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的管理人员。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也担任过该系系主任，并于 1973-1984 年间以及 1990-1991 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87 年，罗索夫斯基出任哈佛大学代理校长。卸任院长一职之后，罗索夫斯基又在哈佛理事会工作至 1997 年，他是哈佛近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出任校理事的教师。

罗索夫斯基是哈佛大学公认的最有才能的管理者之一，他的工作为哈佛大学在几十年间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管理方面的经验可参阅他的著书《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

2016 年 1 月 20 日

网络空间共和国

生活在亚洲的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祖国地域以外的地方渡过，该地就是一直在扩张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虽然用特定国家的电脑或智能手机连接网络空间，但网络空间正超越亚洲，成为全世界共有的领土。

近代世界始于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大探险时代开始开发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资源。这些国家建立的全世界生产和分配网络让它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今天我们正在使用的全世界制造和分配的蓝图。

但我们已到了地球的物理极限。与之前不同，不酿出严重后果就无法开发资源。在世界人口朝着90亿人发展的今天，为确保粮食和水的供应，我们正在进行激烈竞争。

网络空间向我们提供膨胀、探险和自我完成的新边境线，现在还是处于开发初期的土地。该土地似乎在高声要求给自己下定义并进行系统化。网络创出的虚拟空间可以储存无限信息，而且还相互连接网络和企业内联网的多种信息来源。其结果就是，所有个人的潜力都得到极大发掘。

再加上技术发展，未来几年网络空间将会成为生活空间。现在我们的孩子已在网络空间这一共同土地上穿梭于各大高楼，攀登到山顶，坐上飞机。

但他们正在探险的网络空间现在还是“石器时代”。随着拥有共同关注和担忧问题的人们汇聚在一起，逐渐扩展的网络共同体正将网络空间打造成为最有价值的“房地产”。随着网络空间的“创造阶级”为这一新的体系和服务如何进行合作，将决定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但迄今为止，为网络空间的未来进行的政策协议还远远不够。最近索尼黑客等网络恐怖事件频繁。有必要认识到，现在需要管辖网络空间的全球标准。就像是共同管辖南极大陆。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会需要史无前例的新型规则。要为网络空间制定规则，保护创出新制度和产品的市民不受威胁，让他们可以在这一片新天地最大程度地发挥潜力。

东亚是世界上网络最普及的地区，也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最多的地区。它们正在生产互联网文化产业。东亚国家能聚在一起创立“网络空间共和国”吗？所谓“网络空间共和国”，就是为应对未来网络极

度扩张可能性而组成的新规则的集合，而且还是为保障透明性、私生活、信息共享和网络中立性而进行相互协议的规则。这种具有先见之明的协议可以将东亚打造成为商业和研究最有魅力之地。韩国可以在这种过程中作为信息技术(IT)和管理的典范发挥中心作用。

在东亚建设网络共和国的方法之一是参照六方会谈。为永久解决朝核问题，韩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参加的六方会谈是非常重要的对话场所。2009年以后，六方会谈处于休眠状态。但东亚主要国家之间高层会谈这一概念可以在东亚网络空间中加以应用。

如果不让所有利害关系当事人参加，就无法建设稳定的网络空间。这五个国家要认真进行协商，专家要通过共同联合研究提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将网络空间当作共同行政管辖地区的综合性的、具有创意的蓝图。如果对东亚网络空间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会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优化网络空间体系切实需要积极的蓝图，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现在面对威胁表现出被动的态度。

最后，如果扩大为网络空间共和国进行的六方会谈，就可以对21世纪谍报的本质再次进行深层讨论。谍报领域作为战争中隐秘的手段，为取得情报发展。但对新情信息时代，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建设新的体系才能确保稳定和中和的网络空间。根据透明和一贯性原则，我们要对保存和保护信息的复合系统框架进行协议，建设忠实于发挥该作用的原则和蓝图的信息机构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挑战。

第三篇

人类的未来在生态文明

共生共享制：朝鲜国家发展的第三条路

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的朝鲜能否开创先河，成为可持续性合作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标杆？随着地缘政治变局的频频发生与新兴科技成果的不断问世，在国家范围内推行“共生共享制”似乎愈发可行。

朝韩两国的关系日新月异，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下一步的和解措施，而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朝鲜半岛何去何从。

随着新理念与新科技的流入，“隐士国家”（Hermit Nation）体制转型的大门正在徐徐开启。尝试采用全新的治国方略、兴建别样的基础设施或许可以使朝鲜成为典范，给其他国家以启迪。

然而，虽说朝鲜半岛的发展前景看好，但媒体报道有跨国企业意图在朝鲜建立掠夺性经济体系，通过开发丰富的矿产、剥削廉价的劳动力来迅速攫取财富。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并不会用于接济穷困潦倒的朝鲜人民，只会落入国际投资者的口袋。可以想见，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金融界大鳄，将以战后的伊拉克为样板来发展朝鲜经济。

但是，朝鲜既不必紧抓由朝鲜劳动党推行的落后经济政策，也不必转而拥护由跨国投资银行及其资助的咨询公司所操控的新自由主义消费型“发展”策略。朝鲜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走上这条路，既能够摆脱肮脏、剥削性的“增长”桎梏，又能够获得可持续性经济与政治发展成就。

实行 21 世纪共生共享制

朝鲜的“第三条路”，即建立协同型经济与社会体系。换言之，即利用新兴的全球教育、政治、制造与经济共享框架——其存在的基础是端对端（P2P）系统与 Linux、维基百科等分享型产品的面世与传播。从本质上来讲，朝鲜是从零开始，因此完全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全面的方式应用区块链、Holochain 之类的验证网络。

这种新型经济体制是共享型、参与式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相似。但其相关决策环节广泛分布于整个社会，从而避免独裁政治的产生，各个社会群体也因此得以分清各项任务的主次。

这一策略可以使朝鲜既从国际化获益，又不必对跨国金融大鳄言听计从。这种共享型经济体制完全可以替代剥削性、掠夺性的市场经

济体系。阿姆斯特丹 P2P 基金会同首尔共享基金会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

朝鲜可以让其民众融入全球 P2P 经济网络——这张网已经把韩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们便可以通过基于共生共享制的微制造产业来充分发挥潜力，而控制该产业的，既不是朝鲜政府，也不是美国的华尔街。这样，朝鲜不仅能够避免因劳动力与矿产廉价而遭受剥削，更可树立以人而非以资本为动力积极推动全球化的榜样。

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朝鲜以其自身为例，说明了人们需要做出何种基础观念上的转变。日本于 1910 到 1945 年间采取圈地殖民政策，剥夺了多数农民的土地，令其无法继续使用传统生产方式，从而摧毁了在朝鲜半岛乡村中盛极一时的社区互助体系。

共享基金会创始人崔勇冠（音译）表示，共享制在朝鲜半岛并非新生事物。“村规（hyanghak）规定社区中各人所担负的职责，但不会确定绝对所有权。日本殖民时期，这样的村规被付之一炬，随后源于残酷竞争的社会不公逐年加剧，财富也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共生共享制可以为富裕国家提供样板，向其展示应当如何与欠发达国家开展建设性、非掠夺性的合作，建立以民为本的分享型经济体制。而且共享型经济同外国投资和劳动力剥削毫无关联，因此并未被纳入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所对应的经济互动标准模式框架，是现实中的一扇希望之窗。

尽管西方媒体将朝鲜描绘成怪诞、封闭的神秘国度，但近日来韩国与之进行的几次协商说明，朝鲜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力求在由金融机构所主导的残酷全球化进程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本文作者所提出的全新观点，其意旨并不在于介绍某种新科技，而在于建议朝鲜建立可借其从全世界获得知识、技术、专家意见和财力资源的开放性平台，从而实现经济转型，摆脱金融寡头的控制。

做什么？

朝鲜掌握的新科技成果并不多，受营利主义和消费者拜物思想的影响也很浅——这二者已经把其他国家的文化撕扯得七零八碎。朝鲜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开始，因此在实现制度创新方面，史无前例地拥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条件。

朝鲜可以要求所有建筑使用太阳能；允许制造部门开展当地范围内的开源性创新；鼓励家庭之间共享无中介参与的服务；准许地方政

府发展与他国地方政府的关系，进行教育和社会交流。

朝鲜可以开创新型金融系统，支持本地企业通过使用数字加密货币和众筹来培育地方经济自主性，同时允许海外资金以众筹或全球支持者微投资的形式流入境内。

朝鲜所建立的共享型经济体制可以包罗万象：从真空吸尘器到锯子，从洗衣机到太阳能发电机，都交由社区托管。社区还可制订肯定所有公民贡献的互惠互助方案（包括照顾老幼、保洁和供餐等内容）。老少城乡居民之间可以结对帮扶，产生全新的协同效应。

朝鲜缺少高品质高速公路，对机动车的依赖性也较小。因此在境内铺设共营运输网络、全电气化交通网络，乃至推行以限制车辆需求为主要环节的城镇规划都是可能的。

共享型经济是一种植根于区域农耕和微制造的分享型经济。采用这种经济制度对缓解非持续性过度生产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度生产所带来的问题目前正在东亚地区蔓延，不仅催生浪费与经济差距，更是军事冲突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如若开放，朝鲜将为建立健康的 P2P 国际化模式提供无比宝贵的机会。

怎样做？

韩国应当发挥主要作用——不仅由于它与朝鲜使用同样的语言，还因为它已经树立起了成功的 P2P 经济体系先例。

韩国民众业已对参与式政治表现出巨大热情，这份热忱在 2016 年由数百万市民参加、要求根除政坛腐败的“烛光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四年前，首尔开启都市村落建设计划，为建设共享型经济提供强大平台。该城市最近调拨了 5,400 万美元，用于打造覆盖城区的区块链系统，同时为将其充分付诸应用而培养新一代专家。

朝鲜需要向 P2P 咨询委员会求助，委员会所关注的问题不应是短期的利益，而是经济与科技变革中所暗含的道德问题。韩国的有识之士可以担此重任，但各方同时还要在世界范围内集思广益，弄清楚如何避免落入埋伏在新型经济体系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朝鲜拥有丰富的煤、铀、铁、金、锌和稀土矿物等资源，据韩国资源矿业公司估算，其总价值约为六万亿美元。P2P 咨询委员会首先要提出的建议中，或许应当包含这一条：在朝鲜政府充分掌握环境评估情报，弄清楚大肆开采将对环境造成何种长期影响之前，禁止挖掘任何地表下资源。

在起步阶段，由 P2P 网络专家对资源开采、交通运输基本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空间发展议案开展审查尤为重要。

在其开放初期，朝鲜一定要避免背负沉重债务。委员会可以助其制定政策，保证投资方短期回报不在各项规划的考虑范围之内，排除资金外流的风险。为使朝鲜不致像解体的前苏联一样承担寡头政治抬头的后果，政府应当赋予人民组建社区银行、开创参与式金融机制的权力。

中国的儒家经典中也有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论述。比如《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天下为众人所共有。可见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与今人不谋而合。

朝鲜既可以做神秘、封闭、怪异的冷战后荒原，也不必追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步伐。朝鲜可以进行一次开创性的尝试，集区块链科技、微制造、可持续性能源基础设施与 P2P 系统于一身，成为为自己、为东北亚、为整个世界在新纪元向国际化前进引路的国度。

2018 年 11 月 5 日

在偏离正轨的时代我们呼吁真正的安全

我们总能听到最为颠倒黑白、荒诞不经的童话：一群亿万富翁及其拥趸意欲化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危机。

总是有人提示我们，当前的安全危机与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脱不了干系，而美国仿佛可以置身事外——虽然它非但没有销毁库存核武，反而宣布计划斥资一万亿美元开发新一代核武器，公然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18年7月，在首尔或东京度过这段日子的人们都知道，该地区最难以应对的威胁既不是来自于朝鲜的袭击，也不是来自南中国海中人工岛的建造。

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威胁，规模之大，破坏性之强，足以逼迫我们重新思量我们的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威胁，我们无法为之命名，无法化解，无法予以应对。在它面前，战斗机与导弹防御系统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即使它在东亚夺去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人的生命，即使伤亡数字还会成倍上升，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政客、我们所谓的“领导人”都对此选择视而不见。

今年七月，首尔与东京的气温或许创下了自二叠纪大灭绝以来的新高，在这股热浪里丧生的人中，穷困病苦者与工薪阶层的占比极大。此前不久，日本西部刚刚发生史无前例的严重洪灾，导致约两百人死亡。而同其他许多国家比起来，日本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

新闻一味地对如此反常天气大呼小叫，却未对其做任何分析。在首尔，人们见面打招呼时说的话都变成了：“这几天真热啊，到底是怎么了？”

对于这场危机，各家媒体既未解释其起因，又未阐明它与我们所崇尚的工业化社会之间的关系，几乎无一例外。

然而他们都知道那夺人生命的滚滚热浪从何而来，知道洪水与沙漠因何而生，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正每况愈下。

年轻人受到怂恿，只贪图当下享乐，而我们则把那份秘密隐藏起来。以煤炭和石油提供的能量来代替人与动物的劳力——我们基于此而发展的文化已遭遇全面溃败，做出彻底改变已刻不容缓。

放眼四周，气候变化的凶兆随处可见：天气越来越热，海洋愈发失去生机，沙漠大肆蔓延，我们赖以生为的现代农业系统日渐土崩瓦

解。

每次我们开灯、看短信、吹电风扇时，都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这并不是我们乐于知道的消息。

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的恶化正是由大量碳排放以及森林、土壤与水资源遭受破坏而引起的。

我们可以预见，环境状况还会愈加糟糕。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实现城市转型，全面重新制订能源政策，重新拟定与贸易、经济增长等环节有关的一切设想。

将会有怎样的解决方案？

在如此大的人员伤亡与毁灭性困境面前，人们几乎尚未展开严肃的思考。我们只知道，“碳排放交易”与“以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之类的提议似乎可以成为救命稻草。

可是，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将会有几万人丧生？在我们直视这场危机之前，食品价格会不会上涨三倍、四倍甚至十倍、二十倍？我们的孩子是否会无可避免地永远生活在对悲惨未来的恐惧中——即使我们尽力将他们蒙在鼓里？

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威胁毁灭朝鲜，或许我们应该为此心怀感激。但在美国，“气候变化”这一表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威胁，已经从媒体与政务讨论中消失，许多国家都在步美国的后尘。维护煤炭与石油大亨的利益才是华府的第一要务，这一病态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愈演愈烈。

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密切合作，尽可能地鼓起勇气，拾起道义与责任感，即刻采取战时经济举措，全面动员公众。

所谓“采取战时经济举措”，并不意味着各国需要发动战争。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应当关闭武器工厂，大力发掘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这里的“战时”一词并不是耸人听闻，这的确是一场战争——我们的敌手，是凭靠加深我们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宣扬浮夸的消费与浪费文化而暴富的既得利益阶层，其中的每一场战役，都需要我们鼓足秉持正义的勇气。

现在，让我们来回溯一下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四大自由”。那篇演讲是遵照 1945 年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向全球体系迈进的起点，而如今那份宪章几乎已经无人问津。

罗斯福呼吁保护全体地球公民的“四大自由”。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对这四种自由的阐述极为明晰，他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寻求安宁时，我们渴望看到的是一个矗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基石之上的世界。

首先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其次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信仰神明的自由——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再次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视角来看，即保证每个国家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的经济条件——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最后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即全世界彻底地大幅削减军备，直至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对其邻国实施实质的侵犯——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相比，向气候变化开战这一任务更加艰巨，更具风险。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清晰愿景、自我牺牲精神、对全社会的关爱、果决的斗争与痛苦的抉择毫不逊于往日。

我们需要再添上第五项自由：“免于污染的自由”，即无人有权污染空气、水，以及我们共同居住的宝贵星球。

东亚、美国以及这颗宝贵星球上的全体居民：我呼吁大家当机立断，迎难而上。

2018 年 8 月 14 日

清洁能源与人类的未来

听说中国政府计划于不久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这个消息令我振奋不已，我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奇怪的是，美国媒体对朝鲜核武威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却对如此重要的进展置若罔闻。

中国计划至2020年，共投入3600万美元进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今中国已经在太阳能与风能的开发与生产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某些国家认为靠设计几款花哨的新型智能手机与跑车就能拯救它们的经济，它们会大失所望。这种经济上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做出错误判断的国家可能会倒退几百年。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十九世纪初，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备的经济体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及太平天国造成破坏的时期，与中国开展贸易仍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其地位被大英帝国取代之前，传统中国的经济力量何以如此强大？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力量的来源有很多。当时该国专注于人民的长期福祉，拥有极高的教育水平，且避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行政部门高效运作，公共服务文化深入人心，要求特权阶级不唯利是图，从小就懂得自己有义务支援社会建设，在政府任职的也能全身心投入。

经济发达最重要的因素是能量的顺利生产——这一点在两百年前与今天都是真理。十九世纪之前，能量主要以人类与牛马等牲畜劳动力（风车与水磨是特例）的形式体现，而这种能量的源头是太阳。人类与动物必须进食，而后通过分解胃中糖类与蛋白质来获得能量。当时的食物主要是种植于田中的米稻、小麦、大麦等庄稼，而蕴含其中的能量的源泉是使其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糖分的阳光。

两千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最为高效，农业布局最为合理，因此制造出的能量也最多。政府与农民通力合作，对精巧的灌溉系统进行维护。同时其种植流程不仅科学，而且处于精心的管理之下——南方多季稻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完善的治理下，中国能量的生产规模在当时也许是无可匹敌的。

然而十八世纪晚期掀起了一场能量革命，中国人或许因为在农业生产上成果颇丰而没有急于追赶浪潮。在遥远的地方，英国人创造出了通过燃煤而获取能量的电力系统，法国人与德国人紧随其后。当然，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知道煤炭的存在，但只在欧洲才将蕴藏于煤炭中的能量加以利用，让自动生产设施作为人力的补充。而且这种浓缩的能量还被用于为军舰等彻底改变了战争性质的器械提供动力。

煤是远古树木经过石化后沉积下来的物质，因此比燃烧的木头或动物食用的植物饲料能产生更多能量。这种矿物为前所未有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全新潜能。中国早期的经济系统具有可持续性，也与自然相协调，但无法与这种新兴的经济体系相竞争。英国还凭借使用煤炭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优势——这一点从鸦片战争可见一斑。

然而大英帝国依靠燃煤取得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并非岿然不动。二十世纪早期，一种新能源可为人们所用：石油。石油也是由几十年前的树木沉积而成，但以液体状态存在，因此浓缩程度比煤炭更高。这次迅速采取行动、将这种新能源充分资本化的是美国。

美国很快为发展石油经济建起了高速公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还进行汽车的大批量生产，飞机与坦克紧随其后。当然，英、法、德等国家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美国可以自己生产石油，其制度的灵活性（此种灵活性英国已经丧失）也是迅速推广这种新能源的必要条件。汽车极为方便快捷，在它的推动下，美国成为了新的全球经济中心。

然而，尽管有些人认为美国建立在石油控制基础上的主导地位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但这场游戏还远远没有结束。对石油的开采利用导致的能源依赖甚至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对这种能源的渴求把美国拖入了与专制国家的亲密关系里，也拖入了一系列围绕石油与天然气而发动的、无止境的惨烈战争中。如今美国政府不仅阻碍人们停止使用石油，并且还在为石油生产提供资助。

而且气候变化危机的发生证明，将煤炭与石油作为能量来源是有代价的：环境受到灾难性影响，沙漠进一步蔓延，海平面升高，整个地球逐渐变暖。人们急需尽快淘汰矿物燃料。

如今，中国在公开挑战以石油和燃煤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已经在无所畏惧地接受可再生能源并且加以推广。虽说它也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但其环保方面的进步可谓日新月异。尽管它也有石油与煤炭行业，但它并不像美国一样，把这些行业放在经济的中心位置。此外，中国保持了独立于股市和投资银行制订长期政策的能力（这一点又与美国不同），因此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变。

当前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在太阳能与风能利用方面实现充分突破，因此也不足以改变矿物燃料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迅速占领先机。中

国还意识到通过停止大量进口石油与煤炭摆脱对矿物燃料依赖、促进贸易平衡的好处，同时也在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

这种突破与英德两国于十九世纪开始使用燃煤蒸汽机这一革新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他国凭借燃煤的力量破坏了中国的国力与军力，现在中国则可依靠全面的可持续能源利用政策立于全新能量生产框架的中心。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被卷入耗资甚巨的石油保卫战，而且可以拯救气候危机、减轻污染，实现能源独立。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太阳能与风能，主导相关科技开发，那么它将会掀起全球经济的根本性改变。上一次同等重要的转折，其代表性事件是大英帝国强势崛起以及鸦片战争的发动。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中国最大的潜力在于携其宏伟的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奋勇前进，同时使完备的有机农业与再生型经济重现活力——正是它们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世界巨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能源复兴是向世界飞跃与唤醒上千年前有关适度、效率、资源循环与可持续性的灿烂文化这两大壮举的结合。

生态文明是给全世界希望

近日我得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就制裁朝鲜这一问题举行会谈时，作为一个美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感油然而生。

读高中时，我便开始广泛阅读关于美国在越南秘密动作的资料，从而对美国的罪行有所知晓。二十年来，美政府与教育机构陷入腐败泥淖，愈加频繁地被当作在国内以至全世界推行军国主义、开展残酷剥削的工具。

然而，习主席与蒂勒森的此次会见迫使我从全新的角度纵观形势，质问致力于亚洲研究的自己，在美国置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之时，我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本次会谈的公开内容是为特朗普总统的北京之行制订计划，同时研究中国该如何强化对朝鲜的经济施压力度。

可是参与会谈的这两位人物在宗旨与背景方面有天壤之别。雷克斯·蒂勒森是一位史无前例的美国国务卿：他没有从政经历，没担任过公职，没进行过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甚至对公益事业毫无兴趣。身为艾克森美孚公司的前总裁，蒂勒森曾直接参与该公司掩盖气候变化真相的行动，这种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行为以环境与人类后代的未来为代价，其目的只是增强全球对石油的依赖度。此人在离岸钻井与油气开发方面所下的功夫表明，他对石油所能带来的利润的追求，远甚于艾克森公司对环境或当地人民所造成的影响的关注。

自从就职以来，此人一直在从内部腐蚀国务院，使其无法有效地开展外交工作。许多资深外交官只要稍有抵触便遭他解雇，其实此前已有众多优秀的外交人士已经自行辞职。

与之相比，习近平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政府机构中度过，对国内外政策与实践均有深入了解。习主席的政治事业始于与陕西贫苦农民的共同奋斗，更贯穿了地方和中央的各级管理。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大声宣布健康是一项人权，并就荒漠化的威胁发出警报。

习主席提出着重强化脱贫攻坚的决策时，我深感震惊——尽管在1964年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任期内，美国开展了“向贫困开战”计划，但至今仍有约五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而美国政治家们却对贫穷问题只字不提。

习主席与蒂勒森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背弃解决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的诺言之时，习却将环境与气候提升到国家政策的中心问题层面来考量。

习已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未来至关重要。

习所说的不是空话。中国政府已经在以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力度开发太阳能与风能，针对电动汽车提出的严格法规也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如今美国正在效仿中国的模式。

这种转变恰恰印证了习主席经常说的那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句话表明，环境保护以及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创造本身便是一笔巨大财富，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不可忽略。大自然所蕴含的价值绝不逊于如今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各项利益。

习强调自然的绝对重要性、应当将其作为经济决定因素，为将伦理道德迂回、引入经济政策打开了大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不择手段地赚钱，再进行分配”的冷酷论调背道而驰——其实许多中国人也赞同该组织的这一观点。

邓小平主席有一句名言：“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知它与上述论断是否具有相同的历史涵义。邓小平的意思是，在发展经济时，应当将着重点从人们的意识形态转移到发展手段的效率与效果上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而习关于绿水青山的论断高瞻远瞩，强调经济发展与道德原则密不可分，且应把自然环境保护置于这种道德原则的核心位置。

我认为习主席的论断强调农耕、可持续性与生态系统（之前人们称之为“风水”——现在被人误会为迷信但本来是生态学），因此并不仅仅是毛泽东理论的简单重复，更整合了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

他巧妙地将话语从由如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支持的、狭义的价值与经济概念，转移到更为广泛的议题上，同时暗示，我们应当对用来管理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原则开展更为深刻的变革。也许这意味着各国要回顾久被遗忘的《联合国宪章》的初衷，也许这意味着复兴中国儒家、佛家与道家传统的精华。

世界各地众多人士一直在等待如习一般的有识之士就环境保护问题做出英明论断。如果中国能于此时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接受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将更上一层楼。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已得到广泛认可。我们可以预见在新一届

党代会之后，更多致力于替代矿物燃料的宏伟政策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些政策也会变为全球战略。

反观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可谓江河日下，不仅大力提倡煤炭的使用，而且还将作用本就微乎其微的《巴黎协定》拒之门外。蒂勒森本人就是美国政府统治力日渐衰落的主要体现。只了解石油产业、毫无外交经验的蒂勒森并没有设法限制矿物燃料的使用，反而在绞尽脑汁地围绕它们制订国家战略。

如今说参透习主席论述的深刻含义为时尚早，不过一种涵盖合作与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或许能就此开启，把希望带给身处制度性崩溃危难之中的我们。

举办北京气候变化会议的历史性机遇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并撤销奥巴马政府为限制碳排放而准备的项目。8月4日,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已向联合国递交了文书,正式表达了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

在对其表示不满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美国的退出也许会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飞跃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不是吗?我们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果断地打开一条通道,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发展实质性的可持续经济。

美国政府和企业极力弱化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使该协定只具有单纯口头协议的意义,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明确框架,也没有对使用技术或政策作出相应要求。同时,美国一直执着于石油的生产和应用,对国际社会为应对目前的环境危机而推进的几乎所有措施都推诿敷衍。

现在美国正式表达了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全世界拥有了最终可能在人类文明中实现飞跃的巨大机会。我们需要在没有美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尽快召开新的气候变化会议。在这个新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中,有必要禁止与石化燃料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参与。

主导召开并领导该气候变化会议的一方应该是真正理解、关切气候变化的,而非获得大企业支援的政客。该气候变化会议应具有1945年联合国(UN)旧金山会议时的真诚,共同为人类的未来努力奋斗,而非只为短期利益。今日之世界,在美国对气候变化不作为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大国责任。

另外,我们还要通过该次会议,改变繁杂和不便操作的碳交易体制,在对大气污染进行惩罚的同时,构建可调配使用大规模资金的体制,以增加新的再生能源、绝热材料,提高能源效率。最重要的是强化与气候变化、能源和消费方面相关的教育,以便让全世界能够正确理解现有的危机。

如果在北京举行这样一个全新的气候会议,就可以展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气象,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体制中心,对整个亚洲乃至全球产生影响,同时这也将有助于制定以新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开发模式。

中国现在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通过“北京气候变化会议”有望对气候变化进行整体讨论。同时，该会议的召开，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紧密的经济和文化纽带关系，一定程度上扭转之前巴黎、奥斯陆和京都气候变化会议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弊端，以便更接近目前处于危机中的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

中国目前正大幅增加太阳能和风力能源使用量，计划截至 2020 年向新再生能源投入 360 亿美元。在这样的国际协议签订过程中，中国将发挥更高水平的作用。在新签订的协定中，要让为新再生能源而大规模调配长期资金的中国模式成为中心。事实上中国已经具有这样的经验。

即使美国政府不参加此次“北京气候变化会议”也不用担心，美国的个别州可能会单独加入该协定。例如，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六位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杰里·布朗已宣布，将自行开发气候变化政策，因此他很可能对此次会议表示关注。

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若美国在未来的主要产业太阳能和风能部门落伍，美国政府也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届时，美国将认识到最好的途径是遵守规定，而不是操纵已制定的规定。

中国拥有有机耕作、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为人类提供可代替西方消费驱动型经济的重要发展途径，鸦片战争却几乎将这一途径毁灭殆尽。

如今，是中国把握通向未来的绝佳时机，而这把钥匙恰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尽管很多中国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现实。中国独特的、源自于古时的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耕作传统，正是解决气候变化危机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求之不得的法宝。未来的讨论必须超出科技创新或经济手段的范畴。在算经济账时将环境与人类未来命运也纳入考虑范围，构建全新的全球文明。

本文发表于《金融博览》2017 年第 9 期，发表时的题目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机遇》

中国需要的是革新还是勇气？

在空气质量达重度污染的日子里——尤其在有雾霾时，经常听到中国需要革新之类的话，最近我禁不住想，相比革新而言，中国其实更需要勇气。当然，革新和勇气如果能够结合到一起，更是锦上添花。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雾霾、汽车尾气、工业污水污染物排放等等，大力发展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减少煤炭、石油开采量，大幅降低化石燃料进口，无疑是中国经济必须大力发展的优先方向。这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使经济走上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环境，乃至持续改善环境，这也是我们对后代应负的道德责任。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化石燃料消费带来的危险做出严重警告，提醒人们背负起对后代应有的责任。鉴于全球发展中国家纷纷将中国视为效仿榜样，中国如能快速缩减对化石燃料的依存度，必将带来超越国界的巨大影响。

即使仅仅从安保层面出发，中国也应该大幅减少使用化石燃料。20-3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实现100%可再生能源自给自足的发电目标，虽然有人担心这可能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但安保的重要性远在这些需要担心的问题之上。试想一下，如果亚太地区或中国周边发生冲突，中国被迫卷入战争，即使中国在军事力量上处于优势地位（事实上，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军事同盟等的存在，中国军事并无优势可言），如果为武器系统提供能源的化石燃料不能得到保障，能源储备与国内开采遭受攻击，海外进口通道受阻，这样的局面无疑是危险的。

中国经济和产业战略需要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发展蓝图，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可以为中国再度制订一个有深远意义的五年经济计划提供新的机会。中国拥有涡轮、电子、充电电池和太阳能电池面板所必须的技术，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大力发展的方向，关键在于政府。加速能源结构朝着可再生能源转变的速度，需要政策支持及政府出面积极主导。一开始可以由军方发挥主导作用。不同于其他经济部门，军方可以下令在三五年内把所有车辆更换为电力驱动，并且让所有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建筑都使用太阳能电池，强力推动执行。一旦军方打开一个大规模需求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和充电电池的市场，提供装备维护保修的专家数量将会迅速增加，企业也会信任

由军方保障的市场需求，企业家们将会乐意为未来的发展进行大规模投资。

对于造船产业，政府应该对所有船舶适用更高的能源效率标准，要求所有船舶设置风力涡轮或太阳能面板，使船舶使用的相当部分能源来自自主发电。另外，在中国沿海地区，建造多座风力发电站，建造利用海洋能设施，也应纳入计划。

汽车领域也是一样。政府应鼓励人们在五年内把所有汽车换成电动汽车，并对积极实践的人给予补贴奖励，同时对过了一定期限后仍未更换成电动汽车的人课以较高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此举不仅能够刺激制造业，激活中国经济，还使车主可以利用家用太阳能电池在家中为汽车充电。此举可使能源独立，带来长期可持续的空气质量改善，并使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确保具有新的竞争力，如此等等，政府补贴支出的花费是值得的。

另外，从政府办公楼开始，还应对所有商业和居住住宅适用严格的隔热标准，并要求所有建筑表面设置太阳能电池，并在所有窗户上安装透明太阳能电池面板。在要求所有建筑无一例外全部执行这一规定的同时，还应对老旧的住宅提供修缮补贴，使其符合规定。设置能源效率高的隔热设施，并在老旧建筑物上设置太阳能电池和小型风力发电机。这可以有效创造出青年就业岗位。

开发电动飞机也具有很大潜力。刚开始发展的电动飞机市场已经面向中国打开大门。利用在电子产业领域拥有的潜力，中国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局面。若想在 20 年后使化石燃料飞机成为旧时代的产物，抢占电动飞机市场，中国必须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最后，为快速培育产业规模使其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中国还应利用好与主要可再生能源产业主体缔结的合作关系。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建造环保节能型城市，将大自然原有的蓝天、青山绿水还给大自然，让中国人能像他们的先辈一样生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

2016 年 5 月 27 日

为了拯救地球 青年人能做的事情

上一代人对于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和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不去做深刻思虑的事实，让现在的年轻人们深感忧虑。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不仅对于环境变化关心甚少，而且也不准备为了环境保护而采取任何长期性的行动。关于环境问题的谈论，基本都是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类似北极熊或冰河一类的话题。这样的谈论所能起的作用，不过是让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与日常性的实践无关，仅仅是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专家们的事。除了寄希望于那些专家们可以处理好以外，普通人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青年人们经常被引诱去相信，那些掌握决定权的人们如果关于特定的文件达成共识并签字承诺，环境将会有所改善，或是轻易相信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能够做出某些贡献和富人们或高位公职者们可以带来某些革新性的变化等等。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为了环境保护可以具体做些什么的实质性信息，却很难接触到。在电视里出镜的大学教授或高位公职人员们，已经放弃了亲身实践，而是热衷于误导青年人们，给他们传达一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信息和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

必须要知道，高等教育机构所传达的知识里，假若缺乏伦理性的判断或具体的实践指南，那些知识就像是仅有血液流动而心脏停止跳动和肺部停止呼吸的身体一样。缺乏伦理判断的知识，是死的知识。而与传播死知识相比，更经常被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堕落为娱乐节目的显著征兆。娱乐节目可以转移和分散大众们对社会重大议题的公共关注度，这个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改善人口剧增、沙漠化、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界问题、农业危机和大气污染等问题，在各个阶段并不要求急剧的变化。但是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总是在不断重复极为僵化且与真正需要关系甚远的谈话。哪怕仅仅是为了真正的需要做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国际团体们也在回避。

他们为了自己的便利，仅仅关心对环境的消费，而基本不考虑后代的安危。

带来真正的变化，仅需要非常小的实践，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简单实践而已。为了亲身践行，并不需要阿尔·戈尔(Albert Gore)的气候政策，而仅仅需要勇气和想象力。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幸福的钥匙在自由里，自由的钥匙在勇气里。”

他的意思是说，在高档餐厅里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乘坐豪华汽车，并不能直接给人带来幸福。无论是什么，通过消费某种物品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与幸福越来越远。人想要在沉迷于消费的过程中，找到某种自我进步和提升的感觉，只是一种无益徒劳，并会迷失自我。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自由，在于你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总是轻易接受广告等媒体的宣传或身边人对自己的灌输。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可能找到幸福。当你真挚地去探知和去独立地去判断的时候，即使你一无所有，也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自由。同时，你可以获得在享用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等生活之中，所无法获得的幸福感。并且当一个人知道，消费昂贵的食物或住大且漂亮的房子的生活不仅会牺牲环境，也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时，他会跟随自己的良心去清算那种生活。

在这篇文章里，要做出几点倡议。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环境可以立即做的实践中，有些实践容易，有些实践则需要多一些的努力。同时与此相关，还会提出一些现实性的议题。虽然周边的人并不总是善于倾听，但为了自己与身边人的变化，如果有勇气并坚守信念，那么终会形成产生变化的力量。

这一点，有必要与周边的朋友们、父母、邻居们分享。如果去超级市场，那么就应告知人们必须做的事情。虽然这样做会给别人增加一些负担，但不断的坚持则会形成一种现象。不仅是你自己，周边的人们也应一起参与。这样的现象形成以后，则会成为普通市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多情况是，在日常的具体场所里不清楚要做什么。所以，不仅需要追求改变的意识，还要明确认识到需要怎样的变化。

就像环境专家詹姆斯·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懂得何为文化运动。

“我曾一直认为，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减少、生态界的崩溃和气候变化。我曾经预想，在30年之内科学会着重地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才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主题是自私自利之心、贪欲和漠不关心。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的是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变化。”

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你都不得不在‘消费文化’的紧张状态里挣

扎。我们被囚禁在迅速地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的‘消费文化’里。当我们认为消费他人和环境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当我们对现在的消费文化没有批判态度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处在问题状况之中。需要做的是要抵制消费和抵制怂恿消费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上幼儿园时节开始接受关于消费文化的危险性教育。对于那些关于人类的狭隘性解析观点所作出的警告信息，应该在我们阅读、视听和观看的所有媒体里反复传播。生活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至少消费不是其中之一。在与身边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也可以把消费主义和其所带来的弊端作为话题。为了建设以“对话文化”为根基的社会，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在像研讨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或者是在其它树立新颖主题的共同体活动中，也可以把现今消费社会的危险性作为主题。现在必须立即开始。

1) 再次利用并非最佳选择

关于再次利用的必要性的主张，或许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但为了再次利用把使用过的所有物品都收集起来的行动依然不足，并且不仅再次利用的设施不完备，关于再次利用的具体且明确的说明也不够充分。不仅如此，被卡车拉走的瓶子或易拉罐也并不像常说的那样，被切实地“再次利用”。与再次利用相比，它们更多的是作为其它产业的生产原料而被加工。再加工的生产原料被使用过以后，一般很少能再转变为其它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虽然塑料制品从石油里提取，再加工的过程中可以做成砖头，但是砖头也可以用其它原料生产。这所有的生产工程与循环利用的概念相距甚远。把废纸变为再生纸，当然比把废纸直接填埋要好，但再生纸的用途和价值是有限的。所以，尽可能地减少纸张使用是更好的选择。

很多情况下，再次利用会受到很明显的制约。对于像塑料一类的制品，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复杂的讨论，禁止使用是最正确的办法。类似这样的制品，不仅在再次利用时受到很多制约，而且危害也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不是一定需要，在最初时减少生产是最佳的方案。

因此，在对只使用几次就会被扔掉的制品的生产进行限制的同时，还需要生产至少可以使用几十年以上的坚固耐用的制品。产品的原料，最好尽可能地在本地消费地区内寻找。并且，对那些不易再次利用的制品，有必要加以限制，除非一定需要时才允许贩卖。归根结底，再次利用是一个伦理性的议题。严格地说，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

背伦理，则不可以使用一次性用品。虽然这样高的伦理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遵守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亲身示范和实践，让身边人警觉到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消费文化的危害性，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成为引发变化的一个进展。

2) 持久耐用产品的生产

建设完全的再次利用社会的第一步，是对持久耐用产品的生产。鞋与帽子必须能够穿戴 20 年以上，衬衫和裤子必须能够穿 10 年以上。如果对桌子、椅子、瓷碗、锅、笔等物品进行精工设计和制作，可以远比现在的制品使用得更久。把一次性的笔定为非法制品，只允许钢笔等可以多次使用的制品。

为了使这些成为可能，需要两点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必须振兴旧货市场和发展捐赠文化。例如，衣服或家具旧货市场必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购买这些二手制品，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保护环境的一种道德行为。如果你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因为孩子们一般成长得很快，在几个月后将不能再穿现在穿的袜子。但是，制作孩子的袜子时，必须使用足可以穿 10 年的原材料。并建设一个系统，保障因为尺寸变小而孩子不能再穿的袜子能够迅速地送到旧货市场。这样的系统如果建成，也将会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益。

生产持续耐用性制品还需要的另一点是，把制品的价值年限至少定为 20 年左右。如果一双可以穿 20 年的鞋比其它的鞋更贵，通过小额金融财团购买时，首先支付合理的价格，之后在穿那双鞋的期间可以通过小额结算的方式把余额付清。如果一条裤子 500 美元左右，最初以 100 美元买下，之后的 15 年间以每月分期付款 2 美元的方式支付。这种金融财团的运作必须简易，与银行的利益相比，必须把重点放在消费者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和长远的眼光购买优良产品之上。为了不让消费者们因为产品的丢失或损坏而承担压力，小额保险制度的运行也很有必要。

当然，虽然很多人都会经常轻易地扔掉雨伞或鞋子等物品，但这并不是雨伞或鞋子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发展新的文化，会创造出把保存视为首要且符合伦理的新的习俗与价值观。人们将会学着去珍视和妥善管理自己的物品，能够 10 年或 20 年以上地保存它们。我们必须超越当今的消费文化，向保存文化迈进。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保守”这个词汇里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文化。

3) 衣服、自行车、家具等等东西都能够被缝补和修理的体系

除了食物或医药品以外，所有不能修理的东西都应该被禁止生产。因此在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需要建立从厨房用品到衣服、家具、家电、相机等产品的修理与维护部门。即便像笔或订书机一样的小物品，为了可以便利维修，也应该改变生产工程和设计方案。新的产品不应该被扔掉。

为了实现这一点的第一步：

a 在法律上保障所有电子机器和机械的零部件都可以更换。并且，自行车或烤面包机、电脑、相机等产品的所有零部件都应该可以在不区分生产厂家的前提下进行互换。

b 把在家里自己亲自修理的事情视为美德的公共教育的建立。

c 修理时所需要的技术教育项目的增加：所有市民都可以方便地接受。

4) 如果制品不能为了再次利用而分拆，不应该贩卖

所有制品的生产工程中，优先考虑的应是再次利用的容易度。如果是由五六个零部件组成的制品，那些零部件一定要能够分拆和各自能够容易被再次利用。如果不能分拆，那样的物品必须禁止贩卖。

必须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轻松找到再次利用的设施，可以再次利用的物品目录和方法，也必须详细且明确地记载。像电脑主板一样复杂且再次利用困难的机器，应在支付过包括再次利用费在内的税收之后，才能被允许使用。类似的设施必须设置在居民区周边。

5) 环保卫生方案

超市、餐厅或医院等公共场所里，也需要实施价格低廉的环保卫生措施。现在，随处可见不必要的保鲜膜过度使用、冷冻或食物包装。这之外的医药品或其它制品也大同小异。即使不那样做，也能充分地保持卫生状态的方案和制品是非常多的。为了保持食品的卫生，认为必须包裹多层保鲜膜的想法是一种误解。通过信息传播和教育去纠正错误的信息，以此改善那些破坏市场的市场风俗，是很有必要的。

用保鲜膜包裹、密封和包装，到底有多少必要？在这个疑问面前，我们必须变得真诚。其结果是，以防止细菌为由，在内部和外部使用化学药品和塑料包装的制品，对于环境是一种灾殃，有时制品本身也会受到不好的影响。不应该重复不必要的、形式上的资源浪费，从原

始时代的祖先那里也能学到减少资源耗费的同时保持卫生的方法。虽然用很少量的水就可以清洗餐具或洗澡，但今天几乎没有人学习这样的方法。

6) 如果必须要砍伐一棵树，那么就种上三棵树

虽然大家都知道，为了展示而进行的植树，对于全世界的绿地破坏的防止毫无帮助，但我们每次都欣然地被那种展示性的活动所欺骗。现在，应停止那样的欺骗手段，直视正在全世界发生的绿地破坏的现实。在法律上，砍伐了一棵树时，至少要再种植一棵树的呼声必须提高。如果在这里有一平方米的土地被建筑物覆盖，那么在其它地方一定要有相同面积的土地得到保存或者扩张。

这一点，在贸易上也是同样的。在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等地伐木后，向富有国家出口木材的行为，比就近伐木后使用的行为更加违背伦理。

对自然产生危害的所有事情，必须严格地限制。同时，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树立保护绿地的目标。只有清楚认识到，持续的实践是改变世界的正确方式时，这个目标才有可能达成。在当今世界上，植树造林和减少碳排放量是充分可能的。但是，促进绿地建造的奖励政策还不完备。对于不再使用的建筑物，果断地拆除和建成绿地的政策是必要的。毁损绿地并在原地建造建筑物的事情，也必须被禁止。

7) 设立环境指数(gross domestic environment)

在市民社会里，必须向政府机构要求环境破坏所造成损失的经济层面的实际分析指数。这个指标必须成为主要数据。大气污染或水质污染、土壤污染等，如果是政策的后果或是某个工程导致的后果，在经济指标上必须计算这一损失。

这样的环境指数，应同时包括国内环境指数 GDE (gross domestic environment) 和国际环境指数 GGE (gross global environment)。必须按照一定周期不断更新这些指数和告知广大市民。以这个指数为基准，把追逐眼前的利益视为美德的政策或任何实践，都不应被允许。这样的指数，将会成为比耶鲁大学的环境评价指数模型更加精巧和复杂的升级型指数。

国内环境指数和国际环境指数里，必须包括各地域指数、国内总指数和国际总指数。短期指数、长期指数和关于情况变化的指数也都应该包括在内。这一新的指数，必须应由可以信赖的体系所构建，并

具备像现今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一样的权威性。现在误导我们的错误统计数据因为不把重大的环境破坏看作一种损失，这种从长远和实际的角度看，这些对我们无益的经济数值应该被果决抛弃。

8) 能源标示画面义务化

我们在对自己日常生活之中浪费了多少能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活着。看看周围，考察并告知我们使用的能源在以怎样的方式毁坏环境和给后代子孙们造成怎样的影响的指标，一个也没有。每一个人需要去自觉地了解，自己在每一瞬间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能源总量是多少和怎样使用的。冰箱、电视、电脑、淋浴器、烤面包机等所有东西上，必须清楚地标示能源消耗量。在所有公共建筑物里，也必须设置显示建筑物内能源消耗明确信息的电子屏幕。

虽然电源管理显示器也在被使用，但从现在开始应该在法律上义务化。这种画面标示，应为考虑所有机器的效率性而设置。所有制品在生产过程中应把能源消耗率列为首要考虑的事项，不能达到能耗效率标准的制品，应该受到生产限制。

9) 人们必须可以自己生产能源，并可以向别人直接出售

即使在技术上并不需要复杂的过程，事实上现在无论在哪里，个人很难直接制造能源并供给自己使用的机器。不得已，我们只是大型电力生产企业的被动性消费者而已。如果说有对案，就是开发一个系统，让个人能够直接生产自己需要的能源，哪怕是只是很少量，且可以相互出售。与完全的人别性相比，这样的系统可以以社区为单位，让每一个人参与到哪怕只是微量的能源生产之中，并把以后需要的电力储存起来或允许贩卖。人们设置太阳光板或骑两小时自行车就能产生少量收入的事实，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动机。这些都正在夏威夷实行中。

10) 以中产层为主要对象的环境运动，是无意义的

社会运动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大概是认为普锐斯（丰田混合动力汽车）的驾驶者们会考虑环境问题的错觉。即使是在律师、医生、会计师中属于高收入者的人们，大部分都相信在经济上对自己有利而选择购买电动汽车。只有年薪 8 万美金以上的高收入阶层，才会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购买和食用有机农产品。这所有的情况，简单地

几乎是非常奇特的。现在必须追求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持续可能型经济模式。

在环境运动中，如果不能在经济层面上开拓出对劳动者阶层有意义的议题，那么那种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多也不过是有产阶级主张的“为了创造就业，不得不破坏环境”的欺瞒性谈论和极其有限的改善而已。

从现在开始要做的环境运动，是把并非中产阶层的劳动阶层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让他们能够以便宜的费用过上健康的饮食生活，并且帮助他们找到可以在环境的危害中保护自己的方案。电动汽车应该比使用汽油的汽车更加便宜，并且大家应该能够以最低廉的费用利用大众交通。当绿色发展更加均衡时，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仅仅是受过高等教育受惠的人们所考虑的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再成为我们的主要关心事项。

11) 环境问题不是经济学或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美学的问题

虽然环境问题一般会被认为由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事实上环境问题与美学性的前提密切相关。贪欲、漠不关心和无法控制的消费文化，都起因于与改善气候变化的努力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混乱。我们对于世界的原有面貌不知感恩的浅薄美学观念，一直误导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应仅仅因其存在而被认为美。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世界的破坏，不能识别出对于自己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们一直生活在把由钢筋、玻璃和混凝土所建造的建筑物视为时尚和美观的文化之中。走在路上，如果在每次经过水坑时都能闻到腐烂食物的味道，那么我们就察觉到当今社会正在向精神贫困状态退步的事实。投入巨额的资金落成的建筑物和当地的匠人们制造的东西，虽然看起来粗劣和不实，但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时尚和值得信任。问题是，那种认识和美学观念会导致巨大的浪费。产业社会给我们植入了把消费、浪费和奢侈视为美德的根深蒂固的美学观念。跟以塑料和玻璃完美地进行防腐处理的世界和不知休止地破坏生态界的世界相比，如果学会了与多少会有一点腐蚀的东西相处的生活之道，更加美好的现实生活将会到来。

在环境运动中的一个主要挑战课题，是对于自然与日常生活不屑一顾的大资本家们的垄断式美学观念。很多人虽然把巨大资本或资本主义视为问题，但事实上那些问题都是由于错误的美学观念而产生。

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习性或文化的，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人性。为了谈论和改变人类的行为，现在必须从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最高水准进行阐述。

12) 冥想训练：观照理性的开发

我们仅仅以不能停止为由，大量地浪费资源。被不断生产的需要所引诱，我们在家的周围徘徊，吃不需要吃的东西，看并不对口味的电影，开着车外出寻找要买的東西、要吃的东西和要浪费的东西。但读书、瑜伽、冥想、写作等活动也分明可以做，并且与之前提到的活动相比，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与几个朋友一起关于读过的书展开讨论，关于那样的对话时间会怎样增加相互的纽带感，应该深入探讨。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几乎不需要消费的情况下，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可以做到的。

为了环境保护，任何技术都不能比行动上的变化做更多事情。通过沉浸在有意义的谈话中和与孩子们一起度过时光的方式享受生活，这样我们可以大量节约能源。

这些行动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冥想不是一件日常性的事。自己的思维方式会怎样影响日常生活？调节冲动的方案有哪些？对类似这些事情的深思和熟虑，正是冥想。冥想或瑜伽等，虽然看起来与环境问题完全无关，其实思想转换可以成为改变一切的基石。

如果所有市民们在上学之前就接受冥想训练，并被在寂静之中独自思考的文化所熏陶，那么下一代人将过上即使一整天坐在房间里，也能够感受到平和感与满足感的文化生活。

13) 必须坚持更加物质论的态度

当今的物质文明似乎意味着过度发达了，实际上现今的疯狂消费文化是因为不重视物质本来的固有性质而引起的。我们与物质本身越来越远，并且与实际体验的具体事物也在逐渐变远。只要为了快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随时交换一样，我们总是以价格决定价值的理念去消费。但这一系列的方式都不过是让我们与物质的真实面目渐行渐远。

无论是哪一边，消费文化都是以量的测定或质的测定为前提的。有多么昂贵或者有多么满足，都与此问题相关。这样的文化带来的后果，是不断造成更多浪费的同时，让人获得更少的快乐。我们的对话

经常是关于消费了多少的话题，而对于我们消费的物品里到底包含什么和有什么特性等却并不考虑。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物质本身的文化，仅仅是触摸树木或石头就可以获得满足的文化，懂得珍惜书籍和铅笔本身的文化等，是我们必须谋求的替换文化。对于单纯的物品或简朴的食物也懂得感恩的态度，可以很自然地减少消费。这时，我们周围的物品、自然、物质等都可以得到长久的保持，并让我们获得从任何水准的消费中都不能得到的淡泊的满足感。

14) 需要有勇气的决断

直面给气候造成恶劣影响的事物，需要特别的勇气。大部分的人们在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面前，不仅拒绝行动，甚至不去认识和了解。但是，现在需要拒绝使用塑料碗或一次性塑料袋的领导力。需要的话，要有准备忍受饥饿的勇气。

虽然是在与在战场上前进的勇猛不同种类的勇气，但也许这种勇气更加高洁。战场上有勇气站在最前线的人，事实上有很多。但是在包括家人和周围人的生活态度、现存制度或固有观念面前，能够持续地提出疑问并深入探讨的勇气，却只有很少人拥有。即使对社会与环境造成恶劣影响，但我们对于飞来飞去的飞机、电器产品的使用或网络的利用等，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谁可以在这些浪费面前断然地做出拒绝宣言和提出环境破坏的问题？

虽然因为忧虑海洋生态界而不吃海产品，或者不坐公交车而是选择走路等方式的勇气会引起一些不便，但可以促进其他人接受更好的观念。被那些拒绝直面现实的人们蔑视时，也必须充满信心。

这种勇气中最可敬是，走近陌生人并去劝说他们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刀叉、不要浪费食物和为了保护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态度。必须找到超市的运营者，告诉他们不要浪费能源、物品与食物。这种事情增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梦想真正的变化。

15) 即使痛苦和不便，也要直面无知

无知，和拒绝实际真相的多头怪兽一样，必须在每一个瞬间予以对抗。人们不去考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或他们的行动给后代子孙们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不能自我过高评价，认为由微小的事情就战胜了那种无知。人们经常建立一种隐蔽实际真相的思考机制。例如您的

母亲虽然知道 2 月份的气温明显偏高，但依然可能会说天气很冷。虽然那种心理是很自然的，但也是一定要打破的对象。

我们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要有勇气直面气候变化的实像和残酷的结果。并且，必须有勇气持续地谈论和呼吁，直到引起那些回避这些事实的人们的注意。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这种危机状况提供了或多或少的理由。无论大小，我们的所有行动都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的人受过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思维训练。无知和自我正当化，只会让我们与真实越来越远。现在在这里，我们必须直面真实。

16) 广告和媒体会隐藏人际关系

现在的文化仅仅把重点放在了给人以刺激和冲击上，出现了无需思考就可以享受的各种产品。现今的世界在不断怂恿人们停止去思考。部分原因是技术误用的结果。孩子们虽然可以通过电视看到不断出现的影像，但却看不到那些影像出现的原因。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对于在实际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变得不能理解。对于人际关系的不理解和由于对资本的欺瞒企划不能做出分别，结果导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行动的结果和不能理解人类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17) 错误的纪念物崇拜所产生的危害

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目睹由于混凝土和玻璃而忽视大自然的人类自我崇拜。这些观念的巨大且根深蒂固的结构在不断传播着类似“看，人类是多么全知全能！快服从吧！”一类的信息。我们从小时候就从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形象中反复接触到了这种信息。结果是，我们相信那样的文明可以让大地变得更有价值，个人与个人所属的社区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为更重要的存在。

当然那种想法是完全的错觉。建立从小时候就开始懂得尊重自然的深刻且单纯的美的教育，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在小且简洁的住宅环境下也可以找到价值，而在与人们的人际关系中寻找价值也是同样的。我在此主张，雄伟的建筑物可以扩张我们的经验、丰饶我们的生活、发展我们的文明的粗劣观念是一种错误的崇拜文化。这种文化错觉虽然在现今的消费文化中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必须被逐步和慎重地改变。

第四篇

未来的安全保障要敢于想象

蓬佩奥为美国“外交之棺”钉上最后一枚钉

蓬佩奥国务卿几个月内第三次访问朝鲜。这个级别的访问在过去将近七十年中只有一次：2000年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访问平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蓬佩奥访问的频次，难道是他爱上了平壤的泡菜吗？或者，一直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蓬佩奥突然变卦了？

蓬佩奥七月五月访问平壤协商美国与朝鲜的合作。美国新闻说他将与金正恩委员长讨论如何在一年以内拆除所有的核武器、远程导弹以及跟核武器有关的技术设施。但如果我们看看蓬佩奥的行为，完全与和平背道而驰：他不断地支持美国增加军事投入，而且积极支持对伊朗动武。

特朗普政府篡夺国会权力，置美国公民（他们眼中的愚昧百姓）的想法于不顾，违背国际道义退出伊朗核协议，进而又公开支持以色列军方与警方使用高杀伤力武器对耶路撒冷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展开血腥屠杀。我们知道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心怀道德标准的男男女女都已不见踪影。此时此刻，特朗普却表示他会为朝鲜半岛带去和平。

尽管美国与朝鲜的互动可能会产生某些积极影响，但发生在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伊拉克的屠杀证明，支离破碎、穷兵黩武的美国根本不会成为和平的源头。纵观整个华盛顿，我们眼前只剩下了由二手车推销员经营的、打了折扣的国际关系，由杂耍艺人和皮条客拼凑出来的策略，以及由花花公子和投机分子编造出来的政策。

在他们的高调宣传中，美朝首脑峰会酷似一场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不断发表好战言论的哈利·哈里斯大使与迈克·马伦上将等鹰派人物在旁煽风点火，再加上特朗普“逆我者亡”的暗示，峰会前夕的种种，简直与当年穆罕默德·阿里拳王赛前对乔·弗雷泽的嘲弄如出一辙。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娱乐性与恐怖效果兼备的套路一定比无聊的、承载着责任的切实政策更合他的胃口。

整个过程根本就是一场无意于唤醒观众良知、只顾迎合他们的低级趣味的闹剧。在这次峰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一味装模作样地煽情、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让人不知所云，不过这足以让他在中期选举中蒙混过关。

我们在考虑下一步举措时，应当首先揣摩一下美朝峰会期间从未提到过的问题：

1) 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展开了可怕的军备竞赛；

2) 美国公然违背《核不扩散条约》，大肆研发新一代核武器；

3) 朝鲜半岛及毗邻地区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土地贫瘠化问题在朝鲜十分严重、在韩国也愈演愈烈；

4) 朝韩两国财富集中问题逐渐加剧，由此导致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扭曲不可忽视；

5) 媒体堕落，人们无法获得有意义的新闻。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方向，施展政治上的“合气道”，接这两位首脑的招，借力打力，巧妙地将其朝着积极方向引导，在博弈中占得上风。这一目标可以实现，但需要身为公民的我们付出巨大努力、倾注大量心血。

如今发号施令的特朗普团队不过是一群毫无价值、像苍蝇一样围着“甜爹”飞舞的极端分子。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不是保守人士。他们更像精神病患者，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的后果、核战争乃至他们子女的未来毫不关心。他们要么是富豪，要么是富豪的鹰犬。这些人已经成功地切断了美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纽带。

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跟随他们心怀喜悦地迎接未来，但我只想对这群声称要发动世界大战的疯子敬而远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会出现何种武器，但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只能使用木棍和石头。”我得说，考虑到当前各国已经拥有的军火数量，再加上气候变化即将导致的大灾难，爱因斯坦未免太乐观了。

2018年5月24日是一个转折点，是“没有意义的一天”——黄睿（音译）在描述明朝末期体制崩坏、曾经强大的政治实体从内部土崩瓦解时，用了这样的表述。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在百姓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许多中国人对发生在5月24日的两件大事置若罔闻——他们要么在为生计奔波忙碌，要么沉迷于电子游戏与肥皂剧中，以此来逃避残酷的现实。但对于执着于追求真相的人们来讲，这两件事可谓意义深远。

首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给金正恩写了一封言辞浮夸的信，引发网络热议的同时也令众多媒体专家一本正经地津津乐道。这封信不啻于一份公告：美国总统现在是“最高领袖”，不经国会许可、不参考专家以及任何人的建议即可代表美国针对全世界作出决策，只要他

愿意，可以毁灭世界。对于这封信上的言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在自欺欺人，说这场政治噩梦不过是暂时的误解。



请看净做可笑错事的小丑总统！

无视门口的人！

就在特朗普发出这封粗鲁而又极具威胁性的信函的同一天，朝鲜邀请了各国记者前来见证丰溪里核试验场的爆破行动。因此这封信对朝鲜人、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所有为召开美朝领导人峰会、开启双方切实对话而付出心血的人来讲，都是明目张胆的侮辱。此外，这封信不只是写给金正恩的，它是要告诉全世界，如果特朗普团队意欲发动战争，那么他们可以跟对方协商的，只是对方投降的条件。

5月24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一个重要活动被取消，特朗普政府突然命令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撤销对中国参加2018年夏威夷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邀请。该演习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军方开展合作、交换意见

的重要平台，军事专家也将其视为保证太平洋沿岸两个大国协作互助的关键活动。早在2017年5月，特朗普政府便已邀请中国参加该军事演习。

在取消新加坡美朝峰会的同一天撤销已经发出的对中国的邀请，这是巧合吗？要知道，为使美朝双方首脑的会晤成为可能，中国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种行为，除了把它看作对中国的严重羞辱，很难有其他解释。中国与美国的普通民众也许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制定军事规划的相关人员无疑对这一决定的意义心知肚明，了解它将会产生数十年的深远影响。这种决定并不是意外的产物，而是他们的全部想法。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有部小说叫《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讲述的是三个虚构角色受一战时期崩溃的文化秩序所困，茫然度日的故事。布洛赫描绘了当时德国受教育阶层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人们像梦游者一样生活，在社会中和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他们完全无视经济与体制崩溃的征兆。因为即使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无所察觉，社会也能继续运转。这多么像是今天相当数量的美国人的写照。

也许你听说过特朗普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读到过认为他的轻率举动与当初罗纳德·里根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的社论，可从中获得些许安慰。然而，当时冷战即将结束——难道这样的历史背景也与现在的状况相似？

如今我们见到的是，在美国，决策过程只有一小群人参与，他们对人民毫不负责，不听取国会的意见，专家的看法更是被束之高阁。导致这出悲喜剧上演的，也许不是特朗普的政治天赋，而是美国正常政治话语体系的倒塌。智者已退守自己的私人世界，大多数民众获取知识与新闻的渠道相对闭塞，只能自求多福。“幼稚的甘比诺”(Childish Gambino)制作的《这就是美国》(This is America)视频将美国盛行的物质崇拜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人们的脑海中，911恐怖袭击事件、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等一幕幕惨剧已然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鲜事物。民众已经沦为一心寻求刺激的消费者。

大师级傀儡与傀儡大师合二为一：蓬佩奥

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粉墨登场，成为了美朝会谈的中心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蓬佩奥与美国历史上的

任何一位国务卿都截然不同。他由于对亿万富豪兄弟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唯命是从而上位，眼中只有那几个掌握财富的出资者。

官方记录显示，今年他曾先后以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的身份两度访问朝鲜。他曾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参与朝鲜弃核计划的相关讨论，后来金正恩主席和金永哲副主席与之会见。考虑到特朗普上台后白宫频频释放虚假消息，而且众多事件动不动就会被定为顶级机密予以保密，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的赴朝之行是否真的仅有两次，而且只有政府官员参加。既然分析学家们总是想入非非，无凭无据地将朝鲜先发制人、对韩国和美国开展核打击的场景描述得绘声绘色，请允许我在这里也发挥一下想象力：

飞往平壤的飞机上很可能还坐着科氏工业集团的代表，他们打算与朝鲜签订独家合同，开采那里的自然资源。朝鲜的煤、铀、铁、金、镁、锌、铜、石灰石以及稀土金属（用于电子工业）的储量十分丰富。据韩国矿业企业韩国资源公司（Korea Resources）估算，这些矿藏的总价值在六万亿美元左右。即使不能将其全部开采，可以获得的利润也不可小觑。飞机上也许还有其他大企业派出的代表，他们都想与朝鲜签下独家协议，要么是为了修建那里的基础设施，要么是为了给美国农产品开辟市场。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蓬佩奥在平壤与金正恩见过几次面，但并没有与之严肃地讨论过防止核扩散问题。蓬佩奥对执行防扩散协议、商讨外交合约的技术流程与艰巨性一无所知。多年来，他一直在国会中冠冕堂皇地破坏伊朗核协议。而且，国务院原有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部被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降职、解雇或逼迫退休，蓬佩奥的身边现在只剩下自私自利、愤世嫉俗的无能官僚，因此他根本无法开展切实的商讨。

蓬佩奥带头推波助澜，让美国做出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这无疑是美国正当外交之棺上的最后一枚钉子。签署这样的协议需要具备防止核扩散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公之于众、记录在案的多次磋商，需要各国紧密合作。这份协议所涉及的国家，不只美国一个。美国现在对国际法律与外交公约的无视，已经到了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了解过蓬佩奥在商界与堪萨斯州政坛中的履历之后，我们不难猜出他会在平壤讲些什么：替美国企业拿下合同，开采朝鲜的自然资源、剥削其廉价的劳动力。就算“防止核扩散”一事被偶尔提及，也不过

是他用来搞炮舰外交的工具：“把合同签了，把你们的煤、铜、钢、铀和金矿统统交出来，不然就等着我们入侵吧。”

蓬佩奥心中的模式以伊拉克为样板：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多国公司对其进行了开发。他们的计划是瓜分那里的矿物燃料资源，让贝克特尔与哈利伯顿公司（Bechtel and Halliburton）签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即使伊拉克当时并未打算大兴土木。这一模式与蓬佩奥在华府的众多客户计划对伊朗展开的经济开发别无二致——他们也打算分享那里的石油资源，而其先决条件，要么是政权更迭，要么是爆发战争。

蓬佩奥在会谈中商讨的内容

我们首先来看蓬佩奥5月14日自平壤回国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他这次会谈的内容或许从中可见一斑。

“美国人将会介入——不是美国的纳税人，而是私营领域的美国人——私营领域的美国人将出面帮他们建设电网。朝鲜人对电力的需求很大。”（美国之音）蓬佩奥暗示，大批“私营领域的美国人”将涌入朝鲜修建电网，对纳税人来讲，这具有正面意义，并不是负担。然而关键在于，不论朝鲜愿不愿意，贪婪的、意欲攫取暴利的私营企业所铺设的电网都将浪费那里的能源，而它所消耗的廉价煤炭将由蓬佩奥的头号客户——科赫兄弟在当地开采。

朝鲜需要的不是大量电力，而是由来自高校的专家所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援助，是同全世界愿意为切实解决问题而付出努力的有识之士交流互动的机会，是让民众了解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启蒙行动。

蓬佩奥认为，要让朝鲜民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就该让他们“有大量电力可以消耗”。最近这种说法被美国媒体反复提及，然而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即使不大肆消耗能源，朝鲜也有许多发展途径，而且它可以摆脱只顾眼前利益的企业的干预，制定自己的政策。

事实上，美国企业借以搜刮技术工人、榨取利润的低薪工厂似乎更需要电力——那里的工人遭到的剥削，甚至比在越南和中国的同行还要严重。可以肯定，这些企业根本不在意朝鲜人民的福祉，它们只想找到通过残酷盘剥榨取利润的新机会。

在蓬佩奥心中，大量使用煤炭对空气和气候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有记录表明，他曾厚颜无耻地鼓励科氏集团旗下

的空壳研究机构编造垃圾“科学报告”，以论证宣扬：气候变化不过是谣言，矿物燃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要素。他还经常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对可以保护美国公民免遭工业污染侵害的法规发起挑衅。

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蓬佩奥还说：“我们将与他们合作，修建基础设施，建设朝鲜人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用美国的农业来支援朝鲜，让那里的人吃上肉，过上更健康的生活。”蓬佩奥心中的“基础设施”，应当包括高速公路、发电厂、净水厂，以及专供富人享用的住宅大厦和豪华超市——这样的基础设施只能加重对普通民众的剥削，供社会上层醉生梦死。该计划一旦实施，朝鲜就会对国外科技产生严重的依赖性，无法从一开始培养自己的专家。而且，鉴于特朗普团队正在掏空政府，欲把整个美国归为己有，那么届时他们在朝修建的基础设施肯定将由跨国企业运营，变为他们生产利润的工具，而可以从中获益的朝鲜人民恐怕少之又少。

在蓬佩奥愚蠢的言论中，“让朝鲜人民吃上美国肉”这一观点最令人反感。他表示美国生产的肉类可以增进健康，完全无视科学调研结果。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在饲料中滥用合成激素与抗生素，美国的牛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我本人一向对它敬而远之。更重要的是，尽管朝鲜人民也许可以从中摄取更多的蛋白质，但让他们在自己国家小规模地饲养鸡、猪等家禽家畜要好得多。这样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的工厂化农场造成的污染简直难以估算。牛进食的不是青草，而是玉米，由此产生的沼气全部排进空气中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进口肉类，朝鲜会得不偿失。朝鲜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在历经几十年的破坏性工业化养殖后恢复土壤质量、重新造林；朝鲜人民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国农业产品，尤其是麦当劳餐厅等缺乏基本营养的快餐食品。

不论特朗普发多少天花乱坠的推特，朝鲜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也无法重圆，社会、医药等重要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未能与朝鲜民众开展广泛接触，学者们甚至没有进行关于“朝鲜人民的真正福祉为何”的讨论。美国国会已经宣布，只要朝鲜的去核化成果没有让特朗普政府满意，对朝制裁就不会撤销——对朝鲜来讲，这一任务堪称艰巨；而谈到去核化，特朗普等人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

美国“门面”与实质之间的鸿沟

美国国务院的门面——哈里·杜鲁门大楼——是在华府实习的各国大学生拍照留念的热门景点。该建筑于1941年落成，正面铺设印第安纳石灰石，低调而又庄严，堪称公共事业振兴署作品的改良版。岁月给它增添了几分神韵，一见到它，人们就会想起与法西斯不懈斗争、不辞辛劳的外交人物，以及同乔治·马歇尔国务卿一起焚膏继晷、为建立联合国而费尽心血的有识之士。然而这些美好的回想同今天在大楼中发生的一切无甚关联。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费尽心机，将博闻广识、德才兼备的高级外交人员清除了出去：要么直接解雇，要么制造紧张气氛，逼其自动离职。现在这栋大楼只剩下一具空壳。



“是的，你猜对了。”

看上去左边有一个新挖的坟墓”

尽管国务院已经行将就木，但这场旷日持久的绞杀行动才刚刚迎来高潮。国务院之死不过是联邦政府末日的序曲，这一过程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来，罗纳德·里根及其富豪密友于 1981 年掌权后，立即撤销了联邦政府雇员曾经享有的保障，以瓦解其联盟。公务员们失去了根基，再也无法给政客把关。知识分子不再青睐政府工作，转而投身法律、银行业等领域。里根政府还迈出了政策制定私人化的第一步，开始将纳税人的钱投向私人智库、咨询公司等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寄生虫般的机构。政府缺乏建立专业团队的资金，只好对他们手下的顾问唯命是从。自那以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乔治·W·布什上台后，针对国务院中的专家派别斗争采取了新的紧急措施。他在白宫中集结了一群右翼极端分子——只要有机会，他们随时随地会掀起战争。然而政府内部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任命的乔治·特尼特留任中情局局长，开明共和党人科林·鲍威尔接任国务卿，尽管二人并非英雄人物，但他们能够长时间地保留自己的职位，意味着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能够为所欲为而展开的清除异己行动部分受挫，联邦政府中对外交与安全问题的正确态度、才高进取的核心人士得以保留。即使在切尼炙手可热的时期，他们也发布了报告，公开与布什团队制定的政策抗衡。

切尼及其伙伴意欲向伊朗开战，但至少有多次，其发起的行动因少数派的反对而宣告失败。随后右翼分子决定从内部摧毁公务员系统，并将相关职责外包给企业。显而易见，只着眼于利润的私营企业只会对他们唯命是从。

政府的其余系统也都面目全非。高级官员退休后可以做政府顾问，收红包、赚大钱，而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却急转直下。如今的政策制定体系完全不符合宪法规定，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原本属于政府功能的政策决策工作，现在却交给了毫不可靠的营利性组织。

尽管国务院自身没有专家团队，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但蓬佩奥显然握有实权，能够将自己想要的政策制定完毕。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权力似乎高于之前的几位国务卿，因为他可以完全无视国会，肆意践踏法律与程序规定。

为了弄清楚他的这种权力从何而来，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沦陷过程。各级政府无力回天，失去了为企业把关的能力，同时又把政策制定这一职责交给了以赚钱为目的的律师、说客和顾问。不仅如此，全国公民更被排除在美国的民主化进程之外。希达·斯考切波在《民主的衰落：从公民成员到公民生活的管

理层》(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一书的终章中,描述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退出各种集体活动与民主实践的。以往他们经常来自各个领域的人彼此在家长会、莱恩俱乐部早餐会和共济会仪式上见面,在退伍军人联盟、妇女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和童子军组织中同舟共济,如今却要么形单影只,要么跟寥寥几个朋友在星巴克咖啡厅里一本正经地讨论大众文化。

以往上述组织会进行选举,让公民参与管理组织内部的本地事务。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过去15年以来,多数公民只在社交媒体上交换意见,没有跟需要他们参与、尽义务的任何活跃组织发生关联。结果是什么?选举活动与政策的制定看似在照常进行,然而这样的选举只由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主导,与跟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因此愈发在人们心中变得陌生、无关紧要。政府效仿企业,采用非透明、非参与性的“管理”模式,将民主过程抛诸脑后。

民主过程缺乏普通公民的参与,导致富豪家族及其企业有机可乘。他们投以巨资,建立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要么兴办报纸与杂志,要么利用昂贵广告收买媒体做自己的喉舌,同时资助“专家”在各个新闻节目中频频露面,就朝鲜造成的威胁、自由贸易的好处等问题大放厥词。从事这些勾当,蓬佩奥简直游刃有余。

美国支持特朗普政策的“保守派”不过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的产物。由少数右翼企业操纵的商业媒体频频释放虚假信息,他们满怀委屈,拼命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了解这个日趋疯狂的世界。可悲的是,那些受到命运眷顾、在富裕家庭中长大、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们常常谴责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傻瓜”,丝毫不考虑对方的境遇。

为照顾企业的经济利益,花费巨资雇佣专家、记者,为虚张声势的民众运动摇旗呐喊;搞各种没有观众的活动,同时聘说客来营造某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假象——由非政府组织“美国式人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种行为。报告问世二十年以来,事态愈发恶化,黑色交易已在美国政坛中靡然成风。

企业影响力的扩大仅仅是美国政府政治过程面目全非的第一阶段。长期以来,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种现象更使得美国岌岌可危:超级富豪掌握的财富几乎呈现指数级增长,亿万富翁阶层已经可以取

代大企业，像皇帝一样不负责任地随意制定政策。同时，在过去的五年里，企业减税计划仍在实施，对企业利益的限制也在不断放松，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由此而生。财富-X 报告（The Wealth-X Report）及其《2018 年亿万富翁调查报告》（Billionaire Census 2018）显示，2017 年超级富豪掌握的财富共计 9.2 万亿美元，增长了 24%，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2%。尽管二十年前的强企业总裁也对国家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被限制在私营领域活动，且对环境宽松的精英体制有所青睐。而现如今，企业总裁要给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让路，后者的语录充斥着媒体，仿佛他们是现代先知。

还有一伙超级富豪利用大量隐性资金和对媒体的秘密控制将特朗普推进了白宫。这伙人中，有坚定的亲以色列派谢尔登·阿德尔森，有伯纳德·马库斯、罗伯特·默瑟，更有煤炭与石油大亨戴维·科赫和查尔斯·科赫。他们进行了一场豪赌：只要往政治圈里扔的钱够多，就能让美国的选举系统短路，选出一位服务于他们的需要的总统。他们打算借前后矛盾、荒唐搞笑的推文和傻话连篇的报道来迷惑、误导大众。现在看来，他们的招数并没有落空。

即使在仅仅五年前，这一幕都不可能发生。“税制改革”以来财富的大量转移表明这群人和他们的同伙已经被权力冲昏头脑，还会得寸进尺。戴维·科赫与查尔斯·科赫（二人身家总计 1000 亿美元）成就了蓬佩奥，因此后者只对他们的需求负责，置联邦政府公仆的责任于不顾，更视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无物。当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蓬佩奥是个聪明人，可他是凭借自己对科赫兄弟毫不动摇的忠诚上台的，而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早就明白，身后有这样可以迅速积聚财富的大佬撑腰，根本不必浪费时间讨好普通百姓。没错，蓬佩奥握有实权，不可小觑，而且他正在就朝鲜问题与哈利·哈里斯等人角力。然而他权力的源头并不是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乃至国防部中辛苦劳作的公务员，而是科赫兄弟以及对他寄予厚望的企业所撒下的广阔关系网。在国会议员中，蓬佩奥从科赫兄弟及其煤矿企业收取的献金最多。《记录调查》（Documented Investigations）导演丽莎·格拉夫斯在采访中表示，蓬佩奥从政治生涯开始时便与科赫兄弟紧密合作。他本能地支持由科赫兄弟提出的法案，故意无视他在堪萨斯州的支持者们的看法。在科赫集团削弱政府权力，使其无法为保护环境而规范企业行为、让公民接受自我决策方面的优质启蒙教育的行动中，蓬佩奥成了领军人物。

空壳智库应运而生，不断宣扬“有限政府”之类的理念。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解决政府的权力滥用问题，而是要限制政府功能，使其在企业的违法行为面前无能为力。食物与水观察组织（Food and Water Watch）负责人维诺纳·豪特认为，“蓬佩奥是机会主义者，谁出价高就问为谁卖命。”他不顾堪萨斯州公民的感受，阻碍各州行使要求为转基因食品添加标识的权力。他只关注孟山都公司的利益，帮他们推广危险的农用化学品，在全体农民与农业综合企业之间建立不健康的依赖关系。

在国会中宣扬伪科学、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散布由科赫集团旗下组织捏造的虚假研究结果、宣称污染对人类的不良影响与科赫集团的公然犯罪行为并不存在，这就是蓬佩奥的所作所为。豪特解释道：“我们知道科赫兄弟正在斥巨资宣传垃圾科学，编造‘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存在，各方并未达成共识’的论调。我们知道这完全是谎言：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已有定论。”然而科赫兄弟并未罢休。抗议组织“我的校园不要科赫”（UnKoch My Campus）披露文件显示，科赫兄弟一直在聘请大学教授、建立专家团队，鼓吹经其歪曲的“自由市场”政策，以此证实为国家的前途考虑，政府取消对企业的监管势在必行。某些大学在暗地里对他们言听计从，甚至大学里的相关人员任免都由他们决定。他们还大力推广“青年企业家”（Youth Entrepreneurs）活动，告诉大学生与高中生，企业的赋税越低越好，政府的监管越松越好。

新加坡峰会

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中，有一场盛大的媒体狂欢，特朗普与金正恩正在上演与外交政策结合的新版真人秀。我们看到的是可以与拿破仑三世和“疯王”路德维希二世相媲美的国家领导人。

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翻着白眼，福克斯新闻和 CNN 在不遗余力地捞钱。对于信奉娱乐至上的商业媒体来讲，国家的良好政策是最无关紧要的。为了给这次峰会做准备，特朗普看了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和《老友记》，又发了几条含糊其辞的推特。这样就行了，会出什么问题？

朱利安尼暗示，特朗普本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暗杀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自从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前政府官员之间已经很少开这种玩笑了。朱利安尼随后宣称，金正恩是在特朗普的强压下请求开启峰会的——这是他们用题外话搅混水、使任何一种结果成为

可能的老套路，同时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对此特朗普未置一词。隐藏在他们言行背后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彻底崩溃与使用武力趋势的抬头。

新加坡峰会之后续

首先，新加坡峰会是特朗普等人在即将与联邦调查局背后的政府派系展开决战之际，借以实现政治三角化、巩固权力的工具。民主党已向右翼倾斜，为击败共和党而抄袭了对方的剧本，成为这次事件中的强硬派。他们宣布，除非朝鲜达成五个条件，否则绝不同意撤销对其的制裁。这些条件可谓令人憎恶。民主党倾向右翼的举动与对俄罗斯的强烈关注给特朗普树立了硬朗、开明的形象；相比之下，主流民主党人与某些共和党人更显得戾气满满。对美国历史上最保守、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总统来讲，这一“成就”不可小觑。然而民主党的转变并未止步于此。众议院的民主党代表中，将近半数具有军方或知识分子背景，许多人陷入了激烈的利益冲突，难以缓和対俄罗斯、伊朗、中国以及朝鲜的强硬态度。一言以蔽之，今天的民主党已经与被冠以“民主”之名、曾大力支持丹尼斯·库西尼奇和保罗·威尔斯通等睿智人士的组织无甚关联。

其次，一面是美朝峰会，一面是美国军方掌权派系意欲在美国与伊朗、俄罗斯之间或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发起挑衅，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加速上升。

也许你翻阅过特朗普所有表示寻求朝鲜半岛和平（却没有任何具备约束力和法律价值的东西做支撑）的推文，但你有没有听过新任驻朝大使哈利·哈里斯在5月30日的讲话？他说：“朝鲜目前仍然是我们最为紧迫的威胁。决不能接受一个拥有核能力、可以把导弹发射到美国的朝鲜。”你也许没有留意，但中国人和朝鲜人一定注意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排挤已经严重到极点。对赴美中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起诉中国企业从事间谍活动，违反法律规定与国际协议、展开大规模贸易报复，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主流。美国正在逼迫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和韩国与中国针锋相对，且彻底把中国关在协商的大门外，使其无法参与有关朝鲜未来的讨论。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简直毫无策略性可言——当今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六分之一地球公民的家园。更不用提中国正在就美国做不到的事付出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推广可再生能源。

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同盟国在会谈时，对保持与美同盟关系的热情却似乎在日趋减退。它们在军事同盟问题上出人意料的沉默昭示着它们愈发强烈的矛盾心态。

我们正在见证美国外交政策上的“红巨星”效应。恒星即将消耗完核心中的氢至核反应停止后，便会进入生命的次末期，变为红巨星。惰性核心在其自身的引力作用下不断收缩，吸收外部的氢，在其周围引发缓和的、非集中的融合反应，此时恒星的体积会剧烈膨胀，而密度却大幅降低。红巨星继续燃烧，最后坍缩为白矮星。与此相似，美国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同时却面临亚洲专家培养系统崩溃，大使馆及智库人才匮乏，两地区文化和学术交流衰减、人民无法保持紧密联系等问题，因此失去了发掘新创意以及制定合理政策的核心能力。美国最终会膨胀到失去控制，无可避免地面临骇人的全方面紧缩，但这一过程并不会像恒星演化那样历经数十亿、数百亿年。

这次峰会，正如我事先的预料：特朗普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峰会倒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做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最后阶段的遮羞布。

我们所面临的终极问题，是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与 1945 年联合国大会上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被特朗普等人及其全世界的盟友与伙伴毁灭殆尽后，全世界人民是否能从中获益。我们是该鼓起从混沌中创造更佳体制的勇气，还是满足于做被动的消费者：一边把目光集中在特朗普愚蠢的推文上，被逗得乐不可支，一边等待着末世的来临？

2018-07-05

慢动作的内战：美国的三路作战

我们过于习惯美国为世界设定标准的实用政治体系，以至于在这个过渡时期，很多人很难想象华盛顿特区正在发生大规模体制衰退，而这只会加速，且如果处理不好，所导致的全球战争及内战冲突的风险，将远远超出我们目前所见。

这意味着我们对美国当前事件的准确解读，最好认真看待，否则我们会有被事件压倒的风险。

首先，我们必须超越美国政治中过分单纯化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对立。我们必须停止尝试将我们观察到的矛盾信息，强加于无意义的对立当中。特朗普政权是个极端而不保守的政治运动，而其在华盛顿的反对党，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的“三路作战”，它蔑视了过去 70 年来对政治的假设。复杂的斗争已经到达高峰，而这不仅使得特朗普成为总统，还令他掌权直到现在。



现代政治中“三路作战”这个说法，源自于莱昂斯(Matthew Lyons)于 2006 年 8 月 3 日在他的博客“三路作战”中发表的题为《捍卫我敌

人的敌人》的迷人文章。莱昂斯分析鞭辟入里，虽然他的分析绝对有左翼的倾向。

莱昂斯是这么说的：“不像本质上的左与右、压迫与解放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三路作战政治假设一种更复杂的抗争，核心是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阶层、革命派的左翼和右翼。后者包括各种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右派，他们想以一种不同的压迫性社会秩序，来取代全球资本的统治地位。”

我用“全球主义者”一词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用“反全球化左派”来代表“革命派左翼”，用“反全球化右派”来代表“革命派右翼”。我觉得“资本主义者”和“革命者”两个词都过于含糊且夹带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误导人们的部分和告知人们的一样多。

你可能会说我们正在美国目睹一场“慢动作的战争”，但是国内冲突加速的风险很高，而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实质的军事冲突，即使特朗普政权本来没有这种意图。

美国人在想办法将主流媒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叙述合理化。即使大多数人知道这些信息有缺陷，他们也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蔑视工人阶级，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工人阶级，通常是白人，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无知”或者“种族主义者”，却没有人试图与他们沟通或去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因此，工人阶级的白人通常觉得反全球化左派比的全球主义者更关心他们，全球主义者可能是非裔美国人，但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穷人没有联系。

全球主义者

全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既不进步（因为他们并不接受为了支持局部控制所施加于资本或规范的限制）也不保守（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价值没什么兴趣，且可能对他们邀请到自己别墅里的客人的种族或性向极度开放）。全球主义者最关心全球金融及股市。就个人而言，无论是银行家或政客，对制度的自由或保守观点，都是家庭教养的结果，而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只要您拥抱全球视角，而且您不想干涉全球金融的某些关键特征（例如商业银行的自由利率以及衡量利率、通货膨胀和国内生产总值等方面的成功），你也可以是一个全球主义者。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很明显就是个全球主义者的竞选人。布什（Jeb Bush）及克鲁兹（Ted Cruz）也是全球主义者，但是他们利用了右翼的标志。全球主义者也有特定的分界线，不同派

系间也会竞争，偶尔足以鼓励玩弄政治的敌人。但是大部分而言，全球主义者不希望公开谈论贸易及金融的主题，而关注身份议题。

当倾向“保守”的全球主义者关起门来与高盛集团或洛克希德·马丁见面时，说话的方式和左翼全球主义者（如克林顿或桑德斯 Sanders）一样。但是他们对一般公民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保守派强调基督徒价值、爱国主义、有力的国防及法律与秩序。像克林顿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其听众讲话多谈及“多元”、“机会”及“创新”等方面。

保守文化要共和党竞选人表现得坚强且自信。这种标志冒犯了多数自由党人。自由党人必须看起来能与大众分享且种族多元，而不仅是像中尉一样发号施令的领导人，或像传教士一样说教。这些印象并不意味着组织的根本差异。

支持双方的基础利益，基本上相同。没有哪一方会主张退休金不该与股市捆绑在一起（虽然许多革新派及保守派会这么争论）。不同的地方反而在于，民主党人从好莱坞及主流媒体、医院及高科技公司，还有从专业投资银行拿走比较多的钱；相反地，共和党人从石油公司、国防承包商及零售商如沃尔玛，取得比较多的钱。

反全球化右派

特朗普已经成为反全球化右翼的偶像，且他们愈渐成为美国最积极的种族族群。被剥夺的白人与执法部门和军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主导关于阶级问题（民主党人不敢接触的）、政治阴谋（民主党人不敢接触的）和大规模制度腐败的讨论。尽管自由派政客谈论腐败是由于几颗坏苹果、自私和无思想的人，反全球化右派从一开始就认定这个体系已经坏到无法修复了。比起主流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们更接近极左翼的普遍批评。

反全球化右派的网站如“监狱星球（Prison Planet）”，已经培养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数量多过极右派。因为他们透露机密情报，且他们详细讨论较大的企业阴谋。事实上，许多讨论被虚构情节所冲淡，让听众无法完全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并不会削弱这些广播的广泛影响力。

在 1930 年代，怪罪犹太人，是缓解有关资本主义矛盾之爆炸性批评的一个极端而有效的方法。大多数公民对于自己身处自相残杀的经济体系一无所知，这点可以透过寻找替罪羊来维持。但是由于极右派大声说出媒体忽略的真正议题，它对市井小民有吸引力，而让这些人

想要革命。因此，即使特朗普的追随者呼喊要赶走黑人及穆斯林（这个行动最终会扩大至犹太人和亚洲人），对白人来说感觉起来也像是真正的行动，而不只是空话。他们没有被特朗普的挑衅行为所厌恶，反而是被启发了。当特朗普称其他国家为“屎坑”时，他的支持度只会上升。

反全球化右派偏好容易了解的简单叙述，且这种叙述能吸引工人阶级的民众，因为他们与被左派一致推崇的精英机构如哈佛，完全隔离。特朗普得以攻击整个体系却仍能在政治上存活，就是因为上述的隔离很深。许多这些反全球化运动在美国农村扮演主要角色且必须被认真对待，由于选举结构歧视城市居民。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攻击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进步民主党人无法做到的。对党派忠诚，让民主党人无法主张自由贸易的本质具有破坏性。但是特朗普的言辞没有这种限制。当他主张进口汽车应该用关税来阻止时，获得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深受自由贸易所苦。

若你看看特朗普的背景，他明显比较像是全球化主义者，但是他的主要策略不是政策，而是迅速回应支持者的需要的能力。他的政策随着其支持者的反应而变化。

特朗普学会吸引这些反全球化的右翼人士以及白人国家主义者，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一员。特朗普与以色列关系密切（反全球化左派和反全球化右派都不喜欢），许多他的右翼支持者对以色列极度敌对。即使特朗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极右派对犹太人的攻击仍在增加。

各派系如何与彼此结盟？

我们在三路作战中逐案观察后发现一组不断变化的暂时性联盟：全球化主义者不时会与反全球化左派结盟，但是有时候又与反全球化右派合作。反全球化右派也可以与反全球化左派联手，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记忆中少有先例，但开始变得普遍。

全球化主义者联合反全球化左派

许多全球金融机构如高盛集团的重要人物，都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而他们的家人相信包容、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他们很高兴能有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到他们的活动上演说，甚至还会捐钱给

“民主当下”（Democracy Now）或“绿色和平”（Green Peace）等组织，只要这些势力不要提出有系统的战略来挑战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主导权。

说直白点，全球主义者支持人道计划及福利政策，只要他们是“进步的”而不是“革命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改变被引入，而不是如何评价经济和国家福利的根本性转变。

再者，全球化主义者和反全球化左派对气候变迁有共识。全球化主义者非常关心气候变迁（只要答案不会影响他们的底线），而且两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合作，甚至反全球化已经纳入全球主义者的碳交易计划。最后，反全球化左派是少数的都市人（很多人赞同，但少有显赫人物），他们没有反全球化右派的教堂和其他机构网络，因此当想将讯息传达给更广大群众时会受阻。

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比与百万富翁的距离还远。他们会觉得从超级富有的人身上拿到钱，比从工厂的工人身上挖还容易。这种差距十分显著，并导致严重的扭曲。自由主义者又被称作进步主义者，常常活在自己的泡泡里，即使他们只是想做好事，右翼仍可以非常容易地攻击他们是精英。

全球化主义者联合反全球化右派

当全球主义者向反全球化右派寻求支持时，他们用“权利”或“自由”来提出他们的论点。他们发现右翼比较有弹性、对矛盾或甚至伪善的交易比较开放，且谈到钱时也比较好说话。

直到特朗普，有个旧论点就是，反全球化右派在其偏好的议题上（如联邦给基督教组织的钱、禁止堕胎、严厉的犯罪立法）会从共和党全球化主义者身上获得支持，而作为回报，右派支持全球主义的共和党对自由贸易和放松金融管制的不懈追求（两个议题都是反全球化右派不喜欢的）。所以反全球化右派愿意忍受共和党人拥抱以色列，即使以局部范围而言，它对以色列和整个犹太人的敌意，远远超过左派的任何一部分。

反全球化右派对军队及警察也有强烈的兴趣。他们的成员与军队关系密切，且他们的组织效仿军队文化。他们可能不喜欢很多国外战争，但是他们仰慕军人的坚毅与纪律。再者，警察、军队及监狱里的工作，受到乡下白人社群的极高评价。由于在有广大弱势人口的城市地区执法严厉，监狱系统私有化造成直接的金钱交易。

一个黑人年轻小伙子可能无法找到工作或当地经济做出明显的贡献，因为工厂大量衰败。但是若他因为可疑犯案被逮捕并送进监狱（几乎总是在乡下的白人社区），他可以被迫劳动生产产品给没几个人，而监狱会提供很多社区的高薪工作给狱友。在很多案例中，监狱成为地区中最大的雇主。

班农已经在近两年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反建制的主要旗手之一 反全球化左派与反全球化右派的秘密结盟

三路作战中最有趣的结盟就属反全球化右派联合反全球化左派，这种结盟正在增加，因为美国政府显示出进一步腐败的迹象。极右派和极左派通常在国际贸易及金融上有诸多相似处，他们都希望大量限制两者。他们多与深层政府为敌，即使他们对深层政府的定义稍微不同。两派都主张目前的美国政府缺乏管理的合法性；两派在本质上都是革命的，而非进步或保守。

特朗普永远都不会当选，若没有大量的左翼分子支持他弱化政府的方式，因为他们想要推翻它。特朗普一直吸引着极右派。事实上，在竞选期间，许多极左派组织在其网站上刊登攻击希拉里的内容，指出她原本来自于右翼组织。即使后来遭到抗议，许多人仍继续刊登相关内容，因为他们觉得是真的。特朗普甚至暗示她竞选期间支持维基解密，但是他当上总统后便被迫放弃此立场。

班农（Steve Bannon）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要力，虽然军国主义者已经关闭掉他接触白宫的管道，他的声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反全球化左派和右派的秘密结盟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道：“我们不相信这个国家有有作用的保守党，我们当然不认为共和党是那样。那将会是个造反者，强烈反体制的中间偏右民粹运动，而进步主义左派和共和党权力阶层会持续打击这个城市。”班农根据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提出“三路”战略，这番超越了“保守/进步”的论点，有广大的吸引力，因其反精英且有革命性。此外，班农的新闻通讯社“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大量借用列宁（Vladimir Lenin）的战争资金，对“全球精英”进行攻击，甚至暗示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寄生虫”。

特朗普在选战中将这个策略表达得最彻底，他以这种方式说到：“华盛顿体制以及资助它的金融和媒体大公司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保护自己并自肥。这次选举中，这个体制赌着数万亿美元的输赢。对

于那些控制华盛顿权力杠杆和全球特殊利益的人来说，他们与那些对你们没有好心的人合作。”

这个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的声明，吸引了许多选民。这些话的力量超出桑德斯所能表达的。特朗普背后有亿万富翁的黑心钱撑腰，且不用依赖共和党，所以他可以畅所欲言。这就是战略。



特朗普（及创造他的班农及默瑟 Robert Mercer）能够处理工人阶级的需求，以一种民主党人无法办到的方式，因为民主党人依赖大企业。特朗普可以在底特律说他要停止进口外国车，作为他“美国优先”经济国家主义的计划之一。这对工人的吸引力是很巨大的，但是民主党人不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民主党对“自由贸易”承诺在先。民主党人谈论种族多样性，却不碰阶级议题，且他们与一般工人、白人或黑人没有往来，偏好与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合作。

反全球化左派认为有特朗普占着总统的位置（通过反全球化右派的帮忙）代表着美国帝国主义的面具会被撕下来。左翼分子觉得至少特朗普会开启新闻战争，或在中东扩大战争。他们错了。

当然，特朗普发表的声明很有可能很真挚，该声明称他想要与金

正恩吃汉堡，且美国自 1992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的政策全是错的。但是特朗普是个政治素人，且在军事工业复合体完全没有人脉。他没多久就完全被俘虏，读着战争鹰派编写的剧本。

左派如何响应特朗普的挑战呢？看一看绿党的总统参选人斯泰因（Jill Stein）说的话，她无疑是反全球化左翼分子中最温和的。斯泰因称：“特朗普，我觉得，在国会这一关会遇到很多问题；希拉里则不会有问题。希拉里有可能造成更多的破坏、让我们加入更多战争、更快通过她压缩过的糟糕气候计划，比特朗普能更容易做到。”

斯泰因对希拉里的强大不信任，意味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崩坏。除了进步主义对上保守主义的木偶剧外，体制的衰败仍未减缓。

上述的三路作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很深远，若我是在写历史教科书，就会多加几个篇章。然而，它对今日美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表明机构存在更严重的衰退，无论是政党、联邦政府还是公司。所有这些组织都被分割为小派别和利益群组，并停止为公共利益服务。此外，我们私有化的媒体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掩盖、隐藏此种体制改变，因此让人民容易被操控。我们被引导相信特朗普才是邪恶的根源，而非政府的私有化或撤销工业管制（腐败合法化）。

公民认为政党和政府本身具有敌意和威胁性，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媒体，和我们的政治分析方法（不仅在电视上，而且在课堂上）都取决于简单的、一刀切的渐进/保守的历史叙述，因此我们难以理解三个不同群体之间蒙面拔河所创建的干涉模式，他们正在轮流与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

2018 年 5 月 23 日

从关塔那摩监狱到首尔大使馆一位美国军阀的崛起

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Harry B. Harris）本应于本月（5月）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突然，白宫毫无征兆地于4月24日宣布哈里斯将被派往韩国。

此次任命从多个层面讲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韩国努力与朝鲜和东亚其他国家发展和平关系时，指派一名军官担任驻韩国大使，是非同寻常的。鉴于对日本曾殖民统治韩国的敏感性，指派一名与日本极右翼关系密切的军官也是非同小可。哈里斯出生于日本，生母为日本人，这不足以成为反对其任命的理由。但是，在被任命为驻韩大使的同时，他被授予“旭日章”（Order of the Rising Sun，日本勋章的一种）则显得极为怪异。

此外，还有他在关塔那摩监狱所扮演的角色，那时酷刑和虐待在精心构建的法律边缘地带进行。在正常时期，哈里斯在这种公然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至少足以结束其职业生涯了。但这并非是正常时期。

当这位好战、恶毒的反华军官最初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大使时，许多澳大利亚人不太高兴。与前任艾伯特（Tony Abbot）或是陆克文（Kevin Rudd）相比，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更愿意在同中国对抗姿态上合作。不过，特恩布尔仍在艰难地控制反对声音，甚至包括来自保守派商界的反对。

美国军队中的反华势力急需哈里斯在澳大利亚扭转事态，并帮助消除当地反对与中国开战的声音。面对来自北京的经济压力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矿业、农业和教育领域的压力，即使高盛门徒特恩布尔（曾担任高盛公司常务董事和合伙人）也被迫屈服。

任命哈里斯的原因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不是什么秘密。哈里斯不是被随意任命的一名普通军官。他是亚洲地区推动与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对抗的领导者。他是嘲讽和挑衅的发言人，他不专注于专业或军事硬件的细节。

但有另外一个国家是推动对抗中国的关键，而这个国家在政府和产业内部存在重要派别愿意捍卫同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韩国。

一位强硬右派退休军官塞曼（James Thurman）本已被提名为美国驻韩大使。为何最后一刻美国中情局（CIA）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现任美国务卿）转而要求派哈里斯前往韩国首尔？虽然这种突然转变的相关文件可能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予以公开，但此举意图是明确

的。

最近朝韩谈判就举行 11 年来首次朝韩首脑峰会达成一致，而且 4 月 28 日该首脑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已就相互合作达成全面共识，或最终在数周或数月内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华盛顿是否想要一个和平条约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

朝韩关系取得的迅速进展超出了特朗普在五角大楼的保镖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请像哈里斯上将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来确保韩国人不会失去理智。

哈里斯不只是五角大楼势力的一颗棋子，他深刻担忧谈判取得突破会改变美国在亚洲的姿态，并让华盛顿走向军事紧缩，而此时正值五角大楼超时工作打造与中国战争状态，以使其大规模增加战斗机、战舰和潜艇数量合法化。他是军队推动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核心力量之一。坦率地说，美国联邦政府中很少有人愿意像哈里斯那样以如此无情的方式走得那么远。

韩国已经与朝鲜展开了调解进程，并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就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可能从涓滴发展为瀑布。美国需要有人在那里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举措，阻止这一进程。

肮脏的哈里斯是如何走上快车道的

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6 月，担任关塔那摩监狱的狱长后，哈里斯上将的职业生涯开始扶摇直上。有关这些阴森黑暗的监牢（根据布什政府的说法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如何成为残酷成性的虐待囚犯而又逃脱所有问责的怪诞故事在前狱长希克曼（Joseph Hickman）的著作《D 营谋杀》中有详细介绍。

希克曼著作的一大部分，集中于哈里斯任职期间三名囚犯被称为“自杀”的死亡。最初的报告显示囚犯通过在自己的喉咙塞满破烂物而自杀（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真的自杀）。六年的研究让希克曼得出这样的结论：监狱故意使用过量的具有精神副作用的抗疟药物，以便从心理上摧毁被拘留者。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哈里斯的监管之下，即使不是直接监督。

哈里斯是希克曼称之为“美国战场实验室”中发号施令的人。哈里斯不仅没有要求调查死亡的真正原因，还以这种怪诞的方式公开提到自杀事件：“他们很聪明，他们很有创意，而且他们一意孤行。他们不尊重生命，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我相信这不是一种绝望

的行为，而是一种针对我们进行的不对称战争行为。”（《琼斯母亲》杂志）这就是说，哈里斯将因可怕心理虐待导致的囚犯自杀描述为邪恶的、不人道的敌人的阴谋。

哈里斯的无耻行为并没有导致他被解雇乃至被起诉，此人反而是走向一系列高调的晋升，并最终在 2013 年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然后，出乎意料地，他在同年 5 月出任夏威夷整个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此次晋升的时间也不是偶然的。

当时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对盲目军国主义不满的温床，盲目的军国主义令军队战略规划和问责制大打折扣。那时太平洋司令部有一大批官员公开表示，需要将气候变化视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并且愿意彻底重新思考安全概念。这些官员和教授中的许多人认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美国也是必不可少的。

太平洋司令部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开展一系列旨在开发电池和各种形式替代能源基础设施的大型项目。太平洋司令部启动了一个全球项目，以促进太平洋和东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建立应对相关灾害的人道主义网络。

简而言之，太平洋司令部为与伙伴国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新联盟奠定了基础，如果该项目得以扩大，它将对自朝鲜战争以来定义了美国军队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直接挑战（德维特，Andrew DeWit）。

因此，太平洋司令部与中国就可能的合作，特别是就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努力部分体现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习近平在杭州峰会（2016 年 9 月 3 日）上的宣言中，两国同意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军事合作方面进行合作。

所有这些举动都引起了太平洋司令部中某些人深深的不满，他们希望继续推崇高价舰船和战斗机，以确保承包商获得丰厚的收入（以及为官员提供便利的退休计划）。然而，令这些保守派人士勃然大怒的是太平洋司令部决定将中国海军纳入一年两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太平洋司令部不仅摆脱了五角大楼走廊常见的中国威胁咒语，而且还宣称独立于 K 街游说者和其他美国本土极右组织的政策，对这些人而言，“中国威胁”不仅是战略性的，而且还是种族主义政治的一部分。太平洋司令部的许多亚裔美国人无疑会在接受此类姿态时采取犹豫态度。

不过，太平洋司令部那些致力于推动气候变化承诺的人，即使面

对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也不打算退缩。2013年3月9日，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三世（Samuel J. Locklear III）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时宣称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面临的主要长期安全威胁，这使得争论达到了白热化。洛克利尔陈述了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他的听众听后应该会不耐烦地打哈欠了。然而，实际上他的言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波士顿环球报》）

洛克利尔代表着太平洋司令部一个强大派系，这个派系因其成员的高智力成就而被称为“军事哈佛”，他们希望把气候变化作为安全政策的核心，并推动淘汰化石燃料。由退伍军人制作的题为《重负》（The Burden）的纪录片最能体现太平洋司令部（以及其他地方）的这种努力，它讲述了化石燃料对气候以及军事效能的负面影响。

如果右翼没有果断回应，洛克利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可能会导致美国战略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将关注点从“反恐战争”转向更复杂的气候变化。

无论是那些从特种部队和情报预算中获益的人，还是那些从传统航空母舰战斗群和过分讲究的战斗机中获得财富的人，都无法容忍这一转变。因此，洛克利尔很快受到军队内部强烈的攻击（尽管大部分不是公开的）。两个月后，他突然被哈里斯取代。

哈里斯被分配到太平洋司令部，原因与他被分配到关塔那摩的理由相同：为了控制异议并确保美国政策中最糟糕部分在遭遇工作层级专家的反对时仍得以推进。哈里斯无法终止与中国的合作，也无法取消太平洋司令部的气候变化研究。但他全力以赴。

在这个过程中，哈里斯成为太平洋司令部前所未有的政治人物，在日本（日本人认为他是同胞）、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发表过多次讲话。他的演讲不是对战略问题的客观评估，也不是对严重问题的科学分析，而是公开的政治讽刺。

哈里斯无法控制掌握数百亿美元的完全独立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无意放弃可再生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确保了关于安全的讨论集中在他倾心的“航行自由”活动上。“航行自由”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即美国有义务定期向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岛屿周围海域派遣军用船只，通常会故意越过12海里专属经济区（EEZ）。这种不必要的挑衅（想象一下，如果中国船只定期航行到夏威夷海岸附近，或者中国支持有关美国对夏威夷主权声索的争端，美国会如何回应）成为太平洋司令部规划的核心。

特朗普（Donald Trump）2017 年上任时，军队中“与中国开战”派系是他的大力支持者。原因并非是他们与特朗普有什么特别有组织性的联系，而是他们需要有一个能够支持他们事业的人。

这些军官反对那些计划与俄罗斯交战、与伊朗交战或是在“反恐战争”中投入过多的团体。他们还争取控制主要集中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预算，其中许多小规模派系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巨额预算。

军队本质的转变

尽管哈里斯如同特朗普一样，通过向媒体发表煽动性和冷漠无情的言论来捕捉公众注意，但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强硬风格有一定的魅力，而且他被认为是一个耿直的人。《海军时报》引用中国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话说，“他直言不讳，不畏强权，而且毫不掩饰，所以他是个另类。”

这种说法体现在哈里斯 2 月份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言论。他说，“如果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今晚就要开战，我不希望它是一场公平的战斗。如果这是一场刀战，我想带一把枪。如果这是一场枪战，我想引进大炮和所有盟友的炮兵。”

很难想象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做出比这更鲁莽和更具煽动性的声明。实际上，哈里斯吹嘘说，过去五百年来保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所有有关军事关系的协议都不适用于他。然而，对于普通官员而言，他们已经对那些为了避免冒犯任何人而抛出无害软弱言论的政府官员感到失望，而哈里斯是一个生气勃勃，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

不过，哈里斯影响力的提升不仅仅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与中国开战”派别的机遇增加的结果。它还与美国政府整体军事实力的增长有关。

2016 年大选后华盛顿平民政府的崩塌意味着军队越来越成为政府实际运作的唯一部分。想想美国军队造成的严重浪费，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奇怪的是，尽管军队僵化，其仍免受无情政客的直接干预，因此仍能够进行联邦政府其他部门无法享有的长期规划。

美国政治已无法压缩，因为当下军队在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建立的全球体系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军官无论是为正义而战还是沉迷于腐败，都是普通民众无法接近的，也几乎成为调查性新闻的主题。向军官发布的指导方针命令他们要避免与普通公民、甚至

与政府的其他部门或军队的其他部门进行交流。

因此，军队影响力的崛起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

不过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军队变得日益重要不仅是平民政府崩溃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崩溃的结果。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公民社会其他领域的领军人物现在组织性很差，并且如此懦弱，以至于军队成员成为最终展现勇气和组织能力表明立场的人。结果便是曼宁(Bradley/Chelsea Manning)，斯诺登(Edwin Snowden)，斯特林(Jeffrey Sterling)的传奇故事，以及其他军界和情报界还未公开的故事。这些人显然是反对军国主义的，但很具讽刺性的是，他们在军队的努力增强了军队的政治角色。在与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上，是军队而非民主党在扮演反对党角色。

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里，这所大学的精英是像哈里斯那样的“地理作战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他们在他们的“责任区”中发挥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大使。他们控制着不易受政治家白痴行为影响的军费预算。

然而，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预算的使用情况对于除少数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不透明的。他们的名字在热门报纸上很少被提及，这些报纸充斥着无能为力的政治家的荒唐言论。当然，这些指挥官的头脑更具调动资源、执行政策的能力，而不是像跛脚总统特朗普那样，因为特朗普暴露于无尽的媒体报道中(克莱尔，Michael Klare)。

太平洋司令部能够获得数千亿美元的预算，这使得其指挥官拥有超出世界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开支能力。他可以在不经历华盛顿丑陋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制定政策并予以实施。

哈里斯的人物形象与前任驻韩大使候选人乔治敦大学教授车维德(Victor Cha)截然不同。车维德是一位在华盛顿从事广泛咨询工作的学术专家，他在著作中将朝鲜妖魔化，作为使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合法化(以及引入咨询合同)的手段。他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担任韩国研究主任、主席和高级顾问的工作是主要军事承包商资助的大型游说和公共关系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军费预算。不过，车维德也开展了一项真正的研究，例如《对立联盟：美韩日安全三角关系》(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一书，该研究避免了简单化概括。

哈里斯可谓是美国军队内一星和两星将领(海军上将)的领导人，

他们将中国威胁锁定为引起轰动的大事件，因为它有可能吸引大量预算并增加他们的权力。该团体的宗旨是 2018 年 1 月 19 日以非保密形式向公众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本文件提出的战略标志着与以情报和特种部队为主的“反恐战争”的彻底决裂，并重返对舰船和战机的巨额投资，针对“竞争对手”进行“真正的战争”。

该文件谈到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全球混乱，以长期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益衰落为特征”，并将其归咎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侵犯行为，而非恐怖主义组织，更不提美国本身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随着金融与贸易之间以及贸易与安全之间的区别在特朗普的治理混乱中消退，哈里斯的影响力只是在增加，因为他有意模糊安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界限。特朗普主要关注自身，而哈里斯关注如何代表更多官员，他们掌管真正的预算，是有着明确目标的真正专家。

2018 年 2 月 14 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哈里斯是唯一的见证人。哈里斯持续讲述了几个小时，谈世界上最庞大、最臃肿的军队如何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他要求采取措施为与中国的战争做准备，并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大幅增加军费。他还呼吁法国、英国和印度更多地参与对抗中国的行动。

简单说，哈里斯的证词完全是夸大其词。但我们不应低估在《2018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717 亿美元（若计入机密部分会更多）国防预算的资助下，那些为建造或维护舰船和战机公司提供咨询或投资的退休军官所能赚取的资金数额。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下正对该法案进行讨论。

特朗普政府已对各种机构宣布进行无声的战争。政府成为敌人，制度混乱被大多数共和党人视为政治积极因素。通过深夜推文制定政策避免了任何审查或问责，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不需要专家意见。白宫对政策细节的这种蔑视也增加了军事派别的势力。

我们已经到了没有回程的起点，即实现了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后期开始的美国军方职能私有化的最终转变。

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事关利益，更关乎高级军官的股票上涨和舒适的退休巢穴。军方与投资银行、技术公司和军事承包商紧密交织在一起，后者为在 K 街、参议院迪克森大楼不断呼吁战争的说客及其他人员提供薪酬，并资助靠制造武器作为唯一工作岗位来源选区的竞选活动。

我不想宣扬军事将领曾经是纯洁和正义的神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军事领导性质的明显下降。完全找不到像马歇尔（John Marshall）将军一样的人，他是一位深思熟虑、涉略广泛的政策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他全然致力于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和解。马歇尔承担了一项不可能完成且于他并无回报的任务，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同样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也曾警告“军事工业复合体”。他当时显然不是为了与军事承包商签订利润丰厚的咨询合同。事实上，当时他若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而如今，如果拒绝这样的安排，他会被认为是一个傻瓜。

国会领导力的下降情势更加严峻。读者或许记得20世纪中期贾维茨（Jacob Javits）、富布莱特（James Fulbright）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等政治家，他们承认自身的缺点，倾心奉献于公共服务，日以继夜地工作以掌握政策细节，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今天这样的政客不存在了。也许最后一个这样的人物是在更新世（1997年）退休的西蒙（Paul Simon）。如今被称为“政治家”的人对于政策的含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他们花时间试图说服人们捐款，并在媒体上塑造可以吸引人们的自我形象，像吸引孩童前往棒冰柜台一样。

与大多数国会议员相比，哈里斯是一位专家。哈里斯类似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地方总督，他们在共和国时期攫取了参议院的权力。或者，可能更类似于晚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军阀。帝制中国晚期的军阀与他们的下属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基本上可以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由于帝制中国晚期政府腐朽，中国被划分为军阀统治的多个势力范围（通常得到各种外国力量的支持）。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摇摆不定。那些政治将军（军阀），尽管有缺点，但比起在紫禁城慈禧太后身边的支持者，他们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沮丧的进步派发现自己转向像袁世凯这样的更加进步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中央政府甚至无法构想的改革。不过，袁世凯自己后来成为一位无情的政治家，称帝未遂。

哈里斯在首尔的使命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衰落，个别军事司令部权力扩大，韩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将越来越困惑。韩国国会议员认为，被阉割的美国国务院仍然对朝鲜半岛事务有某些发言权。很少有人认识到太平洋

司令部本身就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只是名义上由国防部部长指挥，并且其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强大机构构建无法简单理解的复杂联系。美国国防部和各司令部签署的机密军界、情报界及经济协议所构建的复杂网络令人不安，这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外交相类似。

韩国媒体避免高度重视哈里斯及其背景，可能是需要维护特朗普对与朝鲜更密切关系的支持。也许哈里斯的角色将确保韩国与朝鲜迅速发展的一体化不会导致首尔摆脱美韩军事联盟，许多军方人员希望此联盟关系把重点放在中国威胁上。

但无论如何挥舞旗帜吸引注意，韩国人甚至是韩国保守派都不大可能认同被渲染的中国威胁。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参与质量的相应下降，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的明显种族主义政策，这些韩国都不会予以忽视。华盛顿决定脱离国际法和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造成了许多不言而喻的损失。

如果肩负让首尔与伊朗进行灾难性战争的使命，哈里斯也将面临很大的困难。韩国几乎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导致同俄罗斯的直接摊牌，这在韩国比不受欢迎的中国威胁更不受欢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哈里斯被任命为驻韩国大使究竟是升职还是降职。当然，他被派往韩国是要尽显其权威的。不过，太平洋司令部那些致力于气候变化等不重要话题的顽固派系以后将会怎样呢？单推动韩国同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就会占用哈里斯的所有时间，不是吗？

2018年5月2日，美国亚洲政策专家尼尔森（Chris Nelson）撰写的“尼尔森报告”，提到了笹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美日联盟”会议上引人入胜的讨论。

尼尔森问日本退役海军上将武居智久（Takei Tomohisa），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是否应该计划与中国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据报告显示，会议现场没有人不同意该提议。

太平洋司令部如今对安全问题持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对海洋的灾难性影响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正如古老的海军歌曲所唱的那样，“猫儿不在，老鼠翻天；阎王不在，小鬼跳梁”。

2018年5月15日

朝韩峰会后韩国的真正安全挑战

终于，即便是主流媒体也开始承认，朝韩首脑会晤及之后不可思议的美朝峰会，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文在寅总统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都不能像摩西那样将海水分开，也不能像耶稣一样具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他们能够采取有力的象征性举措，如果这些举措由政府、工业界和民间社会引导并通过长期的系统性的努力推进，或将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不过，如果缺失广泛的公民授权来支持朝鲜半岛团结的筹备及实施，不完整感将会遮住希望和进步之光。

我本人一次都不曾受邀参加讨论与朝鲜接触的公民会议。事实上，我的邻居甚至都不曾听闻有这样的活动。因此，我担心我们是在期待政治家创造奇迹。

首脑峰会背后的战略推进并不缓慢。这一次在言辞对抗和备战言论方面走得太过分了。

不同于以往的朝韩峰会，这次朝韩首脑峰会不能只专注于重启金刚山旅游区，或者离散家属的团聚问题。这次的首脑峰会也不能只聚焦于“让朝鲜单方面无核化”这一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全面协议，这不可能发生。目前特朗普政府无法谈判和落实这样一个协议，因为该政府失去了这方面的所有专家。这次峰会必须象征性和实质性地体现朝韩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必须实现转变。美国和中国之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更别说日本同中国的分歧了，都可能使得这样一个重大交易成为白日梦。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正因为 we 面临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下才成为一个罕见的时刻，那些无聊和孤立的官僚和政治家才会被迫采取他们原本根本不会考虑的变革行动。

朝鲜半岛问题的症结在于安全问题。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试图将战争、冲突或摩擦推迟数周或数月，而是要集中所有努力建立长期安全。这将意味着“安全”一词的内涵发生改变，类似状态的改变，如同冰变为水，或水变成水蒸气。像 H_2O 一样，尽管安全的本质保持不变，但其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那么，朝鲜半岛和东北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媒体一边倒地认为是朝鲜无核化，并坚称，朝鲜无条件无核化应作为未来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让我们对自己坦诚片刻。特朗普政府态度摇摆不定，从与金正恩一起吃汉堡，到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再到游说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然后又突然在没有明确承诺同朝鲜进行有意义对话的背景下同意金特会晤。

实现真正安全的第一步意味着需要就这个议题展开严肃的讨论，透明、不涉及推动特别武器系统的特殊利益，并且要让公民直接参与。在公民间就安全的内涵进行诚实的对话，才能达成有意义的共识，而非来自上层的指示。然而，关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讨论正在越来越偏离事实，尤其是尽管事实很明显，美国依然拒绝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朝鲜和韩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共同的安全关切，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这才是未来取得进展的坚实基础，而不是在坚持要求朝鲜应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相关技术的同时，坚持认为美国完全有权违反它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投资一万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核武器开发。对朝鲜提出这种要求不利于找到共同点，且将会失败。

生态系统的崩溃是一个共同的安全关切。朝鲜半岛的水资源十分匮乏。去年夏季水资源紧缺达到危机水平，鉴于2018年迄今为止的高温和低降水，今年境况将比去年更加严重。亚洲及整个世界都在经历沙漠化，而且粮食成本在未来五年可能会飙升。这些都是与朝鲜共有的深刻安全问题。

韩国应采取怎样的战略

坦白讲，在筹备朝韩首脑会晤时，我们必须从零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对安全的定义，强调环境安全，人类安全和经济安全。忽略这类核心安全关切等同于忘记了此次会晤的所有目的。

奇怪的是，我们恰恰必须从字面理解特朗普总统“‘战略忍耐’已结束”的言论。特朗普身边的鹰派人士纷纷表示，这句话意味着只有军事力量或严厉制裁才能让朝鲜放弃核武器。但是，这并非“战略忍耐已结束”唯一的意思，也并非其最主要的内涵。

对“战略忍耐”已结束更为准确的解释是，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期间认为可以不管朝鲜，任由朝鲜建造核武器并为其认为的日益敌对的环境进行自我防卫的想法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必须由实质性对话取而代之，而不是采取军事行动。战略忍耐意指不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也不对包括韩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东亚地

区的安全秩序提出基本建议。

以经济制裁或军事行动作为应对举措是绝不会成功的，正如我们从美国在整个中东制造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所知道的那样。

相反，韩国应在这次峰会上从大处着眼并提出一项严肃的倡议，一项能够为东北亚全方位的安全重新制定规则的倡议，并将其呈现给思虑周到、勇敢睿智的人，以使峰会成为伟大的历史性的时刻，如同起草《大宪章》一样，而非只是媒体作秀。而且，这个历史性时刻所冒风险如此之大，使得这样一种具有大局观的方案并非不切实际，而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反智主义

谈到朝鲜半岛安全问题时，最大的难题是衰败的媒体所传播的恶性反智主义。不依赖股市的可靠信息来源（包括来自外国投资银行的可靠信息）日渐消亡，通过合作努力和互帮互助为普通百姓的生活赋予了意义的当地社区团体消失殆尽，导致许多韩国人暴露于不可靠的信息之中，深感孤立无助。这种状态从青少年和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中显而易见。很多韩国人试图在电子游戏或肤浅电视剧中将自我埋没，而不是参与认真的讨论。

有意义政策所需的对真理的勇敢追求已经被一种无情的消费驱动文化所取代，这种文化将“幸福”定义为通过吃喝或观看能够提供短期快感的东西所带来的即时满足感。政治已经沦为一场人气秀，人们对政策细节或长远发展毫无兴趣，痴迷于社交媒体上的最新声明。轰动效应取代了对影响东北亚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的细致分析。

电玩文化的兴起在这场有关安全辩论的怪诞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包括成年人在内的许多韩国人花费很多时间玩一些无情的军事冲突的电子游戏，游戏使开枪射击看起来不仅有趣，而且似乎还能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游戏文化让阐释当今我们所面临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集成以及民族国家的崩溃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变得不大可能。电子游戏暗示对安全至关重要是瞬间反应，而不需要一个长期战略。这个错觉远比朝鲜的核武器更危险。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

与媒体炒作的来自朝鲜的极不可能发生的攻击相反，气候变化和工业污染的威胁是确定无疑的。媒体从不比较过去 50 年来的气温。如

果有这样的对比，我们就能直观地了解情况有多危险。我们也无从了解每年有多少人死于与工业污染有关的疾病。事实上，大多数韩国人不知道在过去 10 年里国内有毒物质排放量恶化了多少。在媒体看来空气颗粒物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像雪或雨一样，而不是对它们进行分析。



韩国政府重组和企业放松管制意味着工厂可以自愿报告对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这些自愿报告经常会被篡改，且政府无法审查和惩罚污染者。政府失去了要求工业产业停止毒害公民的权力。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大型医院的特色癌症中心，那里绝望的亲人花费巨资治疗受害者，却对改变环境政策无能为力。

如果客观评估未来 30 年气候变化对朝鲜半岛的威胁，就会发现危险如此之大，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韩国别无选择，只能与其邻国签署协议，全面削减常规武器，以便能够筹集足以实现经济迅速彻底转型为 100% 可再生经济所需的预算。

韩国社会中反对以环境视角重新定义安全的努力以及那些因害怕失去短期利益而不想投资于可持续经济体系的人正在对后代实施犯罪。

沙漠化趋势才刚刚开始。中国北方的沙漠正朝着北京方向推进，然后它们将前往平壤，继而是首尔。半岛的半干旱地区已经在扩大。没有任何坦克或导弹防御系统或智能手机能够防止该进程，我们最终将面临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可悲的是，商务人士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韩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弥补被征用作高速公路和公寓楼建设的农业用地，通过购买海外谷物和蔬菜就可以弥补因暴露而被雨水冲刷走的肥沃土壤。然而，气候变化的趋势表明这种想法是一个虚假的梦想。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阿根廷及其他谷物和蔬菜出口国将越来越多地遭受可怕的干旱，可能不再能够为东北亚提供粮食。进口食品的成本将急剧上涨，食品本身将成为本世纪的安全问题。中国能够利用其巨大的财富确保粮食供应，而韩国或将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

无论喜欢与否，韩国都将被迫重返以农业发展为重点的经济，毫无疑问的是，未来很多人都将后悔，令如此无价的土壤败给了盲目的房地产开发。这次重返发展农业应走有机农业发展之路。有机农业不是为中上层市场打造精品品牌，而是情势所需，因为以石油为基础的农业和肥料对环境的破坏性太大，而人类未来数百年和数千年仍将不得不在朝鲜半岛上生存。

沙漠在蔓延的同时，世界各地的海平面不断上升，或将淹没像釜山和仁川这样的城市，而且还将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危害迟早会来。然而，韩国没有应对粮食供应威胁、或是海平面上升的长期计划。许多韩国人甚至都不知道海平面上升和沙漠化是主要威胁。

除海平面上升外，海洋还存在另一个威胁。海洋温度的上升加之海水酸度的增加，将是未来 20 年我们会见证的现实威胁，它们会导致韩国人认为永世存在的鱼类物种枯竭甚至灭绝。这又会进一步加重半岛的粮食危机。

贫富差距

韩国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现象正在撕裂社会结构，并将导致国内和国际上严重的政治冲突。家族企业遭到破坏，青年人可从事工作的质量每况愈下，投资银行和其他投机金融机构对经济规划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些正在负面意义上重塑韩国社会。尽管韩国人认识到财富在集中化，公共部门在消亡，但他们从来无法从媒体及相互之间了解到内情细节，而且文化本身也阻碍了他们对任何事情进行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钱去上好的学校，你将永远无法从你所接触到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有趣的是，即使是进步群体也没有对这种腐朽的商品驱动文化所产生的深刻矛盾提供精辟的分析。

没有人主张投资银行或电信公司应该成为受高度监管的公共垄断部门。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或 70 年代（人们认为这是韩国更保守的时期），这种想法却是公共常识。

石油依赖

韩国媒体和智库有关安全的争论大部分想当然地认为，价格不菲的坦克、战斗机、潜艇和其他武器系统是保卫韩国的最佳途径。然而，如果没有燃料，没有石油，那么所有这些昂贵的武器都将无用武之地。

我这样说丝毫不是在开玩笑。韩国对进口石油的严重依赖，俨然已成为庞大的安全债务。这不仅是因为如此多的武器依赖于石油（而不是使用太阳能或风能），还因为许多韩国市民在石油供应中断时简直无法生存。

如果战争爆发，导致韩国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终止，韩国所面临的情况将比朝鲜战争时期严重得多。按照当下我们的高消费生活，可以确定的是几天之内人们将在公寓内冻得要死，几个星期内便要忍饥挨饿。而没有被宠坏的朝鲜人则将很快意识到他们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韩国在进行自己的安全规划时，最好效仿一下北方邻国表现出的节俭、质朴和效率。韩国人经常在晚上自豪地展示朝鲜半岛的卫星图像。照片中，韩国像圣诞树一样通亮，与黑暗的朝鲜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说这张照片显示了韩国的发展程度，以及朝鲜的落后程度。但更准确地说，该照片显示了韩国正在造成巨额浪费和消费，在完全不必要地情况下彻夜通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韩国应严格规范不必要的用电，并依法要求大规模采用太阳能和风能。

新式武器

新兴科技有可能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以致我们的大多数武器系统将不再有意义吗？未来战斗机、航空母舰、坦克和大炮会不会不再是有效的武器？虽然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答案，但这个问题少有人提出，这是令人惊讶的。

技术呈指数速度发展，这意味着可致成千上万甚至更多人死亡的

武器正在迅速变得更加便宜，因此小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购得。应对此种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合作、信任和想象力。但是，尚不清楚未来的冲突是否会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眼下正在迅速分化。他们保有权威，但他们被全球金融和治理网络所控制。新武器实力的改进，加之旨在管控武器的政府出现分化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的重大威胁。

武器正在发生的三个重要转变：

1. 无人机和机器人兴起；
2. 网络战争和新闻宣传服务日益复杂化；
3. 3D 打印等通过非传统手段实现物体传输的手段兴起。

常规军队由坦克、战斗机、导弹、战舰和航空母舰组成，所有这些都极其昂贵且在這些新式武器面前易受摧毁。

就无人机和机器人而言，我们正处于这项新技术的石器时代，在未来十年中它有望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不应低估机器人的潜在力量，无人机将主导这一新的反乌托邦。无人机将变得更小、更快、更致命，而且他们自动导向能力将越来越强。可以这么说，尽管发展趋势和技术是明朗的，但这种发展的最终影响尚不可知。

但我们可以想见，下一代无人机或将由 10,000 架无人机组成万机队，或能够携带从爆炸威力巨大的导弹到小于一厘米长的小型无人机等一应俱全的武器，并在接近目标的关键部位时随时引爆。这种无人机队能够悄悄靠近搭载战斗机的航空母舰，并将花费 80 亿美元建造的航空母舰在几个小时内炸为灰烬。

机器人，或称自主式杀人机器，在未来执行致命袭击时不需要人在机器内部操控。它们将有多危险，它们是否可能摆脱人的操控而实现自主行动，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或限制它们的生产，等等，是我们还未开始讨论的关键问题。设计这些杀人机器的人不太可能在他们的杰作中编制一个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道义上的机器人三大定律。

网络战将给所有的远程和电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甚至可能让我们被迫回到不会被黑客入侵的传统手动技术。未来的网络武器将能接管敌人所有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如果这些武器之间存在电子连接的话。此外，网络战争正在被军队内部的派别或其他非国家行为者所利用，而并非被国家利用。这就是造成目前混乱的原因，这种混乱给世界各地同类团体的复杂网络带来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作为东亚国家安全政策支柱的国与国冲突的基本设想不再适用。

3D 打印是一项新技术，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军事应用，但它已被确定为行业内的游戏规则改变者。3D 打印提供了仅需依靠提供给 3D 打印机的数字化描述从而实现生产物体的潜力，包括建造设备、武器、机械等。3D 打印是数控铣削、研磨、挤压和切割等技术的延伸，这些技术在工厂车间已经存在了将近二十年。一台 3D 打印机可以放置在桌面上，并能用微小的热塑性树脂液滴构建任何立体物体。人们已经通过这种方式上传了制造不易发现的枪支的模型。将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在某处放置一台 3D 打印机，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制作任何想要的东西。

武器管控

导弹防御系统是军事浪费桂冠上的宝石，也是导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政治家及集团利益在制定政策时远离科学方法、远离与知识分子商榷的魔笛手。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引入导弹防御系统时，它被认为是一种特洛伊木马，是一项允许少数公司通过推销高调炒作却无法实现所承诺功效的防御系统而赚取高额利润的政策。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导弹防御系统是在利用美国社会的反智倾向。军界和外交界的知识分子从逻辑和科学的角度建议，控制核武器危险扩散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达成裁军条约。他们是正确的，但他们不善于推销。他们反倒被指责为“软弱”或不懂复杂安全问题的“书呆子”。实际上，类似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减少欧洲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数量进行谈判达成的相互约束条约是应对导弹扩散的唯一途径。

尽管此类国际协议，如同 1995 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一样，是缓解紧张局势和增加安全的唯一科学途径，但这种做法赋予了知识分子太多的权力，以至于武器制造商担心由真理武装的知识分子群体会拒绝武器系统。

而这正是导弹防御和类似高价武器系统的美妙之处。它们不需要专家制定政策、操作系统就能提高利润。没有什么比进行武器限制条约谈判的知情专家更让武器制造商恼火。美国军队曾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外交和技术专家熟知安全和历史，懂得采用科学方法评估新武器的可行性。而如今，美国将军和大使们将销售武器系统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并期待退休后在国防公司得到一份有利可图的咨询工作。

不过，导弹防御系统无法发挥有效作用。“萨德”（THAAD）及其兄

弟姐妹最多可以击落一小部分来袭导弹。而且，由于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武器系统不再受到美国客观第三方的检验，其可靠性值得怀疑。更要命的是，虽然导弹防御系统不能阻止来袭导弹，它们却有效地引发了军备竞赛。



核武器的大规模扩散才是真正的危险，它将大大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朝鲜的小型核计划并不会构成此类威胁，不过，严重威胁确实是存在的。

目前，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建造或部署核武器，中国拥有不到 300 枚核武器。但如果中国感觉自己真的受到威胁，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将 300 枚核武器增加至 10,000 枚以上。

接下来将是连锁反应。日本可能拥有 6,000 枚核武器，韩国也将会跟随。之后呢？台湾？越南？印尼？如果日本或韩国犯错，开始发展核武器，它将引发一场危险的连锁反应，使整个地区的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

朝韩峰会上韩国的战略

有关即将举行的朝韩峰会战略的讨论大部分都集中在如何让朝鲜接受美国不可能的要求，并以某种方式将对抗推迟数月。

但是，韩国必须要有比这更宏大的战略，这次峰会只能是该战略的一小部分。战略的核心必须是控制国内和国际安全辩论，并在安全辩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韩国要远离华盛顿的所谓专家，这些专家们的薪水有赖于武器制造商的慷慨。

在我们为危险的未来绸缪时，朝韩峰会应当被视为重新思考东亚安全问题、呼吁公民理性而非情绪化的良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韩国政治家和外交官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试图取悦其他国家上，而不是放在阐明可能在国内外赢得赞赏的独特的韩国观点上。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Ogyu Sorai）曾经提出过一个最适合当下的观点。荻生徂徕写道，“成为象棋大师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完全掌握下棋规则，用完美的下法击败一切对手；第二种则是制定下棋规则。”

当韩国人考虑朝鲜半岛的安全、军事和未来时，他们采取的是第一种战略。韩国人努力掌握别人教授的规则，并墨守成规。但相比之下，改变游戏规则的伟大历史时刻不仅是有用也是必要的。当下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2018年5月9日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历史周期终结

最近笔者遇到的韩国人比较混乱。笔者从未看到他们像现在这样混乱过。他们不仅无法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地政学变化，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已陷入混乱这一事实本身。他们在微笑中像平时那样进行日常生活，但他们预测不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未来，甚至无法用严密的逻辑表达他们的担忧。

围绕着韩国的五个周期几乎同时处于结束阶段，因此混乱正在加重。韩国人将店铺或企业的衰败、反政府示威等全都归咎于现政府的错。笔者认为此刻很有必要观察一直支撑着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些长期性的巨大变化可能反而看不见，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长期性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韩国面临的最短历史周期就是因丑闻而结束的朴槿惠本应为五年的任期。在韩国政治中，这个五年周期的结束算是比较容易预测的。据官员和市民看来，韩国政府以丧失权威而终结。

第二个周期，是比这个五年更长的周期——保守主义领导人的周期也正在痛苦地面临结束。通过放宽限制、削弱官员力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切实际的承诺最终未能取得成果。韩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也将受损。从韩国国内的氛围或韩国将要前进的方向来看，可能会出现深度的转换。作为强力转换的结果，韩国也许要修改对韩国政治的几种假设。

第三个更大的周期与韩国的经济结构相关。向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出口成品、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接近尾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度盛行的想法就是，若将劳动力和自己生产的塑料、钢铁结合在一起，就可实现无尽的经济增长。现在这一前提正在迅速丧失权威。这一转换还有可能归咎于韩国的竞争力在智能手机或船舶等领域迅速降低。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领域都属于夕阳产业，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韩国人曾认为出口主导经济比较长寿。他们认为，若不能顺利运转，只要更加努力工作，推进更多的革新，就可解决问题。但即使韩国将大量政府预算投入夕阳产业，也无法推迟这一必然趋势的到来。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的苦恼是“要如何才能增加国内的农业生产，提高国民的福利”。今天的韩国可能会像当时一样非常苦恼。

这还不是全部。第四个更大的周期正接近尾声。二战以后，美国

献身于基于全球主义这一蓝图和普遍价值的全球管理，以雅尔塔会议（1945年）为首的该周期因1945年联合国的创立而实现制度化。韩国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支持这种全球基准就像是东边日出西边日落那样自然。事实上，若就历史根基来看，美国原本是孤立主义国家。因为长达15年的对外战争的负担，美国国内要求集中于国内议程。氛围变化具有决定性。经济民族主义将会持续蔓延到世界各地。对此，韩国也要集中于国内经济。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第五个周期，此刻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个历史周期就是西欧在世界经济和普遍的文化规范中所占据的统治性地位。以西欧为中心的整个国际秩序正在迅速解体。正如中国的制度在鸦片战争以前衰退那样，美国和西欧的制度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衰退。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1842年）给中国带来巨大耻辱。当时英国垄断性地掌握新产业技术，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绝对权威。自鸦片战争以后，150多年间亚洲人一直努力，重新定义自己的正体性。

中国和整个亚洲恢复了在19世纪以前或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所占据的全球经济比重。全世界人都感觉到了这一地政学巨变，在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文化和价值会发生大规模变化。

韩国人经历混乱的原因在于，此五大周期的同时结束正在从本质上改变那些曾被视为是自然、永恒的规则。很多人试图从短期周期来寻找变化的原因，对于长期周期的转变则视而不见。但我们直面的不确定性是更大变化的产物。若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真诚地应对这一变化，那么混乱将会持续加重。

2017年4月3日

永别了 东亚武器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上，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这在东亚地区持续紧张关系的局面中，让人看到希望，乃至预见到具有建设性的未来蓝图。然而尽管APEC峰会上做过积极的演讲和宣言，很多专家还是很担忧东亚地区的未来。中日韩三国间的领土纷争和历史问题以及资源问题等矛盾的根源依旧存在，各方为寻求势力均衡，由此带来军费支出剧增等严重问题，可悲的是东亚安全矛盾对谁都没有帮助。但是探寻和平方案的希望依然存在。

东亚和平商讨的起点是源自这个地区精英们的觉醒。现在的东亚地区的精英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惨烈，也没正经受过必须要阻止战争的教育。这是东亚危险与不必要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如今的亚洲，呈现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类似的状况。欧洲国家经历了两次帝国主义时代矛盾最大化的世界大战，目睹了数千万生命死亡的场景，在认识到核战争是多么可怕的70年代，才开始为防止战争发生而进行协商。

中日韩知识分子肩负责任，必须要主张新的安全模式，形势紧迫，刻不容缓。必须要正式探讨具体的和平秩序构想和裁军方案。事实上已经有适合在东亚商讨和平的多方会谈机制。虽然六方会谈是处理朝核问题的会议体制，曾经在9·19共同声明中实现过探索东亚和平可能性的协议。东盟地区安全论坛或安全合作会议也可以成为商讨中日韩三国和平问题的平台。

已经有人提出了和平进程方案。1995年John Endicott教授（又松大学校长）提出“设定东北亚限制性核武器禁止区域配置方案”成为一个范例。非核地带论已经在南极非核地带条约、东南亚非核地带等生效，实现了8个非核地带的先例，以此为基础来看，这一方案还是很有效果的。为了让朝鲜积极参与协商，中日韩可以先不管朝鲜，首先将和平协议提为协商议题。

协商不仅局限核武器，有关缩减军费的系列协商也应一并进行。可以进行海军潜艇和坦克、战斗机、导弹防御等的商议。还需要监视军事训练的装备。此外关于无人飞机和机器人、3D打印机、网络战争等新技术，也要进行协商并在条约中有所体现。战区导弹防御应该要作为总括性武器条约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如此大范围的裁军协商得以实现，东亚则将成为引领全世界的模范。

中美间的相互信赖是让和平商议得以成功实现的必需条件。因此说，“奥巴马-习近平”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宣言尤其重要。然而美国“再平衡”政策是以错误和偏见内涵的接近方式，应当及早进行修正并重新构建。在“再平衡”名义下，以中国为目标的挑拨性构想正在胡乱流传着。韩国应该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一起同美国结盟，形成抗衡中国崛起的对抗势力；或者是，美国海军应该在西太平洋区域增加两倍驻军，这种主张正在迷惑大众的眼睛和耳朵。这将打乱东亚安全构图，最终使美国也得不偿失。虽然中国需要接受有国际社会责任的行为标准，美国也需要摆脱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

裁军与和平商议应当与应对气候变化商议并行。气候变化如今必须作为安全威胁来应对，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应对才将更加有效，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有关气候变化的共同应对可以成为一种素材，在改变军队概念和作用的同时，改变东亚地区和平商议的质量并使其得以提升。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划时代的安全政策的转换，说不定会给国防带来不好的影响。然而对基础安全的革新和创造的转换，最终是对各国有利的。虽然国防领域有关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整体上的创新任务革命，也有可能减轻不了预算。中国如果可以主导这种转换，不仅可以在中国与美国、日本及韩国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还可能成为军队革新的先驱者。如果说尚且存在那么一点微弱的希望之火，那东亚就有充分可能变身为主导和平与繁荣的地区。

2016年5月26日

科技发展环境下的安保新定义

科技正飞速发展。每两年电脑芯片的性能就会提升 2 倍。世界上的这种变化也被称为“Moore's Law”。虽然急速变化有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但对安保领域影响最大。

我们应该预想到，未来的安保问题和过去完全是两个概念。另外，最重要的是，还要想到应该使用什么工具来提高安保系数。我们在避免战争方面准备得都很充分，但在面对真正的生死问题时，却错失了准备的时机。

为了保障我们未来的外交和安保，东亚正在努力寻求能够长期维持地区和平的安保协定。这样就可以按照安保协定处理最近出现的危险状况，并以和我们想象中有差异来剔除一些特定的情况。

想要在安保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还不想抛弃过去那种无言的推测或者对安保概念狭隘的偏见。就需要韩国、中国、日本还有美国，共同公开探讨两个话题。

第一，必须讨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是否会制造出更多不适当的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比起讨论军事方面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否应该将目光放长远一点讨论下未来将遇到的问题。这可能需要逾越这么久以来我们对民族和国家持有的固有想法。

第二，从伦理方面考虑，我们到底应不应该限制开发具有破坏性杀伤力的新武器。需要考虑，是否应该制定更多更为严格的条约用来制约武器发展。再则可以自我提问，如果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费用考虑进去，未来 20 年间的预算还能否支付出常规的武器费用。

不管怎么样，为了我们能将珍贵的资源，应用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阶段，难道不应该建立更严格的限制或者禁止武器的安保协定么？

科技是怎样彻底地改变安保的

最新的技术到底能不能彻底改变军事纷争，能够担当起支撑大部分武器系统的重要责任么？

即便我们深知人类的本性，也无法提出未来人类之间不会有隔阂，或者能够遏制战争的假设。导致无数人丧命的技术，越发展就越廉价。因此，它们很容易接近小团体和个人。我们需要不断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虽然，不仅不确定快速解体的国家和民族之间，未来会不会发生战争；也不确定在过去的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在未来的战争中会不会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变化一共有三点。第一，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出现；第二，网络战争的精湛化；第三，出现了例如 3D 打印机等非传统型传输物体的手段。

高价坦克、战斗机、导弹、军舰和航空母舰等军队的基本配置，实力都远不及新武器。

就拿无人机和机器人来举例子吧。虽然从技术角度来看，现在无人机和机器人都处于发展初期，但预计未来一定能够改变世界。就算是机器人的潜力不被看好，无人机也一定会主导世界的变化。无人机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确，甚至在纳米大小的世界里也能游刃有余。

那么，现在试着想象一下。是想拥有巨大的导弹，还是想拥有包括 1 万余台体积在 1cm 以下到达目标就能爆炸的新兴无人机军团。这支军团，可以使普通的飞机成为价值 80 亿美元的战斗机。

如果未来无人机的防御力和攻击力都得到提升的话，就可以实现双方妥协。但世界就会遭受到数千架无人机带来的灾难，很难想象那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网络战争或许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因为黑客侵入的问题，使我们被迫重新使用原始技术。简单点说，敌人有可能能够控制你的武器（包含核武器）也说不定。

特定势力比民族或国家，更容易滥用这种能力，这就可能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过，如果有东亚国家安保政策做坚强的后盾，即便是违背了国家间有关冲突问题的基本信念，哪怕是在极其不稳定和分裂的国际社会秩序里面，也会避免矛盾升级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

3D 打印机可谓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虽然我们很难理解这项技术在军事上有什么作用，但它却被认为是改变产业版图的重要技术。用原有技术难以制作的物品，使用 3D 打印机都可以做到。那么，从可以制造任何东西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创新的可能性。

相对来讲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3D 打印机可能具有通过设备发送消息，投射物质和物体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拥有 3D 打印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内存内或者输入进去的信息，利用周围的材料做出武器或者任何东西。

从理论上讲，如果使用 3D 打印机，就可以实现利用周边材料制造武器。这样做就可以省去中间的运输环节。

美国或者日本仅凭引领新技术就足以保持它们的地位——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在严格的政策的约束下，美国只是拥有使用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先进技术的优待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技术越发展就会越廉价，其他国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市场。

这种新形态的冲突，对有组织性的政府没有益处。我们将目睹民族和国家一点一点的分裂。网络战争是虚拟现实和游戏、广告、宣传和艺术的结合，特殊的管理和管制可能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如果我们已经不再满足现有无法表现忠诚度的武器系统，就应该果断抛弃它。但因为资金和自尊心的原因，还保有特定的防御体制是不负责任且不爱国的行为。

争议话题从安保转向气候变化

即便是传统的军事技术已经趋于正常化，我们在适应和调整气候变化上，也需要相当一大笔资金。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在花销掉这笔费用之后，便没有资金继续开发武器的事实。

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如果考虑到气候变化的速度，就应该意识到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安保的概念。未来减排，净化被污染的水资源和土地，以及其它修复大自然的基本开支必然会增加。即便往好的方向想，我们想要适应极端的天气也需要花费数兆美元。

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连常规军事支出的资金都剩不下。最后，我们只能以无法承担费用这样实际的理由，促成国际军备控制体制，从而大幅减少军事武器的数量。

无论多不情愿，我们都要通过协商达成安保协定，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核武器，减少战斗机、坦克和其他常规武器。因为，一旦发生战乱我们就要重新构建经济建筑。以后在处理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时，也应该达到目前我们使用在机密和外交上的大部分费用的标准。

以上的观点，都是以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作为出发点。提供稳定的安全保障，毫无疑问是军人应尽的义务。不过，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安全问题是任何武器系统都解决不了的。签订与之相关的协定或者支付高额款项，也都不是政府或者军队的义务。

结论

科技正呈几何式发展，使得安保也有了新的概念，人类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新危机。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点，联合国才为结束这场战争做了很多努力。与其渴望完美世界的到来，还不如培养不应该使用核武器等杀伤性武器的觉悟。如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等杀伤性武器的话，战争的危害就会更大。因此，必须制约这些杀伤性武器的发展。

爱因斯坦很早就提出过这一观点。虽然我们还没有用核战争来自相残杀，但危险正一步步逼近，新型武器轻易登场就是加快危险变成现实的速度。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气候变化会酿成更大的危险。科技不断进步，将使我们能够并需要使用更多的能源，那将对生态圈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想要真正制约国家间挑起战争的能力，以及武器的研发和使用，就需要建立具有一定高度的国际体系。这里所说的国际体系，和多国组成的国际联盟或者防止核扩散条约作用相同。

不得不说即便目前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美国又投入 10 亿资金促进核武器的现代化。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美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界限很模糊，研发小规模核设施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即便这些行为都助长了民众的不安，但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就要灭亡了。

现在，正是美国和东北亚的所有国家都勇敢地走向反方向的最好时机。

2016 年 5 月 11 日

浅谈全球数据危机

现在互联网和移动端机器随处可见，视频和照片等个人隐私信息量非常大。将这些数据汇总到一起被称之为大数据(Big Data)。如果充分利用大数据，甚至可以预见一个人未来的行动。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获得个人隐私信息的时代即将来临。无论是谁拍下了别人的相貌，做成视频供大家体验虚拟现实技术，都会面临个人隐私的问题。

3月28日，我在接受韩国今日亚洲报社采访时就提到过，我担心几年之内，人类的技术就可以发展到能够精密地记录人们活动的程度。到时候，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被记录下来。

最近虚拟现实技术是一股潮流，它让我们看到了不远处的未来。说简单一点，虚拟现实技术无非就是利用高精密的模拟仿真系统，使人很难分清现实和虚拟世界。电脑的成本急速下降，以后完全可以将虚构事件经过编辑、组合以形成历史。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制作像现实中生活的人一样的虚拟人物。

如果虚拟现实技术和社交网络互相融合，就可能会导致未来发生重大的混乱。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可能沦落成虚拟世界中的角色。不仅如此，人类虚拟化的可能性也很大。

现在我们抽取人类的DNA样本，在实验室里进行克隆实验，或者将其与其他DNA相互结合，希望会导致生物的变异从而形成‘生化武器’。如果假设我们生活的时代，可以实现这所有的一切。那么，就需要我们制定一系列的规定，以确保遗传基因信息的使用和确立。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制定国际化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考虑到未来获得个人隐私技术的发展速度，就会发现仅仅保护个人隐私是远远不够的。反过来说，为了保持个人信息的完整和保护个人隐私，必须让个人隐私成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制定有关个人隐私的宪法。并以此为基础，设立国际化的宪法机构。各国协商之后制定的法律，需要对个人隐私的监督与控制，以及滥用个人隐私该如何处罚等作出规定，并且要做到权力下放。

我认为应该效仿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一样设立3个部门。一旦需要接触敏感性个人隐私，就需要三个部门一致同意才能进一步实施。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司法部曾为了确认一名罪

犯的信息，申请解锁苹果手机，但被苹果公司拒绝。而正因为如此，个人隐私公开等问题才成为全世界热议的话题。

2016年4月18日

美军有一群危险的好战派

亚洲与欧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亚洲只经历过一次。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巨大破坏，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欧洲人在上世纪 50 年代解决了领土问题，创造了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随着现在亚太地区岛屿争端的升温，许多人质疑：亚洲是否会像一战前的欧洲那样滑向大规模冲突呢？

二者之间确有一些明显相似之处。比如，中国、日本、韩国、重返亚太的美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相互交融。但同时，围绕领土和历史问题的紧张局势却在逐渐升级。军力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促使相关各方，尤其是美国无视后果，以鲁莽和挑衅性姿态继续向前推进军力扩张。

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的确寻求提升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鉴于中国从未试图干涉航运，美国采取目前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有着并未言明的重要意义。引人关注的是，美国批评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从未加入该条约。另外，貌似中国扩建人工岛礁问题引起最多的关注，但实际上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在开展类似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亚洲的岛屿之争不同于 100 年前将欧洲拖入战争的那种领土之争以及在过往战争中积累下来的挥之不去的仇恨。尽管相互之间存在着经济竞争，但现在大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一战前在非洲等地的大规模殖民地纷争等值得付诸战争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不能低估可能的危险。作为影响亚太局势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着变化。美国军方出现了一群“军国主义者”，他们并不害怕引发全球战争，甚至决心使用军事力量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推动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此。

美国军方得到一些实力强大的公司的支持。不断扩大战斗机、航空母舰和坦克的规模符合这些公司的利益。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推动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南海等地制造紧张局势，以证实维持不断增加的传统军备军费的正当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叙利亚或南海制造紧张态势可以防止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以及改革军队以应对真正威胁的需求。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甚或日本之间的争议本来并没那么严重，在

美国推动将相关问题军事化之前一直处于可控范围。但付诸军事手段已经成为美国的典型政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何华盛顿未对这种危险政策进行更多辩论或抵制。答案与这些岛屿没有丝毫关系，而是更多出于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过去支撑美国的意识形态根基的衰落。开放的公民社会在美国已经式微，政策的出台不再来自如何建设国家的理想或对民众的关爱，而是来自对金钱利益的追逐。

毫无疑问，推动南海问题军事化只能适得其反。还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止损，聚焦于真正的共同威胁。在此过程中，美国应该起到示范作用。

第五篇

富有创意的外交

空前危机下联合国急需根本性转型

联合国于 1942 年建立。当时在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推动下，极权主义盛行全球，全人类面临被拖入野蛮时代的威胁。一小群知识分子与政坛活跃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极权主义，主张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他们同前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有识之士，以及被迫流亡居住于伦敦、华盛顿和上海的其他国家政要并肩作战，为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开创性规划和实施而呕心沥血。

欧、亚两洲反法西斯主义者所拥有的智慧与经验，以及少数政坛领袖手中的制度性权力暂时合流，为建立令人鼓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下基础。

联合国的诞生，可追溯至 1899 年、1907 年和 1914 年的三次海牙和平会议。这三次会议致力于建立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中 1914 年的和平会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三次会议确立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施了裁军方案，针对战争行为发布了涵盖战争罪行惩罚措施的人道主义法律。当时所确立的传统在今天仍至关重要。

美国因在二战中取胜而自鸣得意，将联合国操控于股掌之间。可悲的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无法拒绝接手大英帝国战利品的诱惑，从而不必要地将前苏联变成了敌手而非共建世界和平的伙伴。

然而，即使联合国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发挥潜力，但在化解危机、采取措施解决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方面，仍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在布什总统任期内，联合国的预算被削减致最低限度，即使美国的多项战略将联合国决议视为无物，即使美国的政策与国际法渐行渐远，联合国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为可借之呼吁公平正义、寻求正确引导的重要机构。

与维持众多非公开、利己性的世界秩序操控制度相比，人们更希望建立可靠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份强烈的意愿足以在最为艰难的时刻推动联合国继续行进。然而美国却再也没有重拾自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所履行的制度方面的承诺。

如今，2018 年，我们发现自己又处在了一个充满重大危机的时代，随着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治理体系的崩溃、价值观念的瓦解、财富的集中、种族主义政治运动的抬头以及军国主义的大肆叫嚣，种种威胁接踵而至。与 1942 年联合国诞生之时相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其危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军入侵前苏联、日本入侵中国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惨遭屠戮，那场悲剧我们并没有亲眼目睹。然而，美国决意废除所有军控条约，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发动侵略战争，这或许预示一场同样惨烈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美国正在经历军控政策系统的灾难性崩溃，且其外交政策处于夸夸其谈的理论家、精神病患者约翰·博尔顿的掌控之下，也许足以吞噬全人类的地狱之门已经大敞四开。如今，美国似乎又撤回了驻联合国大使——或许再也不会派出下一位。

而且，人类此刻面临的风险比以往高得多。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大量核武器，其威力比在 1945 年将广岛和长崎化为焦土的原子弹大几千倍。其余国家中，也有许多掌握着核武器与其他破坏性巨大的军械。更有许多国家，只要政治风向有所变化，即可在短短几个月内大批量地生产出各种军火。

满腹军国主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一位法西斯“基督教”领导人——威胁对华开战，这表明全面战争不只是电子游戏中待人们去体验的虚拟剧情，更是在美国的政策推动下很可能会上演的现实。倘若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都毫不畏惧，继续为推动煤炭石油业的发展而一掷千金，那么各位有何理由认为他们会害怕发生核战争？

军国主义并不是我们面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威胁。财富集中这一世界性问题正在愈演愈烈，而且情况还会愈加恶化。它使各国文化发生了全方面扭曲，而且因为精英团体意图为所欲为，治理体系也已面目全非。《2018 年全球超级财富报告》显示，目前大约 255,810 名“超高净值人士”（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人）控制了 31.5 万亿美元资产，这一数值远远超出全球 80% 的人口——56 亿人——所拥有的资产。从 2016 年至 2017 年，超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增长了 16.3%——2018 年财富报告披露上述数据时，该人群的财富增长率很可能已不止于此。

人们应当在此刻——而不是未来——做出选择。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可能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我们曾经深信不疑会引导全人类奋勇向前的全球自由秩序业已分崩离析，留下的只有浓烟滚滚的弹坑，任由投资银行家及其拥趸同怀恨在心的法西斯主义崇拜者们在其中展开唇枪舌战。

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世界所需要的，恰恰是全球的切

实回应。目前联合国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应当另建体系，创立一种全球性系统，借以针对人类所面对的威胁之缘由开展科学理性的分析，让整个地球做出迅速而又有效的大规模响应，不论国界。

联合国需要的不是改进，而是转型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人们为改进联合国现有体系而提出的建议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千年发展目标”等已经部分落实的提案。但是由于全球投资银行与主权财富基金对联合国的控制程度日趋加深，大多数提议都已被束之高阁。

此时此刻，改进联合国的现有体系已经不像给铜器抛光、给地板打蜡那样简单——为时已晚，腐蚀已深。至于联合国的任务指派模式，我们或将其视为官僚特权的体现，或将其看作政策制订过程的商业化与私有化结果——不论怎样，联合国都已失去它应有的能力，无法胜任阻止世界战争、恶性财富集中以及全球灾难性变暖的使命。实际上，比起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的那个年代，现在的联合国更加力不从心。

地球议会

与其列出一份联合国亟待改进事项的细目清单，不如进行结构性转型，使联合国功能发生彻底改变，恢复本来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使联合国真正处于能够为地球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地位上。

我们应当将联合国转化为两院代议制机构——大体上与美国国会或英国议会类似。

现有的联合国大会应变为新机构中的上院——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上院可保留“联合国”之名，各国均在其中指派一名代表。此外，现有的安全理事会应由经选举产生的发言人以及经济、安全、福祉和环境问题委员会代替。

目前负责全球治理事务的主要部门应当转变为全新的立法机构，其职能与下院或“众议院”粗略近似——其实这个比方并不确切，因为这种新型“下院”将远远超越联合国现有相应机构以及许多国家的国民大会：后两者处理事务的流程多是不对外开放、非参与性的。

这一机构——暂且将其称为“地球议会”——将代表各个地区地球公民的需要和关注点来履行职责，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制订、实施各项政策的全球性机关。

地球议会将在与全世界民众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放眼全球，制订

全球性政策。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履行过相似的职责，但地球议会还将更进一步，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成果，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多年以来，人们曾为实现名副其实、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提出过许多建议，但我们通过各大科研机构的调研结果发现，国际关系话语已遭受严重扭曲，因此那些提议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变为现实。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坚持探寻意味深远、有大国做后盾的提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在本质上与我们所说的“地球议会”最为接近。习主席的这一提法也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揭示全人类需要同心协力、开启全新的全球视角，以此来应对时代的挑战。

地球议会绝不能由国际投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或其他充当超级富豪手中工具的机构来控制。它应当在制订全球政策的同时，直接代表地方群体的利益。地球议会将开展科普，让普通大众得以了解地球真正的需要、环境的真实本质以及人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付出的努力。缺少教化的治理堪为暴政，而地球议会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此类教育。

地球议会还将推动全世界民众在真正的分享型经济框架内开展合作。营利性组织及只关注短期利益的个人同地球议会之间的互动将受到极大限制。尽管人类天性难以改变，但我们应该尽力在议会内传播奉献精神，使其着眼于长期利益，甘于无私奉献，从源头杜绝利益冲突。

政策将在地球议会内部制订，法律事务所、智库、咨询公司与其他缺乏透明度的腐败机构不得插手。地球议会受全球民众捐赠，拒绝任何形式的可疑资助。控制预算规模，能够做出准确、客观的决策，要比拥有催生腐败与危险政策的大笔资金好得多。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地球议会将根据世界总人口来决定代表人数。或许可为每五千万人指定一名代表，那么六十亿人就有120位代表。委任代表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如非洲的人口）。与此同时，身为地球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在当地人数较少而无法在其政府中拥有直接代表的群体，如极端贫困者、有生理缺陷者等，在地球议会中也应有人替他们发声，即使此类人在一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地球议会将根据科学原则对全人类以及地球的长期利益展开评估，并将国界与个别群体利益等问题放在一边，从而针对当前挑战提出应

对方案，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实施。地球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应当立足长远（至少三十年）。此外，针对气候变化等安全问题，地球议会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开展深度讨论。议会还将建立全球融资框架，让所有地球公民都能承担得起使用太阳能和风能，以及有机耕作方式的经济负担。

针对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纠纷，地球议会将不再遵循只关注眼前的仲裁原则，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综合性方法，把人类前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尤其把地球的生态健康纳入考虑。

如今，拯救处于垂死状态的海洋、减少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控制沙漠的蔓延、停止危险武器的大量生产等问题已不再被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严肃对待，大批精英也已完全脱离普通民众。因此地球议会将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职责，告诉他们人类在这个时代中所面临的真正威胁，鼓励他们就上述问题开展讨论与辩论，协助他们采取措施开展跨越地域的合作，切实改变现状。

地球议会关注的是地球本身。对它来讲，所谓“安全”是指让地球以及居于其上的生灵——不只是人类，还有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受到保护，否则人类将没有未来。地球议会既不代表跨国企业，也不受由腐败堕落、欺诈成性的媒体所放大的民粹主义言论操控。它将集中物力财力，援助致力于追求真相、坚守正义、身体力行解决问题的基层地球公民。

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关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提议没有半分理想主义色彩。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有所了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观念压倒“民族国家”概念的时代终将到来。摆在我们面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汲取传统道德哲学的精华，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孜孜不倦，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以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应对难以预料的挑战。

中国能否借助其传统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深层共识？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韩国与日本为寻求共同立场付出了种种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三个国家将着眼点放在促进贸易、消除投资壁垒、开展政府各部门部长或副部长以及企业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专家之间的高层会谈上。三国偶尔也会举行由普通民众参加的运动会与年轻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即使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

人们自然认为三国应当促成最高级别的协同与合作。但问题在于，他们常常在“最高级别”与“最高层人物”（如政府首脑、部长与企业总裁等）之间划等号。

然而，我们能否为“最高”一词赋予全然不同的涵义？我们能否把中、日、韩三国间的“高层讨论”放在文化、哲学而非社会阶层的框架中？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对参与者、对人类共同未来具有历史意义和深刻内涵的盛事。

大多数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对文化、历史与哲学的了解，就算有也极为有限。他们要么只关注其中身份地位的象征，要么只在宣传造势时提几句。至于后人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所要居于其中的世界，对他们来讲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还是有英国《大宪章》的签署等重大事件，以及儒学等学术流派起到了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为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开启了大门。

当然，我无意于提及让中、日、韩三国学者齐聚一堂、宣读文化、哲学和历史方面高深论文的枯燥乏味的学术会议。这样的活动的确有其价值，然而它们同政府决策、外交政策和普通民众的体验相去甚远。

同时，许多学者也不再把自己视作知识分子领袖，不再主动肩负帮助他人、探寻社会改良之路的道义。他们要么忙于为各种专业期刊撰写文章，要么满足于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灌输既无新意、又乏营养的内容，最终迷失了自己。中国、日本与韩国都遗失了其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坚持道义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可以担负国际主义重任，开启三国之间风格与内容俱新的会谈，从而促成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紧密合作，给世界以发展方向方面的启示。

韩国、中国与日本完全有可能开展富有启迪意义的交流，为三国在因此而依次转型的关键时期建立全新的深层关系奠定基础。这需要

我们在发表论述、专著与言论时重拾四十年来被遗失殆尽的高度严谨态度。

首先，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历史定位。在中国、韩国与日本的大城市中，与传统紧密联系的一切几乎都已不见踪影——服饰、建筑、快餐，甚至价值观体系都反映出肤浅的西方商业文化已经占据了东北亚地区。

这一过程历时两个世纪。自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中展示强大的科技力量以来，亚洲的文化话语便一直在向欧洲传统倾斜。

然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其文化有多么优越，而是由于它们迅速地接受了以燃煤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巨大的优势，但同时也使我们将科技作为衡量人与过程的标准，却忽视了人性。

如今我们看到矿物燃料正在破坏我们的地球。如今我们明白了，拒绝工业化、赞成发展可持续重农经济的中、日、韩三国专家无比正确，而欧洲大错而特错。

气候变化、科技失控，还有财富的过度集中正在使中国、日本与韩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进行重大调整迫在眉睫。

对策之一便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就传统文化原本的价值开展有历史学家、科学家、政策制订者、商界人士乃至大众参与的多层次讨论，探索怎样利用佛学、儒学与道学中丰富的哲理让我们的生活重焕生机，为实现国家治理、教育发展与环境管理创新指引新的方向。

中国、韩国和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前人针对政府、经济与政治伦理所做的讨论。倘若将其去粗取精，我们便可以极大地拓展视野，发掘无数可能性，而这样的知识，在干巴巴的核心期刊论文中和冷冰冰的《华尔街日报》里是找不到的。

同时，将中国、韩国和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为挖掘传统文化的潜力而共同努力，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意识形态冲突，让人们把重点放在三方的一致之处。

这笔财富可谓丰厚。中国与韩国、日本所分享的成熟治国体系，以可持续性农耕为基础，以道德准则为要点，已有几千年历史。这三个国家也曾建立极为复杂的框架来履行各自的义务、维持权力平衡。尽管偶见瑕疵，但这种传统的成功之处不可忽略。可惜，现在人们已

经将其抛诸脑后。

韩国可以汲取中国与日本在哲学、治国和农耕方面的精华，而在艺术、仲裁等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与韩国请教；中、韩两国的教育体系也值得日本研究效仿。

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挖掘亚洲丰厚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在面对气候变化、非可持续性发展和工业化社会体系崩溃等严重威胁之际，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当下我们要对亚洲各国共同的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审视，而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不啻于美国召开制宪会议的1787年。当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与独具慧眼的政治家们一起商讨如何对希腊和罗马的治国理念精华加以重新诠释，从而构建近代德治思想的基础。那次制宪会议因讨论的深度与各方态度的严谨而为全新民主观念的形成铺设了道路，而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启发下，几代活动家才得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革命活动中推动政治改革。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弗逊所起草的美国宪法，也是以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为基础的。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与法国的思想家们把握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精髓，将其加以富有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从而给当时奄奄一息的欧洲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借传统文化开辟视野，在其中找到了足以促成变革的力量。这种回首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了寻找实现创新的机会。

如何开启中、日、韩三方对话？

我们应当集中、日、韩三国的学者、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组建专业团队，对亚洲制度史以及三国各朝代的习俗、价值观和科技成果加以全面探索，从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决定应当如何将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为我所用，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

同时，这一工程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上述专家，政府官员、政治家、哲学家、商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活动家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但为他们所设定的遴选标准不该是与权力的联系紧密与否，而是创造力的高低与道德信念的强弱。

应当全面考察中国、韩国与日本的每一历史时期，这样才能发掘三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做此类研究时，都把目光停留在了十九世纪晚期。

以下是三个国家通过专门会议进行对话时可以讨论的课题。倘若成功，我们的专家团队便可达成新的共识，发起文化复兴运动。

治国

专家团队要详细研究历史文献与优秀的政治哲学专著，明确各朝各代的政府怎样选贤举能、实施管理，以及中央与地方是何种关系。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滋生腐败，为了保证精英管理，为了选贤举能、留住人才，为了在几百年中维持权力平衡，三个国家在不同时代采取了哪些措施？

政府是如何提升执政透明度、禁止党派之争的？各个朝代的政府管理存在哪些局限性？管理者为避免权力滥用和财富集中，采取了何种机制？我们可以从对这些问题的仔细探讨中获得启示，明确应当如何在现代开展改革。

外交与安全

韩国、日本与中国拥有优秀的外交传统，足以在维持未来和平这一问题上供整个亚洲借鉴。历史事例可以告诉我们，为了实现长久、高效的团结合作，建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我们何可为、何不可为。不论是中国的周朝与汉朝，韩国的百济和新罗王朝，还是日本的平安和镰仓时代，都有复杂缜密的外交政策可供我们参考。在西方面临体制崩溃之际，对于正在描绘新蓝图的亚洲人来讲，这些史料堪为无价之宝。

安全问题也一样。亚洲传统的安全概念超出了简单的武器系统范畴，将食品、环境、习俗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关注的是长远问题，而非瞬间打响的军事行动。

经济

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应当共同讨论三国各个历史时期是怎样拟订、执行经济规划，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相关历史事例甚少有历史学家以外的人关注，但它们之中可能蕴含着管理与发展经济的原始方法，会使我们获益良多——尤其在我们不得不效法古人，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当下。事实证明，“西方的消费与增长模式即人类未来”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中、日、韩三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可以为制订经

济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帮助我们摆脱以利润率定成败的桎梏。比如，或许可以借鉴儒家经济观点，开辟第三条道路，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的规模要小。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既避免采用尾大不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可防止重蹈消费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覆辙。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经济伦理：“Economics”一词在汉语中被译作“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令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学科；孔子更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同时，儒家崇尚节俭生活。孔子提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孟子也认为：“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这些观点对我们这个陷入困境的时代大有裨益。

倘若我们对历朝历代的长期经济策略进行深入思考，便可以对未来的发展途径有深刻见解。在不久的将来，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之类的危险因素会逼迫我们放弃“增长”与“消费”等衡量标准，不过我们可以在前现代传统文化中找到迫切所需的替代途径。

毋庸置疑，当前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把重点放在市场和贸易的短期转型上，使得三个国家制订、执行长期规划的能力大不如前。

研究三个国家以往时期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国家经济，重视合作与和谐，不再执迷于竞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三个国家以往的经济传统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找到全新的经济学手段。这种手段以人为本，而不会把股票、债券及其衍生物放在核心位置。

还有，在力挽狂澜防止社会不平等、炫耀性消费等问题愈演愈烈之时，我们也可以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应对限制铺张浪费一类的挑战的。

可持续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东北亚地区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我们需要迅速建立复杂的社会体系，既避免浪费资源，又令经济发展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治国理政方面的范例，涉及到城市规划、交通以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制订。我们更可找到具体事例，明确古时政府是如何提倡节俭，倡导环境保护，为民众创造重德才、轻钱财的环境的。我们甚至需要重新谨慎审视早先开通的运河系统——当时的运河运输并不需要耗费任何一种矿物燃料。

同样，我们也可以研究历史上有效的农业政策，考虑如何将其为今所用、实现其价值，从而开启新思路，推动可持续有机农业的发展。我们还可从前人那里学习如何推动本地农业发展，创造可以提供务农岗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对亚洲而言，在现代科学理念的配合下重归传统农耕是建立碳中和时代的最快捷方法。我们甚至可以不再将人类排泄物冲入江河湖海、污染纯净水源，而是像以前一样，再度将其用作天然肥料，从而摆脱对进口人造肥料的依赖。这种面向成熟技术的回归可以在环境修复方面取得惊人成果。

复兴亚洲的可持续发展传统是使农业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令我们摆脱对进口食品危险依赖的最快方法。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以往亚洲人十分重视农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这并不是思想观念落后的结果，而是无比明智、务实的表现。

教育

中国、韩国和日本拥有丰富多样的教育与学术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可追溯至几千年前，并与今时今日息息相关。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对发展现代教育而言，十九世纪所采用的高等学校制度最为有效，但这种看法其实毫无道理。中、日、韩三国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教育传统，古人极为重视品行的培养与师生之间的人伦关系。他们将教学作为一种由道义引领的社会活动，这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商业化教育系统有天壤之别。

传统儒学对教育功能的理解十分深刻。比如，他们重视历史，提倡对以往的政府行为、经济现象以及人类政治活动加以详细研究，以此来制定方案解决当代问题。现代教育缺乏这部分内容，因此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也不了解可以为今所用的传统文化精髓。

传统儒家教育观点的缺点是将女性拒之门外。但我们可以将其加以改变，使女性在教育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道家与佛家思想也极具潜力，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实现创新。

家庭

尽管不能说起比现在来，中国、韩国与日本以往所秉持的价值观

一定更加优越，但放眼当今，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情绪广泛传播，年轻人懒精无神——如此种种，说明许多家庭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以尊重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我们因为背弃这种传统而失去了太多太多。此外，我们对他人缺乏真正的关心，社会风气也因此而败坏。重温儒家、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家庭习惯观与家庭价值观，我们便可以得到珍贵的教诲，明白如何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营造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三个国家如能就此问题展开严肃讨论，不仅可以获得极为丰硕的成果，更可巩固三方的一致立场。

精神生活与有意义的人生

儒家、道家与佛家的传统思想可以令我们获益良多，让我们明白应当怎样使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加深刻、更有意义。这样的教诲将引导我们寻求真正的内心平静，走出浅薄的消费文化的废墟。这样的转变不耗分文，却可在现代社会创造巨大的潜在价值。

风水、孝道、正念正知等传统思想以及朱子学所倡导的“正心修身”观点，正是我们这个了无生气、贫瘠荒芜的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亚洲的思想传统精华并不一定属于宗教范畴。我们提议的是让人们察觉人类体验中无影无形、深奥玄妙的内容，给生命以尊严，而这是星巴克肤浅的消费主义所无法实现的。

对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重新发掘，可以帮助现代人卸下肩上的重担，摆脱对世俗物质财富的痴迷。回归表象之下的本真，追求资历以外的价值，我们便可重新发现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正直、同情与尊严。这样的体验没有形体、无法衡量。倘若古时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可以整天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读书写作，并就此而心满意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学术与精神追求来，生活的物质方面微不足道。我们需要唤回这种曾为三国所共有的文化。

结语

以上关于中、日、韩三国就传统文化开展探讨的建议尚停留于表面。三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等待人们去挖掘，而且历史上尚未有人就三国文化的精髓组织正式的、大规模的比对研究。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发起坦诚对话，且不需要搞狂欢盛会、选美大赛一类

的噱头。如果对话有深度、与三国文化和制度的核心内容切实相关，我们就可以启动自我感知方面的彻底转变。而开展交流的第一步，就是三方在谈话中本着平等原则、秉持最为严肃的态度。

2018年9月8日

打造中国特色智库的新传统

目前智库（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围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空间，智库是专家、政府和民间部门代表以及市民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平台。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传统基金会一直以来以讨论政策的传统而引以自豪。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智库林立的地方，更是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权力怎么用，重大决策怎样做出，智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言及中国智慧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不可忽视，一个是来自民间的智慧，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圣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他能调动大众共同治理国家。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提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三十年前的中国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寻找人类生存的智慧。”和谐社会，要建立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建立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许多中国学者似乎从开始就认为智库本质上是西方的东西，因此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智库之前，应当不遗余力地对布鲁金斯学会、CSIS等华府智库加以模仿。他们认为中国智库需要不加分辨地从模仿西方智库开始，随时间推移，中国智库日趋成熟、日渐完善，自然也就拥有中国特色。但这是建立新一代中国智库的最佳方法吗？毫无疑问，倘若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先进的智库只存在于西方，中国智库必须以西方智库为榜样，那么就会陷入一种等级观念：中国落后于西方（所谓“西方”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美国）。这样我们从一开始便让自己陷入劣势，将自己看作必须效仿发达国家的人群。

中国教育水平很高，经济与科技十分发达，从这方面来看，上述观点根本不合时宜。我认为这种一味的模仿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十分不利，中国智库有自身的传统，不应该认为中国智库全面落后因此需要完全采用西方智库的习惯与模式。看看特朗普时代美国乱七八糟的政策，中国的行政分明是走在前面，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大大超越美国——一个在特朗普政府统治下深深陷入体制性腐败的国家。

如果要开拓中国特色智库的新传统，开始阶段就要避免模仿国外智库的一些有局限性的做法，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的本质及其智库的

相关传统。明确中国的国家本质后，我们即可将西方智库的方方面面去粗取精。倘若对中国的智库传统不甚了解，我们就很难判断西方智库各个方面孰优孰劣、是利是弊——尽管我们对“西方智库”这一提法时有耳闻。如果我们不清楚中国的需要、中国的传统，就很难评价西方智库哪些是重要的，那些只是表面上很有名气。

中国智库的传统

中国近来所取得的进步并不是避免不加辨别地采用西方制度的真正原因。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没有建立智库的传统。假如只是狭隘地根据美国模式来定义“智库”，这种想法并没有错。然而，要是把智库看作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合作，参与政策制订与实施方面讨论的组织，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智库的传统十分悠久，或可追溯至两千多年以前。

至少唐朝的集贤殿书院就是可供参考的范例：这样的组织，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与学者都能参加，同时翰林学士还参与决策。其实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的书院传统也极具研究价值。我们不能将白鹿书院、徂徕书院等为当时的决策者与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探讨国政、伦理、自我与下一代学者培养问题的综合性机构归为封建迷信。

当时的书院，是有别于东亚古代教育制度的另一种形式，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郑州的嵩阳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

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王枚《睢州志·公署》：“今之州署为旧时洛学书院。书院创于雍正时刘公蓊植，广东粤秀书院。道光时马公移建于署西袁氏（袁可立）宅，与州署邻。”

中国传统书院以传承学识、启发心智为己任。既针砭时弊（东林学院），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并不是在为这些古代书院唱赞歌，而是想说明，中国历史上为治国献计献策的典范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发挥创造力，挖掘这种传统的潜能，使其能够用于当下。

这些都是可为我们指引方向而美国智库所缺失的要素。当今的美国智库愈发与企业类似，根本不关心道德与思想方面的内容。

我们的讨论尚未结束。通过仔细研究唐朝以来的中国智库传统，我们可以梳理出涵盖整个世界的新思路，从前人实践中获得启迪、让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策制订与教育方面的大小事务。这将使全球的决策者获益良多。

这一工程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十六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古罗马与古希腊包括民主观念在内的各种思想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其传统精髓加以诠释，为现代所用。如今不应该把宋朝与明清的思想当做源于封建时代的神秘言说，而应当从中获得启示，探求其种种思想体系未来得以发展的可能，使非洲与南美人民也能为之青睐。

美国智库系统的缺点

我们还需要考量美国智库系统的缺点。必须认识到，美国智库对金钱与企业资助的依赖颇深，且决定某智库价值的并非其准确程度与社会意义，而是预算的多寡，而这已经对其进行综合性客观调查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应出资方要求，许多课题已经成为禁区。保守的美国智库对我们当今最严重的危机——气候变化置若罔闻，却对导弹防御议题颇为关注，因为军火制造商是它们的金主。这种做法足以让我们相信，传统基金会与CSIS根本不是什么智库，而是在扮演着公关公司的角色。

建立自己的智库评测与资助系统对中国至关重要。该系统应当更加客观，不是简单地以吸引资金的能力作为排名标准。但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不该针对中国单独打造，而应当开放化、国际化，使之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我们要用新成果来取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想一想”(Go-to Think)智库排名系统。“想一想”的排名果堪称权威，且可决定一个智库的存亡。但面对这种压力时，美国智库的反应并不是鼓励研究员走近群众、通过科学分析来建立更好的世界。它们的管理人要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为获得捐资而对富豪们阿谀奉承，要么为在 SSCI 期刊上发表文章而绞尽脑汁，而他们的论述其实对社会基本构不成影响。那么这种更客观、更有用的智库排名系统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排名最好。然而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不过中国可以开发出一种不着眼于吸金能力与运营规模的智库评测系统。这样的系统更具广泛吸引力，而且基于其评测结果，中国与外国的智库都能获得其理应获得的关注。“先进研究都是说英语的人做出来的”——也许应该首先摒弃这种思维模式。

智库评测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一、从评测对象的理智、诚实程度与研究的完整性出发。它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是否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研究目的是反映事实，还是为维护某群体的利益而宣扬某种观点？其研究是遵循科学方法还是仅凭印象开展，甚至有误导作用？

二、调查是否涉及利益冲突？军火制造商资助下开展的安全与军事研究，以及石油公司出资开展的能源与气候研究均属此类。

三、智库是否关怀当地人群以及世界人民？其所重视的需求，是来自百姓还是企业 CEO 们？

四、决定研究重点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否会考虑普通大众的建议？关于某项政策，研究员是尽心调研，还是只听从上面安排？

最后一点，智库是否致力于长期规划，是否考虑今天的决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我们或许还会考虑智库是否会在开展国际行动时使用多种语言，是否会促进全世界调查员们的通力合作。

这样的智库评测系统将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社会公民项目 (Civil Society Program) 确立的排名指数实用得多。他们的做法只对各智库增加预算、扩大规模、接近权贵有好处，忽略了利益冲突与研究完整性等问题。

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独特的作用

中国智库还能真正的、可以引领我们前进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见解，原因很简单。

目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观点可追溯至康德与黑格尔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概念。该观点先后成为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与美国的逻辑。然而希腊传统虽然充满智慧，但只关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与全球治理并无关系。西方对民族国家的痴迷便可溯源至这种早期的思想定位。

中国早于欧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价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维护那些共享价值。继联合国的诞生后，在我们探寻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时，“天下”或“春秋”这样的政治话语不是比西方传统更实用、至少更值得考虑吗？

我并不想否认晚期帝制中国曾存在推行单边主义等问题。我要说的是，在进行早期国际社会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方面，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然而我看见中国媒体常常展示类似于晚清宫殿的建筑，它们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们的住所，而非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的终极价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尽管中国的传统建筑与陈设十分精美，但将中国传统的物质方面当作其中心内容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可悲的误读。也许中国人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某种物质文化来解读。在人们眼中，传统文化与广告牌上的名表、名包与豪宅大致等同。然而，尽管在帝制末期经历过短暂的堕落与沉溺，传统中国绝非如此肤浅。在中国伟大的儒道释传统中，人类体验最宝贵的方面超越视觉、无法触摸。中华传统重视对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这种美德首先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于物件之中。这种价值甚至无法在书中找到——尽管收集书籍十分有趣。终极价值蕴含在无影无形之中。

如果要开拓中国智库的新传统，我们应当从寻回终极价值——这种并非由西方输入、流失于东方的东西开始。

把北京打造成智库中心

中国的民间智库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与之相适应，中国智库需要更上层楼，把北京打造成中国的智库中心可以说迫在眉睫。

中国需要的不是演绎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想象力，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想象力。民间智慧在互联网上已然有所体现，互联网所呈现的广度与汇集的大数据本身就意味着“众人之事”，这是需要去发掘的。民间智慧不可限量，民间智库可以发挥出的建设力量不可小觑，全民创造力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发出来，只有在人们主动去思考、表达其主张的前提下，他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释放。他们的思考与声音，可以说本身就是国情的体现。民间智库可望将全民创造力激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思考是从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出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思考可以替代与覆盖的。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观念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权利，才能由此构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专家们固然有知识与专业上的优势，但他们可能不切实际，离题万里，乃至背离常识与直觉。中国智慧当然指的是中国人的智慧，民间智慧的集中以及通过互联网汇集的声音，必将成为中国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治国理念，那么北京的智库群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governance）革命的核心呢？能否在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起到引领作用呢？若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迈出重要的几步。

首先，需要包容年轻人。如果你去参加智库活动，你很难发现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言人一般在60—70岁之间。活动中的年轻人均为服务人员，对讨论不起任何作用。年轻意味着活力与创造力，忽略年轻人的需求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此外，智库需实现国际化，仅仅用英语开展研讨会，并不表示实现国际化。研究小组中应包含外国人、包括女性、包括在国外的华人代表。需像国外智库一样，聘用外国人担任高级研究员。

智库要做到“适度超前”，预判十分关键。好的出发点未必能导致好的结果，而是导致多种可能的结果，因此需要对此做出准确预判。影响不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因此要目中有人，要搞清楚人们的合理需求。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

新一代智库需正面探讨气候变化等核心问题，同时需要发表令人敬畏的正直言论。技术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重要议题。虽然我们还未正确认识这点，但技术正在令社会分化，并弱化了对社会问题的集中能力。智库的作用是要让我们关注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深刻问题。如

果只是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像举行仪式一样向听众阐述陈旧的观点将导致智库的失败。

智库还应该包括多种语言。除英语外，一般而言涉及哪个国家就应当使用哪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亚洲问题上使用日语、韩语，在俄罗斯问题上使用俄语，在中东问题上使用阿拉伯语等等。这样世界各国才更可能更加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出的声音，提升国家软实力。

若北京试图成为世界智库的中心，革新能力是核心。模仿存在局限性，需要综合国内外研究和讨论的网络。这是为了对于气候变化或“虚拟空间的未来”等非常综合性的问题，能够担负起调整世界各国的新政策，开展国际项目的重任。

同时也需要增进小型、大型智库间的合作。大型智库预算较多，更易接触到世界级专家。小型智库灵活性好，更了解人们的需求。若北京开发出在这些智库间分享财力和知识的战略，将迎来创新智库群的诞生。

智库需要提出能够吸引国际社会的主张，那样的话，需要与更多国外智库交流合作，相应拥有比较丰富的外文文献。保守的智库多数集中于国际金融或安全问题等与一般人需求无关的议题，未对青年岗位、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问题进行探讨。

最后，比起模仿国外智库，若强调立足于中国智慧传统的固有观点和逻辑，可能会使中国智库的世界性、有效性最大化。

中国发展需要看清的几个历史事实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深刻，尤其是在大国之间。国家间的关系，既是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现实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关系，不存在自然而然、永恒不变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在一开始多么牢不可破或者多么脆弱不堪。世界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各国之间在更多的问题上取得协调一致，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两者之间未必形成尖锐的对立，但至少是存在着的差异。就短期、中期和长期而言，中国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需要看清以下几个历史事实。

其一，依赖出口的经济方式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向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出口成品、保持高速增长的结构正在接近尾声，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再能够一帆风顺。就美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原则，声称要将美国的利益夺回来。特朗普更加务实，不再乐意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价值观买单。

其二，二战以后，美国献身于基于全球主义这一蓝图和普遍价值的全球管理，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因联合国的创立而实现制度化，这一历史事实正走向尾声。

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美国支持的这种全球基准像是东边日出西边日落那样自然。若就历史根基来看，美国原本是孤立主义国家。因为长达15年的对外战争的负担，美国国内要求政府集中于国内议程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氛围变化具有决定性。经济民族主义将会持续不断地蔓延到世界各地。对此，中国应当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

其三，西欧在世界经济和普遍的文化规范中所占据的统治性地位趋于结束。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1842年)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当时英国垄断性地掌握着新产业技术，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绝对权威。自鸦片战争以后150多年间，亚洲各国人民一直在努力，重塑自己国家的主体性地位。

以西欧为中心的整个国际秩序正在迅速解体。正如中国的制度在鸦片战争以前衰退那样，美国和西欧的制度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衰退。

如今，中国和整个亚洲恢复了在19世纪以前或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所占据的全球经济比重。全世界的人们都感觉到了这一地政学巨变。

在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文化和价值会发生大规模变化。

当我们说放眼未来，我们需要将自己国家的未来与整个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国家的未来始终是世界的未来的一部分。当我们说放眼未来，我们需要回望过去，不只是回望短暂的过去，也不只是回望自己国家的过去。我们不仅要善于从相对短的历史周期寻找变化的原因，也要善于从相对长的历史周期寻找变化的原因，因为我们直面的不确定性往往是更广大的时空变化的产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真诚地应对这种变化，排除人们心中的混乱与迷茫。

2017年4月3日

贝淡宁：用贤能政治衡量中国体制更合适

儒家文化复兴为中国发展提供道德支撑

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化变革就是传统的复兴。这种复兴既是精心策划的结果，也有自发的因素。20 世纪尤其 1949 年以来，文化呈现出来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反传统主义。再往前溯，及至 1919 年“五四运动”甚至之前，无论金融精英、自由人士、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均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根源之一便是落后的传统文化。

但过去 30 年来，中国以及韩国等其他拥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经历了一场对传统的戏剧性再评估。在此期间，这一地区经济增长迅猛，贫困人口大幅缩减，同时又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而当人们举目四望、探寻这些国家有何共同点时，答案之一就是它们都继承了儒家传统。尽管过去的叙事基本都是儒家文化阻碍了现代化和经济增长，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实际上发挥了促进作用。

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更具历史色彩和人文特征的视角的回归，它更强调教育，注重跨越代际的大家庭伦理。延及政治领域，这种儒家视角促进了有关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价值重估。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选拔和擢升具有较强能力、道德品质、社会文化技能并能带领国家前进的领导者。这种视角虽有儒家根源，但现在已然经历现代化的演变，变成中国以及韩国、日本等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尽管儒家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判，但它现在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如今，儒家核心价值的推广和促进已不仅限于政治治理层面，商业和非盈利性行业也都在这样做。

贤能政治的发扬还与社会饱受金钱主义的负面影响有关。追逐财富使得人们变得更趋个人主义，脱离更高的理想追求。因此，中国政府层面以及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提升社会的责任感，复兴儒家文化正好服务于这一目标。儒家关乎道德和个人责任，无论对于教育体系还是领导者的培养都能提供道德支撑。

贤能政治是更适合中国语境的衡量标准

当我们试图分析和理解中国时，西方的政治术语很有误导性，因其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好的民主体制和坏的集权体制，而中国往往被归为后者。但事实上，中国有着很大不同，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确有

某些威权倾向，但也具有很强的民主特征。过去 30 年来，世人见证了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并且愿意谈论自身存在的问题。笔者在之前出版的著作中使用“垂直民主贤能政治”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模式：基层层面充分展现了民主的价值；越往政治决策链的上层追溯，其领导者的擢升就越呈现出贤能政治的特点。

虽然在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差距，但这种贤能政治标准已在过去 30 年中激发了备受瞩目的政治改革。笔者认为，就政治进步或倒退的评判标准而言，中国式贤能政治是一个完全胜任的模式。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贤能政治在有关较长时期内政治进步与否的考察中是比西式自由民主更好的标准。虽然这种看法在中国之外引发一定程度的争议，但在中国内部，强调贤能政治确是知识界和改革派领导者的主流认知。

归根结底，笔者认为有关政治进步与否的评判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怎样才算是良好政治社会”这个问题有着虽然各自不同但又都趋于合理的解释。其实从柏拉图开始，“美好社会”就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的模式或版本。美国用于衡量政治进步和改革的标准，源自美国宪法所蕴含的民主理想，并且得到其立国先贤们的拥护和标榜。这套标准对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活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在美国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落差，但其评价现实的标准终究还是源自美国文化中的主流政治理念。对于有着复杂政治哲学历史和理念的中国而言，道理也是如此。这些理念可追溯至始自孔孟时代、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有关贤能政治的争鸣和辩论。中国的思想家们潜心思考如何选拔能干而且道德高尚的政治领导者以及何种能力和德行最为重要，中国人思索并尝试各种领导者选拔机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选拔一般是先从公务员考试开始，接着对其在较低层级政府部门的表现加以评估，只有在各行政层级积累了丰富经验，才有可能被拔擢到更高层。这种方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相似。

中美应允许对方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差异

笔者始终认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这些核心政治理念应该成为评估中国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虽然它们与美国信奉的那套自由主义理念不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巨大落差，这一点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但其中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把什么当作标准。

这是中国政府和知识界颇为关心的问题。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中国的发展都已“震撼世界”，中国也必须在塑造世界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其是否能以既促进国际和平又容纳分歧的方式发挥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世界大国拥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不应强制推行任何单一治理模式。在这方面，笔者更为担心的其实是美国。因为美国不仅宣称其民主模式是它自身的最佳选择，同时认为这也应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佳模式。一些美国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除此之外的其他政治体制都是非法的。这种态度当然会让很多致力于建设好政府的中国人感到反感甚或不满。他们会想：轮的着你这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来教我构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么？你们已被一部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挑战的宪法弄得束手束脚了。

笔者认为，美中双方应该求同存异，既在共同关注的领域携手努力，也要容许扎根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两种政治体制之间存在差异。

2016年1月12日

本文是贝一明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所做的采访。

创新领导人会议的方式

中韩日领导人会议能够于11月1日在首尔举行，实为一件幸事。这次会议将成为三国领导人对东北亚的未来进行坦率对话，在构建基础设施和金融、教育、安全等各个领域描绘三方合作具体蓝图的重要契机。此外，希望三国领导人会议能够放下此前过于固执的强硬姿态，以此为契机制定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更进一步推动韩朝统一的长期计划。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中韩日三方应设法寻求相关方案，三国领导人会议未来仍能持续举行，即使各方围绕某一国家的政策等存在分歧，保证三国领导人会议仍能够定期举行。若想实现这一点，领导人会议是不是应该摆脱经常以加长轿车形象出现仅限于高级外交官会谈的局限性呢？比如说，三国可以推动小学等各种交流活动，同时进行艺术家、电影制作人、NGO等共同活动，设法扩大领导人会谈的一切外延。

关键在于革新和创意，三国应通过文化要素和亲密的交流在三国首脑之间建立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三国应将这次会议作为打破以往领导人会议框架的契机。外交官们惯常做出冷漠表情，不断以本国的立场为基础互相牵制试探，多属于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但外交不一定非要如此，即使在交换意见的激烈过程中，进行外交活动的主人公们也可以通过精神交流，各退一步，在会谈结束后大幅缩小各方分歧，打开“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我们不可能期待一次领导人会谈就能引起令人吃惊的变化。但即使如此，这次会谈也能通过某种具有象征性且带有一定“影响力”的行动，改变领导人会议的基调，开启某种“良性循环”。

最近访问华盛顿的方济各教皇不顾提前预定好与美国政治人物的会面，突然与一群流浪汉共进午餐，震惊了世人。教皇的这一行为不仅深深感动了周围的人，还瞬间改变了所有讨论的基调。

如果中韩日三国领导人也能访问首尔某自闭儿童学校，与孩子们一起玩上几个小时，该多好啊。这种会谈的价值简直不可估量。如果真能这样，领导人与面临艰辛挑战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的画面不仅会令一般民众深受感动，领导人自己也能暂时从艰难的谈判中脱身出来，

通过与年轻人交融，向世人展示“亲切”这样一种人类之间共通的语言。只有这样的经历才会让首脑会谈变得更加有人性与活力。

外交活动一般分为当事人在紧凑的日程中进行谈判活动、仪典活动和各方通过散步、网球比赛度过愉快时间的非正式活动。但此番三国领导人会议完全可以安排一个使三位领导人可以在不同层面互相作用的新型场合，既能有效谈论本国面对的挑战，又不将其作为单调谈判的一部分，使各位领导人可以互相敞开心怀，真诚、知性地交换意见。

如果能够为各位领导人创造一个不用拘泥于形式和官方角色，可以互相知性交流的空间，必定会有助于深化三国国家关系。如果各国领导人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刺激对方的知性好奇心，关于领导人会议的官方活动可能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最后，在此类气氛严肃的会议中，我们不能忽视音乐家、画家、舞蹈家等艺术家可能带来的魔术般的效果。领导人会议一味按照严格的形式和仪典进行，将很难激发能够打破现有框架的创新想法。在这种时候，将艺术家引入会议过程，可以瞬间改变会谈气氛。艺术家们可以与国家元首一起对话，可能激发出从不同视角看待国家热点问题的创新思路，不是吗？假如能够实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消除横在领导人之间的各种壁垒，还可以为解决问题找到新的突破口。在这种时候，引人发笑的笑话、幽默段子或节目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大的弹性，成为寻找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有用手段。

我们不妨借用现代经营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名言作为这次领导人会议的座右铭——“不要盯着问题，寻找新的机会！（Don't Solve Problems—Pursue Opportunities）”。

如果我们只盯着问题，一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眼中所见的就只有问题本身。而且这个问题始终是我们眼中的问题而不会是别人眼里的。但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进行讨论，将目光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新的机会和潜在可能性上，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知性兴奋和乐观思考方式可能会自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头绪。

2015年10月31日

IT 时代 有必要恢复“笔谈”的传统

亚洲各国的专家们有时会在国际会议上碰面，笔者经常在这种场合目睹这样的怪现象：政府官员、教授或者企业家们碰面时，总是尴尬地握握手，用生硬的英语相互寒暄几句就草草结束了交谈，相互离得远远的坐在角落里。

邀请这些专家们需要花费大量的差旅费和住宿费，虽然专家们有很多知识和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但因为语言障碍却难以相互沟通。虽然政府和各个组织花费了大量金钱组织这样的会议，但并没有几个专家在会议过程中认识其他同行。有时候会议方准备了盛大的宴会，但专家们在宴会上很少达成今后的合作共识，也很少真正去了解其他同行的想法和知识。

如果参加会议的亚洲各国代表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畅所欲言的话，一定可以互相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行政措施，拿到本国来推广。企业家们也可以互相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过，这些有深度的交流是不可能在酒桌上进行的，毕竟那不是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环境，让这种深度交谈成为可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采取特别的措施。例如，我们把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们分成小组，先让他们参加各种活动，热热身，并相互了解对方。但遗憾的是，许多人认为东方国家所谓的“热热身”多半是要喝酒。其实不然。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爬山、烧烤，或者唱歌，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在未来，人们没有必要通过面对面交流这种方式来交流思想。虽然面对面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人际关系，但未来的线上交流，特别是抱有正式目的的网络聊天，会成为最佳的沟通方式。

与实际见面相比，和素未谋面的人们在网上交流时反倒能让许多人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为了实现网上的书信交流，我们必须打造一种可以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的在线讨论机制。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的在线交流方式都十分肤浅，因此获得的成效也十分有限。但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人们认识到网络聊天的重要性的话，它的作用将会大大提高。

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相比，18 世纪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反倒能进行更有深度的交流，这是对现代技术的极大讽刺。当时

的人们在外交场合主要采用“笔谈”的方式，也就是用中国的汉文进行交流。除了外交领域之外，当时的社会、哲学、文学等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流的，而且往往能找到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20世纪前，有学识的人们不仅懂得汉文，而且还能用汉文进行学术交流。今天，整个东亚地区精通英文的人不少，但却无法进行有深度的交流。

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在线交流机制，方便中美日韩等国的重要人士在网上严肃认真地交流意见。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工作，各国人士就可以在网上畅所欲言，沟通思想。也就是说，当中日韩的专家们针对特定主体在网上展开交流时，各方发布的帖子可以在几分钟内被在线服务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发布在相应专家的网页上。

这样一来，虽然每个人都还是在使用自己的语言，但网络上却同时有三种以上的语言在互相交流，这种机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更多的人。有了这样的网络聊天机制，中美日韩等国的专家才能不断交流，才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这种“非同步”学术会议可以召开一星期以上，会议进程还可以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持续向公众公开。

这种方法的另一大好处是实际的决策者也可以参加讨论。通常在参加外交活动的人当中，最多的不是在政界有威望的人，而是那些英语好的人。因此非同步学术会议就成为了那些主流政治家们积极参与政策讨论的平台。

当非同步学会会议获取高人气后，中美日韩等国的决策者们就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在网络上不断交流，从长远来看，这是各方开展更深层次合作的开端。

通过恢复东亚的“笔谈”传统，我们可以把现有的信息技术变成一种有效机制，方便我们随时讨论当下发生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开辟学术交流和外交对话的崭新渠道。

福山：中国崛起正促使西方广泛反思自身制度

日本《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10月15日刊登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对著名政治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访谈，内容围绕中国崛起、东亚地区张力和美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角色展开。

福山因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而享有盛名，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

贝一明目前执教于韩国庆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并担任致力于引导东亚地区跨领域的研究合作的智库亚洲研究所执行官。

贝一明：要理解东亚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必须首先思考亚洲为何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的中心以及在全球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您怎样解释我们正在见证的这种巨大转变？

福山：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重心转移显然在经济领域。这是从中国“文革”结束后的工业化以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开始的。相比之下，政治力量提升则缓慢得多。

总的来说，亚洲在重塑世界秩序、改变全球走向方面发挥的影响与其地区体量是不相称的。这就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问题，即一个国家投射想法和理念，以及建立有影响力的制度和实践的能力。在理念水平上的差距甚至要比在政治影响力上的落后更为严峻。

因此当我们讨论亚洲的崛起，必须明确讨论的是哪个方面的崛起。针对“为什么东亚经济发展可以如此成功？”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谈论经济方面的显著提升，尽管这并不一定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伴随着政治力量与影响力的同步上升。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长。

贝一明：然而，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深陷悖论。现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开展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援助计划。与此同时，如果你去上海，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为了去美国的大学读书而学习英语。(中国人)比二十年前更热衷于迁往发达国家。

福山：这个趋势确实存在，但主要原因可能只是现在有更多中国家庭有了把孩子送去美国完成学业的经济实力。不过从这一点来看，

即便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文化与教育软实力却依旧欠缺。

尽管存在很多劣势，美国仍在全球范围内投射着巨大的软实力，这是中国尚不能匹敌的。

贝一明：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了美国这样的优势呢？为什么中国、韩国和日本即便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却仍然难以获得那样的文化影响力呢？这些地区的文化成熟度和教育水平显然都很高了。

福山：我们正在见证一些转变，但是新制度的建立、全球网络的发展和对新文化的接纳总要历经数代。

韩国在文化领域已经做得不错了。通过对 K-pop(韩国流行音乐)、韩剧、韩国电影的观察可以发现，韩国正在生产一种具有高竞争力且快速扩张的文化，并且甚至渗透到了像漫画、动漫这样过去由日本专有的领域。但是，这些文化影响与 GDP 的增长关联甚小。

重大变化可能会来临，不过不会很快。

贝一明：或许英语在全球的统治性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福山：英语占据全球语言主导地位可以追溯到英帝国时期，不过其影响力的延续则同时归功于英语文化的强势和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不过在英语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重要的转变。世界各地都有人开始学习普通话，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对一些非洲人来说，中文似乎已经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语言了。文化影响力最终会跟上经济力量增长，但其滞后性也值得注意。

同时我们也是在一个过往经验往往被挑战的时代，全球化的未来难以预见。因此，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持久而稳定的繁荣并不是白白得来的。但资本的积累并不能替代生活的品质、优质的教育和安全的食品。即使是北京超级富豪的孩子也可能会因为空气污染而患上严重的哮喘。

贝一明：李昌来（美籍韩裔作家）最近出版的小说《身处满潮》中描述了一座叫做 B-Mor（从前的巴尔德摩）的大城市中的一个国家，居住于其中的是从一个叫作“新中国”的村子迁来的人，那个村子因为气候变化而无法居住了。这本小说暗示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许已不同于“大国兴衰”的逻辑，科技发展和气候变化将成为主要的因素。全世界都受到中国崛起的冲击，李昌来所设想的场景并没有那么难以置信。

福山：在西方有一个讨论，当然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参与，就是中国究竟是否具有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能力。我很可能倒向认为不能低估

中国进行深刻变革的能力的那个阵营。中国在“文革”之后的变化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而且中国在制度转变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虽说中国最近的经济和知识方面的进展主要还是追赶西方的形式，但是中国是个拥有很多优秀人才的大国。

贝一明：中国确实在国家治理与制度创新上有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完成了多次变法革新。清华大学的贝淡宁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与民主的边界》（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以及复旦大学张维为在他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里都提到中国在根本上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而非民族国家。如是观之，除了开拓新市场，中国是否蕴涵着某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福山：对于这种在现今中国政治经济的嘈杂声中看出新儒家前景的观点，我有点小怀疑。我并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学说，只见一些不连贯的理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依旧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尽管也许对过去是有一定兴趣，但基本上中国人对于儒家还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以千年传统作为思想基础会让人很有亲近感，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还是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就不会出现太大问题。我并没有在在中国政府的政治决策中看到很多儒家文明的作用。

贝一明：但西方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亚洲以及阅读和写作关于中国及其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献的兴趣愈发浓厚了。华盛顿当局对东亚的兴趣有多广阔？

福山：尽管对亚洲的兴趣已显著增长，但可能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崛起，促使西方和美国广泛反思自身的制度和劣势。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边缘的讨论，但严肃重整尚未开始。大多数西方人意识到了中国是一股新的驱动力，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国失业增加的担忧。但是很少有人将中国乃至东亚的崛起视作西方文明统治地位的威胁。

贝一明：你认为美国和欧洲目前最根本的挑战是什么？

福山：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假定缺乏相应广泛自由的经济自由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认为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其政治系统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民主化。但这些假设有很多问题。把眼光放远一些，在三十年后的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见到一个经济增长远远超过西方的中国，一个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完全取代了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同时政府仍然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发号施令的中国？这样的情境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一

且发生会给当下的全球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很少有人愿意想象这样一种结果，但这并不是把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作批判性分析来呈现的借口。

贝一明：那么欧洲怎么样？中国的崛起对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力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福山：欧洲令人震惊的正是他们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之低。虽然我希望美国能对亚洲更加重视一些，但是跟欧洲一比，我们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好多欧洲人竟然还在讨论来自美国的挑战以及美国商业模式，这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他们无法想明白的事实是，中国将成为世界局势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到欧洲经济。相似的，在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领域，欧洲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欧洲能说中文的人很少，而能用一门亚洲语言演讲或是阅读的则几乎没有。

贝一明：我们此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事实上，韩国和日本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美国如果过分关注来自中国的挑战而忽视了亚洲其他部分的重要发展可能会带来风险。毕竟韩国和日本是东南亚以及非洲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并且常常表现得比中国更为老练。

福山：亚洲是多核心、多极化、且不断演进的。虽然亚洲各国互有经贸关系，与美国都有贸易往来，但在地缘政治以及文化方面并不存在一致性，每个国家都自成一体。这将会是美国继续亚洲战略的一个挑战。

各国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从稍长远来看，所有亚洲国家都会陷入人口学的困境（衰退和老龄化）及其带来各种意料之外的后果。日本是第一个面对这一转变的国家，西方媒体对于老龄村也有过报道。事实上这个趋势未来在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会更加严重。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寻求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多元化问题。

贝一明：欧洲和美国的白人中层和中上层在人口问题上不也或多或少也遵循着韩国、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轨迹吗？

福山：这不能一概而论。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仍然比韩国和日本要高。斯堪的纳维亚的生育率已经高于人口置换率。我认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女性职业发展又依旧受到社会保守风俗限制的地方。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情形正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结婚后留在家庭中相夫教子，而让她们能在生育后继续追求事业的儿童托管设施又不存在。在日本，

女性结婚的年龄每年都在推迟。

贝一明：韩国和日本存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尽管很多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但一旦他们从大学毕业就会出现绝对的差别。一旦拿到学位踏入社会，男女机会均等的原则就突然不复存在了。

福山：我认识的一个朱丽亚音乐学院（注：美国一流的音乐学院）的教授最近十分郁闷，因为他最杰出的钢琴学生中很多都是韩国女孩，但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在毕业后把音乐才华变为职业当一名音乐家。尽管才华横溢，她们都出于本分回国嫁给了有钱的企业高管。那位教授十分惋惜道，她们的音乐才华成为了一种装饰，一项爱好。这些女性根本没有机会将音乐当作自己的职业理想来追求。

贝一明：让我们来谈谈目前亚洲、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紧张关系。虽然有很多人把当前的亚洲和一战前的欧洲做类比，我依旧认为岛屿纷争与人口众多的大国之间的领土战争有本质性区别。

福山：我认为这些岛屿纷争依旧应当被重视，因为这些矛盾会被韩国、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激化。东亚年轻的一代甚至比他们的父母更加激进，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率地说，我为今日之所见感到十分忧虑。领土纷争本身并不是大问题，然而当他们被赋予了过分的象征性意义之后，就被卷入了地缘政治力量纷争的中心。岛屿不再是几块无人居住的石头，而是中日两国谁能主宰未来亚洲秩序构建的权力之符号。

贝一明：钓鱼岛和阿尔萨斯洛林还是不同的，钓鱼岛毕竟是无人荒岛。

福山：没有人会愚蠢到为了几块海上的石头发动战争，然而历史的发展亦往往在预料之外。

贝一明：您认为美国在东亚问题上应抱何种立场？美国接下来在亚洲扮演怎样的角色才是合适的？

福山：我认为美国应当以维护已有承诺为前提，同时调整战略以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要在维护日本韩国等旧盟友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中国空间，并没有那么容易。日本这个案例来说，日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出于当地正风行的民族修正主义所挑起的。

贝一明：我对于东亚各国普遍的民族主义感到非常担忧。作为一个对日本有多年研究的人，我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日本现在消除日本历

史教科书所有二战时期的内容以及关闭那些提供对日本在二战中所作所为提供准确叙述的博物馆的做法。日本是一个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现代国家。这些做法无疑是错误的。

福山：日本确实是暗流涌动。虽然大部分日本民众并不支持这些做法，但是依旧有很大部分不可忽视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不能像德国人一样正面接受二战的结果。

贝一明：您在美国长大，不过您的家族是日本移民。家庭因素会影响您的观点么？

福山：我在东亚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是美式的。我对于日本民族主义者没有半点同情。美国长期以来与日本是战略同盟，但是日本在许多与邻国纷争问题上的姿态无异于自掘坟墓。

贝一明：回到美国在东亚的角色问题，您提出美国应当主动接洽中方并承认其新的国际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持续保持警惕也有其合理性。那么美国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东亚架构？

福山：我觉得美国应当在亚洲推行多边主义并把多边主义看作是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的。虽然美国在双边同盟关系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亚洲采用双边关系也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举例来说，中国想要和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个成员国分别进行双边交易。但像太平洋上几个珊瑚岛这样复杂的多边争议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双边讨论解决么？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东盟或者其他国际机构甚至将来会建立的新制度来解决。

我大约十年前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提议过一个关于外交和安全的多边组织，在这个框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开放地讨论军费预算、信任建立措施等各种话题并达成有意义的决议。

贝一明：我注意到韩国和美国日本不同，韩国国内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非常认可未来的多边主义构想，没有保守派别想要取消多边主义从而无视国际舆论去追求民族军事力量的增强。这可能是因为多个贸易协定中的位置决定了其经济的内在多边性。

福山：我注意到韩国在多边秩序方面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安排将成为力量倍增器。

贝一明：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的。您是否认为不断进化的技术（侦察机、网络空间和其他军民两用的技术）正在改变冲突的本质

以及国际关系？这些改变东亚有何启示？

福山：我认为网络空间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然变得毫无规则可言。如果你侵入了某个国家的电脑系统，不管这台电脑归属于商业机构还是军事机构，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谁是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的代表？

我们对于日渐盛行的网络犯罪的补救方法尚未达成任何共识。我们甚至还没有在怎样的应对措施是可接受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即便你知道是谁犯下了罪行，专家们也都无法在罪责的严重程度相互认可。层出不穷的黑客的报道使得公众心存疑虑。

我怀疑网络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会越来越难，毕竟随着科技的发展，取证会变得愈发困难。

2015年10月17日

中韩应从历史传统中寻找革新模式

随着中韩经济交流的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稳固。不仅是经济交流，文化及教育交流合作项目也越来越活跃。两国的交流应该向着在经济及环境危机时代中提出新发展蓝图的方向进行。例如，不要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找出隐藏在两种文化中好的先例，展示给全世界。如果东方传统中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融合，与西方的传统优势技术和科学接轨，则可以引领文明走向新的方向。

中国和韩国构建了世界历史上非常优秀、革新性的统治制度。通过探索这一传统和历史，就可以获得适用于现今社会的洞察能力。大致可以在通过牵制和均衡的仁政、外交战略以及通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四个领域进行思考。

首先，看一下通过牵制和均衡的仁政。像过去中国和韩国的科举考试那样的官僚选拔制度，起源于中央、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牵制和制衡原理，对现今社会也有很大的启示。虽然一般都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和韩国与民主主义没有大的关系，但中国在如今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的形成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谓民主主义，其最合理的定义是对古代希腊人的概念和中国传统的行政机关及法治制度的吸收。具体来看，过去中国和韩国有着很多高效的公务员考试、安排、调动制度。如果将这些进行适当修改运用于如今实际情况，将会有利于清除现代社会的腐败，确立仁政。

还有很多非常好地保障地方自治的制度。如果对比研究中韩历代王朝的模范事例，甚至可以得出如今社会政府改革的具体构想。

中国和韩国通过考试制度，选出了充满热情且具有献身精神的政府官员。尤其是科举考试，它是清除政府内部腐败的有效方法。今后，中国比起追求异域文化即所谓的“西方”模式，重新解释过去或许会更有效果。对中国和韩国历史的客观评价，可以成为追求革新的最佳方法。

第二，外交领域。东亚的外交、安保结构很多地方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形成的。很多亚洲外交专家急于下结论称我们正向着冷战时代回归，这是他们历史知识不足而引起的误解。

东亚在过去的 600 多年间，比起欧洲，更加成功地维持了国家之间的和平。为解决朝核问题，非常依赖六方会谈的原因也与此相同。中国的宋代与百济或高句丽等多个国家结成复杂的外交关系，这与西

方的冷战体系不同，这是通过和平解决纷争，维持了东亚的安定与和平。从琉球国、辽、北魏等，也可以找到能够活用于形成未来新权力关系的良好例子。

第三，通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土地、水、人口的历史，中国和韩国有很多有关有机农农业的珍贵先例。两国都具有一个传统，农业栽培不使用化学肥料，以此养活很多城市人口。

在全世界为恢复生态安定而不懈努力的今天，在东亚的事例中也有可以学习并且利用的部分。例如，直到 20 世纪，首尔以最少的能源使用和接近百分百的循环利用，维持了近乎完美的生态城市。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教育领域。过去中国和韩国有很多创新且高效的儿童及成人教育方法。例如历经数代人发展而来的传统阅读、写作、默记、讨论等方法。如果好好加以利用，会对改善现今教育体系带来灵感。此外，在传统的儒教教育中心中，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有伦理教育。学习的伦理性意义是需要重新注入现今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中韩传统教育中，评价学生的方式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更加人性化。维持一生的师生关系也是今天需要效仿的历史资产。

中国和韩国在技术和制度等所有方面，正向着越来越复杂的阶段进化。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寻找与近代以前传统的连续性。并且从两国历史中的各种事例中找出线索，并不意味着回归过去。反而是在向未来的挑战中，成为寻找有关新政策、技术、制度线索的过程。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和罗马的优点被全世界所知一样，期待中国和韩国传统的优点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谁更技高一筹？

作者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韩国亚洲研究所所长、韩国脑教育大学副校长。贝一明认为中国完全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完全不需要让基辛格这样的人帮助中国说话。他一直强调，中文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础，亚洲文化具有重要魅力，中国文化价值是无可代替的。作者长期在西方推崇中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并不仅仅只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范畴，更是一种文明的代名词，中国这个国家是属于中国公民的，但是文明却是全世界的。贝一明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潜力与影响力，并希望学子们将来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为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贝教授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曾担任驻美韩国大使馆顾问。出版专著《跨海求真：哈佛博士论中美未来》，并在韩国《中央日报》、国内百度百家、《环球时报》等媒体发表过大量文章，学术成果颇丰。

当前时代，紧张态势升级，国际冲突愈演愈烈。2018年11月，中国领导人与已过鲑背之年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北京会面，就此背景下的中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作为美国人，我认为这并非应时对景之举。把亨利·基辛格当作中国的朋友，这种做法不仅会给中国造成损失，而且令身在美国、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专家学者们欲言又止。中国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不需要请一个根本不懂汉语的人来帮助中国说话。

许多中国人认为，亨利·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带头人物，且在华府中的一个对中国关照有加的团体中，此二人为核心。诚然，基辛格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由他人代笔的。他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倍受青睐，表明即使是美国对中国极为肤浅的了解，也足以使这样的书籍大受欢迎。我强打精神读了读这本书，放下它时心中只有这样的感觉：该书充斥着对基辛格的溢美之词和对于此人同重要人物会谈场面的描写；至于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理解，作者一字未提。

更重要的是，当基辛格与尼克松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主要是希望在美国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并没有开拓沟通的渠道，令两国个体和民众得以就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事进行

深入对话。

没错，基辛格想要的是自身与中国之间的积极对话，而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探讨交流。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组织的会议上出现熟知毛泽东哲学或熟知中国唐宋时期优良治国传统的美国人。

如果说基辛格曾经付出过努力，那么他尽力去做的，其结果是使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专家与其他美国人难以对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我们不能忘记提拔了亨利·基辛格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是如何上位的。当时，谁想靠近中国和前苏联，尼克松就把谁妖魔化，并因此而博得名声。他称研究中国的专家为“卖国贼”和“间谍”，不遗余力地将其清除出政府与学术界。那些主张同中国合作、对社会主义观念表示理解的美国人，也被他抨击为“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中国之行，他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不过是旨在瓦解前苏联、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策略之一。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

基辛格既说不出一个中国词语，也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吊诡的是，某些中国人却认为，由一个认不出、写不了中国字的人来担当“中国专家”实属正常。实际上，近些年来在美国有很多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专家”，在他们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上，中国方面没有做硬性要求。

有一件事也许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斯蒂文森独具慧眼、博文广识，曾作为民主党代表竞选总统，而他当时的对手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便公开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仅仅是一个代表，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早就了解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有多么重要。

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地位，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极具危险性的堕落不可分割——他将这一美国智库用作跳板，登上了中国专家之位。

CSIS 曾是极具价值的国际关系信息来源，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所发布的内容，质量大不如前。

CSIS 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安全等国家职能私有化的中央舞台。处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任务，之前是交给由公民税款支持的政府官员去做，如今却要由营利性企业来提供资金，而随后签订下的各种协议也被转交给了了无才识的高官。

十年前，就连美国政策的批评人士——比如我——都会被邀请至 CSIS 研讨会发言。那时的 CSIS 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机构，但仍为富有意义的讨论敞开了方便之门。如今，时移世易，集结在他们的研讨会中的，大多是鼓动同中国或俄罗斯开战的乌合之众。

以往鼓励畅所欲言的 CSIS，其平衡有赖于美国外交政策上两块磁石的相吸相斥。居于 CSIS 一角的是亨利·基辛格，他通过将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私有化而攫取暴利，同时将该机构用作通道，为自己的公司——基辛格事务（Kissinger Associates）——吸收订单。另一方则由吉米·卡特总统的前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坐镇。他认为自己不单单是求财之人，而是学者、是公仆。当然，布热津斯基并不贫穷，而且参加过许多从道义上讲有问题的活动，但他秉持公共服务信念。

有些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一败涂地，布热津斯基是始作俑者，还认为他是冥顽不灵、为增加军费而抓住一切机会给前苏联搅局的冷战斗士。我之前撰文为布热津斯基辩护时，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抨击。

他们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堪称准确。然而我身在华府时，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我看到他为支持对抗政治恶霸的勇士而劳心劳力，听到他在布什总统任期将满时慷慨陈词，声讨鼓动同伊朗开战的好战分子，这对避免燃起战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曾多次把自己认为对美国举足轻重的事写在信件和电子邮件中发给布热津斯基，几乎每次都能收到他的详细回复。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我不是富豪、跟各大智库和各级政府毫无瓜葛而对我置之不理。

2017 年布热津斯基病逝后，各个国家项目对源于军事承包商和外国政府的资金愈发依赖——军事承包商希望煽动冲突，而外国政府想要为自己受益而扭曲美国的政策。CSIS 已然沦为政治咨询公司，企业只要付钱就能从那里拿到看似公正客观的报告，以保护自身利益。的确，CSIS 从一开始就同公众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现在情况则更加糟糕。

关于美国政策的辩论更像是一场酒吧里的斗殴。起初人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几分钟后，“战场”上只剩下穷凶极恶的混混。

这种在外交政策上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做法，与联邦政府上下政策的军事化有直接关系。美国对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外交政策军事化这一趋势已延续许久。众所周知，美国驻中东主要国家的大使只能谈谈宴会上的虾是煮是炸，真正的决策者是幕后的各位将军。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政策的军事化已深入骨髓——特朗普内阁乃至联邦政府中的前军官人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上任的联邦监狱局局长就是曾经担任陆军将领的马克·因奇（Mark Inch）。事情还不止于此。去年十一月，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被委任为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该学会为美国一流智库，曾由博学多问、雷厉风行的非军方人士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领导——不论各位是否赞同他的看法，此人的优点都无法抹杀；而其前任是才华横溢的外交官迈克尔·阿玛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

美国政府体制的基础已腐朽不堪，各个派系（如FBI与CIA，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剑拔弩张，因此像布热津斯基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许在短期内很难得到重用、发挥影响力。

结束语 何为中国

何为中国？

前些日子，我在上海参加会议时，有个学生来找我。他谈到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也许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袖，还问我对此有何看法。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仿佛盼望看到我为此而震惊，听到我说这样的成就有多么了不起、对他这样雄心勃勃的中国青年学生多么钦佩。

然而他说的这些，并没有让我备受震撼——也许中国的飞跃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觉得那位意气风发的学生似乎没有抓住重点。

1983年，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深信中国会有今天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正因如此，我起初才主修汉语。古往今来，中国多在国际舞台上担当经济与文化主导大国的角色。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讲，它在从鸦片战争结束到进入世贸组织的这段时间中所处的境况实属反常。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摆脱只注重经济规模与物质利益、无视未来的桎梏，能否展现出真正的领袖风范，以及它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新机遇。

然而我在上海闲逛时，目之所及，都是以琼楼玉宇为背景的各色广告，那些豪宅堪比法国末世贵族的居所——没过多久那群皇亲国戚便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其实我下榻的酒店内真的有一张海报以玛丽王后和路易十六所召开的盛大舞会为噱头，让人匪夷所思——腐败的专制体系因阶级斗争而分崩离析后，这二位的好光景便匆匆了结。上海面向富豪的房地产广告中那一栋栋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也许会让玛丽王后都觉得倍感亲切。

在这次上海之行中，我发现就连广告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大多附体于摆满了精致瓷器与雕花家具的晚清院宅。以这种文化空间为居所的，当然是身着绫罗绸缎、生活穷奢极欲的人们。

不论是在这样的广告里，还是在那些奢华程度不亚于晚清历史电影拍摄现场的豪宅与商城中，中国两千年来粗衣简食、承星履草的普通百姓和学子士人所代表的气节与美德均无影无踪。

中国正在同一场巨大的身份危机角力。对于领袖地位的渴望，不仅中国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对现状心有不甘的欧洲国家与美国某些地区也有。这些国家一心推动科技进步，却忘记了塑造个人品行、传播艺术与哲学思想、加强国民精神修养。肤浅的消费文化已经把座

座城市化为精神沙漠，由其支撑的经济框架也脆弱不堪。

于是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寻找新的希望，不论这份希望是点点烛光还是熊熊火炬，不论这希望之光是辉煌耀眼还是朦胧黯淡。

在美国和欧洲，军国主义日渐抬头，种族主义愈演愈烈。与之相比，中国堪为一片净土。然而在这片净土上备受推崇的消费文化与正在毁灭西方世界、有时面目甚至更为可憎的那种文化简直别无二致。

造就我的美国并不高尚无私——根本没有真正高尚无私的大国。不过在美国，在剥削性、掠夺性极高，唯暴利是图的商业模式与众多肩负伦理责任、追求真相、主张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律师和公职人员之间，曾经存在着一种平衡。我还记得儿时美国的美好之处；1998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时，那种美好仍然有迹可循。在美国，健康社会的踪迹依然随处可见，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然而那个美国，那个吸引许多中国杰出政坛人物、学者教授和商界人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去求学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虽说哈佛广场、史密森学会等地标性建筑还在，但曾令那个国家引以为傲的文化和结构遭受了永久性的扭曲。剩下的，只有建立良好政府与促进智力参与等为我们所知的传统所留下的影子。情况还在迅速恶化。恐怕美国正走在全面性体制崩溃的不归路上。

我在描述祖国所处的厄境时，心中所充斥的并不是别样的欢悦，而是无尽的悲哀。不过我还想在这里引用《圣经》中的名句，尽管我并不信教。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承认真相的确让我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然而许多中国人仍然坚信从电视上看来的、出国旅行时在富人居住区体会到的、或是存留在过往回忆中的“美国观念”，以至于无法接受眼前残忍的现实。

不过来自华盛顿的战争威胁与贸易制裁——这也是战争的一种——正在逼迫中国人明白，某些事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会倍道而行。

许多美国人都已接受由小丑总统特朗普所代表、以种族主义和利己主义为特征的新身份；欧洲如诗如画的田园中，实施排外罪行的极右翼势力已经抬头。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正身处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以美国为例。二十年的对外战争；崛起后的富豪集团无所不能，甚至颠覆了福利与公共教育政策；军国主义、贫困、气候变化、过度开采——这些问题共同指向的是一个灰暗的未来。尽管美国国内已经

有人准备好为改变前景而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

然而，虽说美国军方正在准备发动灾难性战争，而且作战对象可能是伊朗，也可能是中国，中国媒体却在报道华府有关问题时小心翼翼。事实上，中国媒体简直比美国境内的许多反对派都要谨小慎微。

在中国民众面前，媒体将唐纳德·特朗普和麦克·蓬佩奥等肆无忌惮的不法分子刻画成了伟大的政治家——尽管许多美国人都已深深地意识到这些人有多么危险。这种外交策略对中国毫无益处。

我们不该掩耳盗铃，不该自欺欺人。美国一旦出乱，我们就会看到僵而不死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传统昂起它那丑陋的头颅。那一天也许不会太远。

让我们回顾一下于 1882 年签署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基于种族，禁止华人移民至美国，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移民行为也受到了严重限制。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德裔美国人却得以幸免，原因之一便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因此法案而生。倘若没有移民方面的限制，现在美国境内会有大批亚裔人口。近几年来美国对亚裔态度的转变或许正是特朗普政策的恶果。

我们以为种族主义已经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世界无影无踪，我们以为美国和欧洲率先垂范，构建出了更加开放、更为国际化、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但如今我们却看到，在美国，各种文明观念因社会的深刻矛盾而四分五裂；因财富过度集中、劳工受虐等问题而满怀怨气的普通民众正想找人发泄怒火。

美国和欧洲将经历不同阶段，也许最终会抛弃极具威胁性的排外主义，回归平和。然而这一过程可能会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

整个世界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将会怎样。回首历史，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足以猜到未来是明是暗。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将何去何从？它能否不步美国的后尘，不沉迷于极具破坏性的、以浪费为美的消费文化，担当重任，引领人类朝全然不同的方向前进？

首先，中国人需要走出因美国而生的茫然与困惑——那个美好的美国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不能再受蒙蔽，对幻象依依不舍。我们必须清楚何为中国，何为中国的独特之处。

修佛参禅之人都需要领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何为我？”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之人每次深究，都会得出些微不同的答案。反复解答这个问题，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这种修行方法可以帮助人推倒自欺的高墙、驱散纠结在眼前的错觉，令人更加接近真

知。

请试着问问自己：

“何为中国？”

“何为中国？”

应该以什么来定义中国？是智能手机的产量和使用数量，食物与电子产品的耗费情况，还是电梯、集中供暖系统和空调所带来的便利？

长久以来，中国就是中国，但以往身为中国的中国并没有手机、空调等物品，今天它也不需要这些。这些被人们奉为成功标志的物件，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而且要么会破坏环境，要么会影响家庭氛围，要么无益于民众构建健康的精神生活。它们并非成功的标志，且与中国毫不相干。

同样，在中国，被少数人集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也被视为成功的象征。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富人阶层，但像今天这样对财富极为崇拜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德也会因此而遭受毁灭性打击。面对此情此景，不仅毛泽东会深感不满，就连唐、宋、明、清的学者也会扼腕叹息。

那么，中国能否不对媒体和各大企业言听计从，不做它们口中的“成功国家”；能否另辟蹊径，是否有另辟蹊径的潜力？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许多西方国家正走在毁灭之路上，中国也面临着很大风险。倘若中国不严阵以待，不认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减轻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终将看到灾难性的一幕降临。

此类问题不能单凭科技来解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还应当回归勤俭、正直、修心等优良传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几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德、善、孝、忠等无形之物才是无价之宝；弘扬美德、寻找选贤举能的有效途径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如今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智慧与德性似乎已无人看重。在人们心中，好像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在正念与灵修方面，中国的古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中国人民可以借之帮助自己和全世界拥护中国文化的有识之士从对消费的沉迷中解脱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的“常识”世界扎根的，只有最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股价与产品消费。正因如此，环境才会被一步一步地拖

向灾难，财富集中问题才会一点一点地加剧——而这条道理甚少有人提及，甚至不为许多人所知。

我们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将是能否有中国人鼓起勇气主张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其扎根于注重和平、正念、生态与和谐等已有传统的丰厚土壤。

为现代问题找到解决之道的，将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拘一格，能够为中国的未来谱绘别样的蓝图；他们百折不挠，即使受千夫所指也会为那样的未来摇旗呐喊；他们无所畏惧，即使承受极大的压力也能挺身而出，坚持对中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中国跟美国一样，其社会愈发被商业广告所左右。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经济学家把目光集中在股市上，却对普通大众的经济福祉置若罔闻。这样的非健康型文化无疑会催生消极、懒惰的情绪，使那些容易被花哨产品诱惑的民众更加盲目。

从根本上来讲，这既不是个人的错误，也不是美国的错误，而是文化缺失的恶果。目前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努力塑造健康、积极的文化。我相信，中国，还有相信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影响世界、立志于为人类未来创造更好文化的中国人，将一马当先，做出改变。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在他的专著《政谈》中写道，围碁（下围棋）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棋手精通棋道，将各种策略烂熟于心，步步为营，招招制胜。

但荻生徂徕进而论述道，还有人处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们并不是棋艺大师，棋技也无法与大师匹敌，但他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大师，是运筹帷幄的君子。他们能够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凭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来制订对弈规则，从而发明围碁。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最为深刻的原则也需要这样的人去塑造，去拟订。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避免重蹈覆辙，用以往的规则——浪费、金钱、石油、军国主义和消费主义——来回应难题。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极右翼势力也许会围攻中国，制造危机状态。

但是，倘若中国不随波逐流，而是勇往直前，为世界制订全新的游戏规则，一种人人有所得、尤其对环境有所裨益的规则，那么一切都会焕然一新。

可惜，许多人都为看到剥削工人的掠夺性经济蔓延、贫富差距加

大、投资银行一手遮天等在中国抬头的负面趋势而灰心丧气。我们急需的是能够拿出全新方案的人材。这样的方案，应该与当下被人视作常识的一切迥然不同，应该能够为中国乃至整个陷入困境的世界点燃希望。

未来中国：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the Fate of Humanity and the Earth

贝一明 (Emanuel Yi Pastreich) 著

ISBN 89-97445-40-5

亚洲研究所出版社

06604 大韩民国

首尔市瑞草区瑞草中央路 26 巷 (gil)13 号 7 楼

亚洲研究所 The Asia Institute

www.asia-institute.org

82 2 6925 5616



2018 年 12 月 1 日

定价：35 元



贝一明 (Emanuel Yi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理事长、高级研究员, 兼任中国全球智库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东洋研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地球治理研究院院长、韩国脑教育大学副校长, 曾任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伊利诺伊大学助理教授, 执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并在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高丽大学东亚研究所等机构担任过研究员。贝一明曾担任驻美韩国大使馆顾问。

贝一明学术思想师承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迈克尔·普鸣, 在全球化问题、互联网、海峡两岸事务、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和当代美国政治等诸多领域, 贝一明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和研究论文, 发表在一些国际性刊物上, 如: 中国的观察者网、百度新闻、央视网、环球时报; 韩国的中央日报、韩国日报; 美国的《日本焦点》、《外交评论》以及由诺丁列斯研究所发布的《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每日报道》等。贝一明的其他一些关于中、日、韩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文章也刊载于《中日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以及《日本纪念文集》等媒体。

贝一明著书包括中文版《跨海求真: 哈佛博士论中美未来》(银河出版社), 2016年; 韩文版《更大的大韩民国》, 2017年; 《另一个大韩民国》, 2013年; 《世界学者论韩国的未来》, 2012年; 《人生不是速度而是方向》, 2011年。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 贝一明著有《中国通俗小说在韩日的影响》, 首尔大学出版社, 2011年; 《朴趾源小说英语翻译》, 首尔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画中的小说——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文学隐喻》, 本文2001年12月发表于《东亚文化》。

贝一明致力于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研究, 对亚洲的发展和青年一代的成长十分关心。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 他善于将个人生活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将历史与未来联系起来, 将人类今天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 他的思考与论述, 对我们认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贝一明1987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 1992年获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博士学位; 能流利地用中文、日语、韩语和法语进行交流。

当我们从空间站回望地球的一刻，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保护地球——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是打算开发尖端武器以赢得未来战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人类迄今为止积累的各种资源、科技与聪明才智，不是用来应对共同的威胁：贫困、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等日益严峻的问题，不是用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是用于不断升级的内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物质至上的西方文明快走到它的尽头，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美国正在破坏整个世界所取得的成果。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强权政治、唯利是图的狼性商业行为、奢侈浪费的消费文化已经将人类带到了危险的境地。

一个民族如果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审视与深思，怎么可能做到超越历史？一个国家如果始终把自身的眼前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怎么可能做到与别国平等相待乃至惠及全球？

贝一明教授认为，放眼当今世界，新的文明最有可能也只能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中国历来有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的思想，传统中国文化强调“看不到”的价值，比如正义感、孝顺、关心家庭与社群等等。重新诠释优秀的传统文化，将蕴涵其中的价值同先进的科技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未来中国。未来中国的发展，关乎人类与地球的命运。



贝一明 Emanuel Yi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www.asia-institute.org